

“二次革命论” 批评

项观奇 著

莱茵出版社

2019.3

就太行玉笛同志的大作略作討論

项观奇

太行玉笛同志（以下简称太行）将他在 2013 年 2 月发表在红旗网上、并在同年 8 月重发的大作，昨天在我们红群里发表出来。这对于我们讨论所谓“二次革命论”的问题（现在知道了，太行他们实际是革命阶段论者），是很有好处的。

我觉得太行的文章写得很用心，一些意见也讲得挺好。我读后，很高兴，因为在我们的队伍里，多一点有理论研究能力的同志，对于我们担当的伟大历史使命是非常必要的。

我觉得分歧不是很严重。所以，我想就太行的大作，加一点评语，略作讨论，也许这样就能够消除分歧。这是我的愿望。

为了便于看清分歧，我采取评论太行大作原话的方式，一一列举。这样，我写起来方便，大家阅读也方便。

一、太行大作的题目说明，他实际还是社会主义革命论者。

他的大作的题目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推翻专制制度，争取政治自由》

既然是“无产阶级革命”，那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甚至共产主义革命，是同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特定历史内容，就是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就是实现共产主义。无产阶级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是这两个阶级的阶级本性的根本不同决定的。

二、太行大作一开始，就写了他的一个重要的基本的意见。

“他说：把马列毛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再声明：

针对中国这样一个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又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国家，由于现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性质，由于复辟后当政的官僚资产阶级集团对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实行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中国依然存在封建特色的专制制度，分析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各社会阶级的现状，可以而且应该得出结论：中国无产阶级旨在重建共产党、重建无产阶级专政、重建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二次社会主义大革命需要分两步走。第一，推翻官僚专制制度，重建无产阶级为主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第二，在达到上述革命目标的基础上，不停顿、有步骤地进入以消灭私有制、消灭整个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为目的的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这是汲取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经验，把马列毛主义和当前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政治主张。是坚持马列毛主义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的辩证统一论的正确革命主张。

由于资本主义复辟后中国历史的大倒退，由于当政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多重阶级属性，由于专制制度的存在，大革命的第一阶段（即准备阶段）的政治目标或纲领，只能是推翻专制制度，争取人民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政治自由，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因为这个阶段革命的性质主要的还是民主革命的性质，所以我们称之为人民民主革命，以区别于历史上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当然不是说，人民民主革命要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因为它实质上是无产阶级第二

次社会主义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任何把这两个阶段既然分开，甚至对立起来的观点都是机械的、片面的、形而上学的思想观点。

当然，不能否认第一阶段的革命也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因为官僚资产阶级也是资产阶级，尽管它和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不同，有着明显的封建和买办的特点。这也正说明这场大革命的两个阶段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

这段话中是有几点可以讨论的。

1、太行承认，“中国这样一个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又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国家”，承认“现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性质”，既然中国社会的性质是资本主义的，那么，这里的专政，其基本阶级属性也应该是资产阶级的，即资产阶级专政。但是，太行没有强调这一点，而是说“由于复辟后当政的官僚资产阶级集团对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实行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中国依然存在封建特色的专制制度”。但是，就算是这样，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在这个复辟了资本主义的中国，现在的专政，到底是不是资产阶级专政。有法西斯，有封建特色，是专制制度，但是，这些特点到底隶属于资产阶级专政，还是隶属于封建地主阶级的专政。不管有多少封建性，到底是资本主义属性占主导，还是封建主义属性占主导，是不能模棱两可的。这涉及到我们要革什么阶级的命，要进行一场怎样性质的社会革命。在我看来，不管带上多少封建性，资本主义还是占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专政还是其基本属性，因此，我们要革资本主义的命，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自然，如列宁所教导的，当我们从事这一革命的时候，理所当然地要顺便扫荡封建性。太行强调封建性不错，但是，不说、不强调资产阶级专政，不妥。

2、接下来，太行认为：“分析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各社会阶级的现状，可以而且应该得出结论：中国无产阶级旨在重建共产党、重建无产阶级专政、重建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二次社会主义大革命需要分两步走。第一，推翻官僚专制制度，重建无产阶级为主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第二，在达到上述革命目标的基础上，不停顿、有步骤地进入以消灭私有制、消灭整个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为目的的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这个“两步走”，别人称之为“二次革命论”。怎么个叫法，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不对。我认为这个两步走的设想和论述是不对的。

第一步，怎么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呢？正是。重建无产阶级为主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就是重建无产阶级专政，只是，限于历史条件，只能建立以无产阶级为主导（通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多阶级联盟的人民民主专政。这是决定一切的政权的变动。这正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第二步，是政权在手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没有第一步，夺取政权，第二步是谈不到的。夺取政权，正是革命的最重要的标志。这里，当然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标志。没有这场革命，“不停顿、有步骤地进入以消灭私有制、消灭整个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为目的的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存在的。这是一场革命，同属社会主义革命。只是形式低一点，从人民民主专政做起。

3、太行还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复辟后中国历史的大倒退，由于当政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多重阶级属性，由于专制制度的存在，大革命的第一阶段（即准备阶段）的政治目标或纲领，只能是推翻专制制度，争取人民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政治自由，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因为这个阶段革命的性质主要的还

是民主革命的性质，所以我们称之为人民民主革命，以区别于历史上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当然不是说，人民民主革命要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因为它实质上是无产阶级第二次社会主义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任何把这两个阶段既然分开，甚至对立起来的观点都是机械的、片面的、形而上学的思想观点。

当然，不能否认第一阶段的革命也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因为官僚资产阶级也是资产阶级，尽管它和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不同，有着明显的封建和买办的特点。这也正说明这场大革命的两个阶段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

这一段的论述，问题更多，也更大一点。因为涉及到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和纲领。

说“由于当政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多重阶级属性，由于专制制度的存在，大革命的第一阶段（即准备阶段）的政治目标或纲领，只能是推翻专制制度，争取人民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政治自由，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

这段话有几点不妥。

怎么叫多重阶级属性？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基本阶级属性就是资产阶级，任何一个阶级都会有特点，资产阶级也可以带上封建性，但是，基本的阶级属性只能是资产阶级的，很难说是多重的。这样说，会模糊这个阶级的基本阶级属性。任何事物总是由占主导地位的矛盾方面确定事物的性质的。

把推翻专制制度，夺取政权，从而成为统治阶级的革命称为大革命的第一阶段（即准备阶段），是不正确的。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政权在哪个阶级手里这一点是决定一切的，这是大家熟知的道理。怎么可以把这一斗争，称之为准备阶段？这不是准备阶段，这正是革命！百分之百的革命！

说“大革命的第一阶段（即准备阶段）的政治目标或纲领，只能是推翻专制制度，争取人民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政治自由，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因为这个阶段革命的性质主要的还是民主革命的性质，所以我们称之为人民民主革命”。这里的很多说法是不正确的。最大的问题在于，把我们进行推翻专制制度的革命，仅仅局限于是“争取人民民主和无产阶级政治自由”的革命，说“这个阶段革命的性质主要还是民主革命的性质”。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按照这里的说法，实际是把我们面临的历史任务仅仅规定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面临的历史任务，结果，自然就把我们面临的社会主义革命混淆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这里，人民民主革命的提法，是不正确的。同志们都知道一个常识，所谓“民主革命”，总是、就是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导师从来就是这样使用这一概念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从来不说无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为什么？道理很简单。无产阶级的革命，决不是仅仅争取民主的革命，而是，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从科学意义上来说，无产阶级革命最终是要实现民主的消亡的，这一点，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有明确的说明，他借用恩格斯的话说，“社会民主主义”这个党的名称“对于政治上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整个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党来说，这个词还是不确切的”。列宁指出，“民主愈完全，它成为多余的东西的时候就愈接近。”“民主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不是一个东西”。正是基于这个道理，无产阶级革命从来不会用民主革命来表达。哪怕是一个时期的口号，可以明确提出，我们要争取民主，但是，不能用“民主革命”来表达，就是“人民民主革命”也不对。当着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参加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都明确指出革命还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没有使用无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样的概念。

这是一个许多人常犯的错误，因而可以原谅。但是，作为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犯这样的理论错误到底还是不应该的。要想读懂马列毛的书，还要下功夫。

“推翻专制制度，争取人民民主和无产阶级政治自由，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对。但是，实现这一切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共产主义革命，虽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艰难的不断革命的过程。但是，这个目标和纲领是必须明确的，是不能称之为民主革命的。我们要夺取政权，要人民当家作主，但是，目标和纲领并不到此为止，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是最终目标和纲领。因此，把这种夺权斗争，称之为人民民主革命，是大革命的准备阶段，是完全错误的。这是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准备阶段，而是进行阶段，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夺权斗争阶段。推翻专制制度和夺取政权是统一的，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任务。

可以看出，这个提法的最大的问题，在于不敢举起社会主义这面旗帜，一场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革命，不提社会主义革命，而提人民民主革命，这二是不符合马列毛主义的理论，二是不符合我们面临的历史实际、历史任务，三是将会失去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也许是为了联合自由民主派资产阶级而不去惊动这个阶级，要是这样想，那错误就更大一点。看起来，这样提口号，也许会 and 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派达成暂时的联合，但是，这更会失去工农群众的支持，不要忘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基础和力量源泉，来自工农群众，一旦失去工农群众的支持，我们就没有资格和力量去和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派争夺革命的领导权。

以上太行所论，是太行大作的基本观点，可以说是太行大作的总纲。我讨论得多一点、细一点。下面太行的文字，都是一些具体问题。我就只简要地加几句评语说一说。我想，足够了。我的评语用黑体字。

一、“没有封建地主阶级就不存在人民民主革命”吗？

民主革命的任务是什么？是推翻封建专制制度，打倒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改变封建土地占有制，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变革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进而变革整个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

这里，一是推翻封建专制政权；二是变革封建生产关系；三是变革封建上层建筑。这三个任务是缺一不可的。除掉任何一项，都不能说是完整地、彻底地完成了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但是，这个革命本来的领导阶级——资产阶级是不能也不愿意完整地彻底地完成这个任务的，这是由于其反封建的不彻底性和妥协性决定的。从世界范围看，就中国这样一个经历了两千多年封建统治的国家来说，彻底地完成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的任务就显得更为沉重。

历史证明，资产阶级不是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更是这样，而只有愿意同一切私有制决裂的无产阶级才是最彻底的民主主义者。所以，历史上，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就只能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完成。

封建政权垮台了，地主阶级打倒了，封建生产关系废除了，上层建筑领域里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和封建习惯势力正在被清理。然而，由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走资本主义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矛盾的凸显，在上层建筑领域里铲除封建主义，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就只能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合并在一起了。

全国解放以后直至 1976 年，毛泽东始终都没有忘记领导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同被打倒的、时刻梦想变天复辟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斗争，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反对封、资、修的激烈斗争，批林批孔运动等等，这些已为大家熟知。这些斗争，准确地说，尤其是思想文化等上层建筑领域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实质上也是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补充和完善。

这是对的。这是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长期的历史任务。从马到列到毛主席，都是这样说的，没有纯粹的历史现象，社会主义革命继续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未完成的历史任务，正常。但是，这是社会主义继续革命。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继续，相反，资产阶级常常会把旧的反动的落后的东西复活起来。

1976.10.6 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以后，历史发生了大倒退。随着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重新被扶植起来，打着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旗号的封建官僚专制体制也死灰复燃，种种封建主义的东西也在政治和文化等上层建筑领域严重回潮。关于这一点，我已经在过去的文章里做过说明。而“马列毛主义战士”也在他的文章里作了具体论述。

但是，这些都是从属于最坏的资本主义，一旦，重建社会主义，这又从属于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历史任务。

我们暂且不论是否还有一个地主阶级的问题（这一点下面会谈到的），我想和清源等同志先搞清楚，当前中国有没有专制制度存在的问题？

“什么是专制制度？专制制度（专制政体，无限君主制）是一种最高权力完全地整个地（无限制地）由沙皇一人独占的管理形式。沙皇颁布法律，任命官吏，搜刮和挥霍人民的钱财，人民对立法和监督管理一概不得过问。因此，专制制度就是官吏和警察专权，而人民无权。”《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1899 年底）

载于 1924 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 8—9 期合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第 4 卷第 240—273 页

这不是非常符合当今中国的政治现实吗？“沙皇一人独占”和“垂帘听政”、“退休了还幕后主政”、“一人为主，六人（或八人）配合的一个大官僚集团独占”有什么区别？

专制制度的存在是封建政治的典型特征。如果清源同志非要把人民被官吏和警察捆住手脚，堵住嘴不许说话，说成是资本专制，而不是封建专制，那就说明是他把基本概念搞混了。固然这两种专制都是在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不许人民群众起来造反，而且和社会主义的人民专制相比，它们都是落后的，反动的。但是，历史地看，辩证地看，资本专制比封建专制进步，资产阶级民主比封建式“民主”（例如大臣宫廷议事）进步，这难道可以否定吗？一个是锁住你的手脚，堵住你的嘴，人民没有丝毫的民主权利；一个是允许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有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罢工的权力，哪一个更好些呢？

三十多年来，官僚资产阶级统治集团不仅残酷地镇压、迫害了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上千万无产阶级优秀分子，而且把后来反抗他们反动统治的以 MG 为代表的一切革命者，以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罪的名义投入监狱。为防止人民大起义，把国防军裁编为武警部队，和庞大的公安部队一起“维稳”，致使国家对付老百姓的“维稳”费用超过了国防军费的开支。对上访群众设立黑监狱，甚至连人民纪念毛泽东的群众活动也被宣布为“非法”，还把带头者抓去劳教。

对工人反对资本家的罢工和每年数万起群众维权运动进行无情打压，对一切试图维护民权的人进行迫害。…

这里，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为了使人民不能反抗，连宪法上明文规定的、一般资本主义国家都允许的那些最基本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罢工等民主权利也取消了。这等于把人民的手脚束缚起来，把他们的嘴堵住，只许压迫，不许反抗。更令人嗤之以鼻的是，这个拥有几百万强大军事武装力量的统治者竟然会害怕几个小小的红色网站，动辄封网封频道，封闭旗帜网、马评网和红色中国网等为代表的十几个红色网站至今一年还不敢开通。足足暴露出其反动腐朽怯懦的专制本性。

请问，在这样一个对人民实行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的专制国家里，推翻专制制度难道不是人民民主革命的任务吗？置言之，不需要进行一场推翻专制制度的人民民主革命吗？

当今中国，看一个人是不是革命的，关键要看他对官僚资产阶级专制统治的态度。凡是以各种方式坚决反对这个封建法西斯专制统治的，他就是站在了无产阶级和革命的人民群众一边。反之，以各种方式维护这个专制统治的，他就站在了反共反人民的官僚资产阶级一边，而不管他口头上怎样地标榜自己。

这里的要害问题在于，太行不承认资产阶级有个法西斯专政的问题。这是直接违背主席教导的。主席明确说，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就会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就会搞资本主义复辟，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主席用希特勒比戴高乐坏，生动地准确地告诉我们有一个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的问题。怎么一说专制，就只有封建专制呢？中国自先秦商周（夏资料不够），就是专制政体，那时，还没有进入地主制社会呢。

我们就封建主义在政治和文化等上层建筑领域严重回潮，或封建主义的东西在社会中普遍存在这个问题进行分析，是否还有一个人民民主革命的任务？

清源同志把我们举出的大量事例，说成只是一种封建形式的回归，而不是封建内容的回复（这种把形式和内容割裂开来分析事物的方法表明了他长期错误的思维方式，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内容），那么，请问：

如果说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竖起孔夫子雕像只是封建形式回归的话，那么，特色党在国内和世界各地办孔子学院，传播儒经是什么？

如果年年举办大型祭孔活动，在某些学校举行孔子拈笔礼只是封建形式的话，那么打着弘扬国学的旗号，提倡尊孔读经，对幼儿园的儿童都倡导背“三字经”、“弟子规”是什么？

如果大修庙宇求神拜佛之风仅仅是形式的话，那么，银幕上连篇累牍的所谓历史剧，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充斥舞台，传播的又是什么内容？

如果“弱势群体”们为了维权而求“清官”为“民”做主只是形式的回归的话，那么，接连发生的访民集体下跪事件，表现的是否国民潜意识中根深蒂固的“青天大老爷”和“我等小民”的封建奴性心理？

二十世纪末“新慈禧”垂帘听政丑剧的上演，军事大司马自封核心以“枪指挥党”，接二连三废黜党国最高领导人，指定甚至隔代指定接班人，这些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垄断大资产阶级都难以办到的，在这个有特色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却成为现实。这体现的是资本专制吗？所以，我们说官僚资产阶级专制是封建性的专制难道不是事实吗？

要看到，之所以官僚资产阶级能够复辟三十多年没被推翻，与封建特色专制制度的恢复和封建理念对国民意识的深层影响有着重要的关联。这样看来，在一个“没有封建地主阶级的”社会里，同样也有一个人民民主革命的任务。

如果那些严重影响国民意识的封建旧思想、旧文化、旧习惯不在革命的过程中抛弃掉，人民群众中的民主意识不能再次激发出来，人民群众中社会主义的民主思想就难以树立，社会主义革命也就会向后延迟。

这里，太行对清源同志形式和内容说法的批评意见，我同意。主要是封建思想文化的复辟。既有形式，也有内容。二者统一。但是，我们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继续革命就是要扫除这些封建余毒，把反封建反迷信的斗争继续进行下去。这正是我国社会主义再革命的历史任务，而不是人民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

二、封建地主阶级的隐形转化。

党的“十大”《政治报告》早就预言：如果刘、林一类上台复辟资本主义，必然要把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重新扶植起来。修正主义的法西斯党，就会对中国人民实行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

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个科学的论断完全符合我国阶级斗争的实际。

三十多年过去了，被重新扶植起来的旧的地主阶级成员基本上死光了。但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这一点马列毛主义战士已经在他的《与清源同志商榷——今天的中国是否存在残存的封建地主阶级？》一文中讲清楚了。

虽然是“残存”，但是能量不可低估。因为这个被打倒三十年后又重新被扶植起来的反动阶级有着广泛的厚重的思想和政治文化基础，党国的政权机构里还有他们的政治代理人。所以他们的政协委员敢于公开在政协会议上提议恢复封建帝制，不久前互联网上还有署名“爱新觉罗氏”的，要为封建皇帝家族翻案等等。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还应该注意到，复辟以后，这个曾经向原来的农会和党的基层干部反攻倒算的反动阶级，又把他们的政治希望寄托到了打着共产党旗号的当政的官僚资产阶级身上。这不仅是因为这个官僚资产阶级集团推行了一条符合他们阶级利益的路线，而且这个集团内的许多成员本身就出身于地主阶级，他们的总头子邓小平就是出身于官僚大地主家庭。当初，他们这些人参加民主革命并不是为了什么共产主义，他们“思想上并没有入党。他们的世界观还没有跳出小生产的圈子。”“他们加入共产党，为无产阶级办事，不过是为了抬高自己这个商品的等级，不过是为了向无产阶级要高价。”

合作化时期，他们就听从他们的地主老子的意见反对农村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文革时期，他们对自己的地主老子接受贫下中农的批判怀恨在心。现在，他们这个在文革中被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打倒在地上的阶级复辟了，于是，对文革和造反派彻底的清算就开始了。解散人民公社，让贫下中农“一夜退回解放前”，重走一家一户单干的老路，美其名曰“联产承包责任制”，而且一包三十年不变。工业上，以企业改制为名，强制毛泽东共产党建立培养起来的对社会主义制度充满热爱的五千万工人大军统统下岗、失业，这种疯狂的阶级报复也便顺理成章了。这里，我们分明听到了被扶植起来的地主阶级那咬牙切齿的声音：你们这些穷鬼，分了我的地，想搞社会主义，没门儿！

然而，这个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治代理人，虽然敢于借口“资本主义还没有在中国得到充分发展”，而“补资本主义的课”，甚至把

新生资本家封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拉入党内。却怎么也不敢让被打倒的地主阶级再次光明正大地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因为他们也害怕否定自己执政的合法性，只能用新的更隐蔽的方法掩盖他们的罪恶目的。这就是农村没有再出现地主土地占有制的根本原因。

为了搞清这一点，不得不看一看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农业生产关系的区别。我们知道，封建社会的农业生产关系，只涉及地主和农民两个阶级。地主靠地租剥削农民，不借助于劳动力的买卖。封建地租吞没了农民的全部剩余产品。

而资本主义的农业关系则涉及土地所有者、农业资本家（或租地农场主）、农业雇佣工人三个阶级。土地所有者和农业资本家共同剥削农业工人的剩余价值。有些农场的土地所有者和农业资本家是同一个人。于是这位一身二任的剥削者对农业工人进行了双重的剥削：先是以农业资本家的身份剥削一次，然后又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剥削一次。

以上就是资本主义农业与封建农业关系的根本区别。存不存在地租剥削形式，有没有农业资本家（农场主）和失去土地专以为农业资本家打工为生的雇佣农业工人，是基本的标志。

资本主义复辟后，中国农业的生产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已经普遍形成了农业资本家和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农业工人这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吗？

地租形式的剥削消灭了吗？

在中国农业中，随着允许土地流转政策的颁布，农场主（农业资本家）和农业工人还刚刚产生。几亿农民的大多数仍然是靠租用国家（集体）土地为生，尽管其中一部分在农闲时可以外出打工以资养家。

农民依靠艰辛的劳动在承包的土地上获得的粮食，除下自己的食粮，必须缴公粮。多余的部分可以作为余粮卖给“国家”，价格低自不必说，主要是不能得到现钱，只能拿到一张不知何时才能对兑现的“白条子”。加上农用工业品价格连年上涨，自下而上的沉重剥削逼得广大农民发出了“中国就缺陈胜吴光了！”的呼声。全国各地不断发生农民起来抗粮抗捐的事件，统治阶级就要坐不稳了，连老谋深算的陈云也不得不惊呼“谷贱伤农”。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2003年以后，胡温政权对反抗日益激烈的广大农民做了妥协，被迫取消农业税，不再让农民交粮租，每亩地给点补助的原因。但是，很快，化肥、种子、农药等农用品价格的飞涨就抵消了农民从统治者的妥协那里得到的部分好处。

剥削阶级是不会改变他的剥削本性的。几亿农民不用再“交皇粮”了，真是天大的好事！但是，官僚资产阶级这个大土地所有者是不会也不甘心这么下去，让农民白白地使用土地的，况且还要给补助。于是，他们开始在土地问题上做起了文章。

以招商引资发展工业搞“开发区”为名，用低廉的价格大肆侵吞占用农村土地，以房地产开发为名，在城乡大搞“拆迁”，把大片大片的土地卖给富豪建别墅，搞起了“土地财政”。最近又提出的全国农村城镇化，把农民赶上楼，则是为了把这种“土地财政”推到它的顶端。

问题很清楚，这个以“国家”名义出现的官僚资产阶级，它的从中央到地方的相关机构，各级政府的一、二把手和有关负责人，直到农村支部书记、村长，成了实际上的大大小小的土地所有者——“地主”。土地的使用、开发、

出租、转让、出售等都是他们说了算，广大的农民是没有权利的。这就是广东乌坎和全国许多地方发生农民抗暴的根本原因。

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候，失去土地的农民转化为工业雇佣工人和农业雇佣工人，而一部分地主则转化为土地所有者或农业资本家。

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后，还保持着原来的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关系吗？答案是否定的。

农业已经改变为农业工人向农业资本家（农场主）出卖劳动力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了吗？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也还是最近几年的事情，而且没有普遍性。

中国农业究竟属于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呢？

农民还是在租用国家（集体）的土地上辛勤耕作的农民。公开的私人占有大面积土地的“地主”，被那些戴着红帽子的各级政权机关中的官僚分子代替了。

老的地主阶级死了，新的“地主”阶级产生了，他们就是打着共产党旗号的兼有大土地所有者（大地主）身份的官僚资产阶级统治集团，而且这个集团中的许多官僚资产阶级分子本身就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

问题在于，我们很多左派同志通常习惯把这个以“国家”名义出现的大土地所有者，也当做超阶级的“国家”，而看不清这个以“国家”名义出现的大土地所有者的阶级面目。他们和广大农民的关系，实际上还没有脱离封建农业生产关系中地主和农民的关系。对于复辟后再次被扶植起来的地主阶级发生的这种隐形转化，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同志忽略了这一点。

今年年初的中央一号文件，实际上是推进中国农业资本主义化进程的号令。所谓“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等等，不过是为了进行新的“圈地运动”，夺取农民租用的土地，使他们变成失掉土地为农业资本家打工的农业雇佣工人罢了。

农村最初的责任制，实际还是复辟、发展小农资本主义经济。直到今年的一号文件，对农村的经济改革还是拿不出办法。在这四十年的改开过程中，农村的问题是和全国的资本主义复辟相统一的。至于这里所揭露的许多问题，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必然产物，实质还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农民的剥削。这还不能概括为封建生产关系的复辟，所以，文中也没有明确这样说，也的确不好随意下结论，因为这关系到革命的对象和革命的斗争方向、斗争策略。这是必须非常慎重的，前提是必须正确分析农村经济关系。

另外，不要忘记，在宏观考察全国问题时，工业农业相比，工业占主导，城市农村相比，城市占主导。

三、如何确定革命第一阶段的性质？

这是由当前阶段的社会性质、革命主要对象的性质以及革命任务的性质所决定的。

前面，我们已经搞清楚：一，即使没有一个封建地主阶级，中国也还有推翻专制制度并在上层建筑领域铲除封建主义的政治、思想和文化的民主革命的任务；二，资本主义复辟后被扶植起来的地主阶级已经隐形转化为新的大土地所有者（地主）——官僚资产阶级，他们可以随意支配土地，中国农业还在一

定程度上保留着封建生产关系。因此，打倒这个大土地所有者也同样是民主革命的任务。

就是说，上述革命任务还都属于民主革命的性质

由于第一阶段的主要革命对象—官僚资产阶级，既有封建地主阶级的属性，也有官僚买办阶级的属性，自身又是垄断资产阶级，所以，打倒官僚资产阶级的革命不仅有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政治意义，也有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意义。换句话说，革命不仅是民主革命的性质，也带有一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那种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截然分为两体的观点是错误的，不符合事实的。试问，官僚资产阶级集团的主要成员中，哪一个不是和美帝国主义、国际资本财团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的联系？

這裡的論述，只能證明我們在進行社會主義再革命的過程中，會必然地附帶繼續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沒有完成的歷史任務，也包括清除資本主義復辟四十年中封建思想文化的死灰復燃。

有人就这场严肃的政治争论向他们认为的“民主革命论者”（即所谓的“二次革命论者”）发出了下面的通牒：“民主革命论”者如不能正面回应以下问题，就免谈了。

关于当前关于当前无产阶级面临的是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探讨和争论，……现在，这个探讨和争论已经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事实上已经争论的很清楚了。为了不至于老是拘泥于这个问题的争论而妨碍了其他方面的工作，请主张搞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论者正面回应以下问题，如果不能正面回应，就免谈了。（注意：这些问题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旗帜、纲领、路线等方面的重大原则问题，这里不涉及策略问题）

1、社会的性质

社会主义革命论者：资本主义的性质。

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论者：

2、社会的主要矛盾

社会主义革命论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

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论者：

3、革命的性质

社会主义革命论者：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

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论者：

4、革命的对象

社会主义革命论者：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论者：

5、革命的前途

社会主义革命论者：无产阶级专政。

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论者：

6、革命的动力阶级

社会主义革命论者：无产阶级和包括小资产阶级（劳动阶级，不是小资本家阶级）在内的其他劳动阶级。

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论者：

作为无产阶级不断革命和革命阶段统一论者，即马列毛主义无产阶级革命论者，只好奉命答卷。

1、当今社会的性质

社会主义革命论者：资本主义的性质：

马列毛主义无产阶级革命论者：

当今中国社会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官僚资本主义或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前一种说法没有指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个别性），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大忌，无产阶级的理论越切合实际，越有针对性，越好。

同意后者。

2、社会的主要矛盾

社会主义革命论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

马列毛主义无产阶级革命论者：

前一种说法本身没错。但是没有指出在官僚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矛盾的焦点。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广大人民群众与一小撮官僚资产阶级的矛盾，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当前社会条件下的集中表现。

大体同意后者。

3、革命的性质

社会主义革命论者：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

马列毛主义无产阶级革命论者：

总体上，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第二次社会主义大革命。其中，第一阶段的革命斗争主要是人民民主革命的性质，但一定程度上也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

我认为是重建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再革命。

4、革命的对象

社会主义革命论者：资产阶级。

马列毛主义无产阶级革命论者：

中国无产阶级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革命第一阶段，也就是当前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当时占全国人口百分之零点四左右的官僚资产阶级，这是我们当前最主要的敌人。

我认为在政治和经济政策上，还应更有更广泛的统一战线策略。

5、革命的前途

社会主义革命论者：无产阶级专政。

马列毛主义无产阶级革命论者：

重建共产党，重建无产阶级专政，重建社会主义制度。

重建新型的人民民主专政。

6、革命的动力阶级

社会主义革命论者：无产阶级和包括小资产阶级（劳动阶级，不是小资本家阶级）在内的其他劳动阶级。

马列毛主义无产阶级革命论者：

上面说法与“社会主义革命论者”前述：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自相矛盾的。小资产阶级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动力。但是，在第一阶段反对官僚资产阶级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它和其他劳动阶级一样是革命的动力。

正确的说法是：为了推翻专制制度，重建人民民主，必须建立一个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最广泛的革命民主统一战线。一切主张打倒官僚资产阶级专制统治的阶级、阶层和政治派别都是我们团结、联合或利用的力量，哪怕这种联合或利用只是暂时的，有条件的。

我认为社会主义再革命的主要阶级力量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站在工农

一边的革命知识分子。至于统一战线力量组合，以现实的实际状况为出发点，例如，在进行争取民主的斗争时，可以联合自由民主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总之，中国无产阶级进行的第二次社会主义大革命第一阶段的任务，是一个打倒官僚资产阶级，推翻专制制度的人民民主革命的任务。目的是废除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争取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力和政治自由，重建人民民主专政。关于反对专制问题，“九天揽月”同志已在他的《谈“打倒专制”》一文中作了详尽的论述。这里不再重复。

最后，让我们一起学习列宁的教导：“为什么推翻专制制度应该是俄国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呢？这是因为在专制制度下，工人阶级不能广泛地展开自己的斗争，无论在经济方面或政治方面都不能夺取任何巩固的阵地，不能建立巩固的群众性的组织，不能在全体劳动群众面前举起社会革命的旗帜，也不能教会他们为社会革命而斗争。只有争得了政治自由，整个工人阶级才能坚决地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这个斗争的最终目的就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组织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争得了政治自由，只有广泛地展开群众性的斗争，俄国工人阶级才能建立争取社会主义最终胜利所必需的组织。”

今天，重温列宁的教导，我们感到那样的真切，不是非常符合我国当前的斗争实际吗？

不。历史条件和当年的俄国完全不同了。

一切愿意在中国进行第二次社会主义大革命的同志，是统一我们认识的时候了！统一了革命理论，统一了思想认识，下一步干什么大家是心照不宣的。坚定地迈开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推翻专制制度，争取政治自由！

反对修正主义上台带来的资本主义复辟的苦难，反对修正主义上台带来的法西斯资产阶级残酷专政，掀起社会主义再革命运动，重建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让人民重新过上社会主义的美好生活！

2013年8月1日

2019年2月24日评论

附录：

这是今年二月笔者发表在《红旗网》上的一篇文章。现再次发出，以期和一切关心中国革命的同志深入探讨，取得共识，携手并进。

太行玉笛

2013年8月1日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 推翻专制制度，争取政治自由

太行玉笛

把马列毛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再声明：

针对中国这样一个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又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国家，由于现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性质，由于复辟后当政的官僚资产阶级集团对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实行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中国依然存在封建特色的专制制度，分析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各社会阶级的现状，可以而且应该得出结论：中国无产阶级旨在重建共产党、重建无产阶级专政、重建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二次社会主义大革命需要分两步走。第一，推翻官僚专制制度，重建无产阶级为主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第二，在达到上述革命目标的基础上，不停顿、有步骤地进入以消灭私有制、消灭整个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为目的的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这是汲取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经验，把马列毛主义和当前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政治主张。是坚持马列毛主义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的辩证统一论的正确革命主张。

由于资本主义复辟后中国历史的大倒退，由于当政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多重阶级属性，由于专制制度的存在，大革命的第一阶段（即准备阶段）的政治目标或纲领，只能是推翻专制制度，争取人民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政治自由，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因为这个阶段革命的性质主要的还是民主革命的性质，所以我们称之为人民民主革命，以区别于历史上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当然不是说，人民民主革命要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因为它实质上是无产阶级第二次社会主义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任何把这两个阶段既然分开，甚至对立起来的观点都是机械的、片面的、形而上学的思想观点。

当然，不能否认第一阶段的革命也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因为官僚资产阶级也是资产阶级，尽管它和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不同，有着明显的封建和买办的特点。这也正说明这场大革命的两个阶段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

随着争论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革命派同志逐步认清了这一攸关革命的重大政治战略问题，同时也对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当前革命的主要对象、无产阶级应该团结（或联合、利用）哪些力量尽快形成最广泛的反专制革命民主统一战线等问题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遗憾的是，至今仍有那么一部分人，主要是以清源同志为代表的以最最革命面目出现的几个“革命派”，不仅不接受这种正确的主张，反而对之大肆攻击乃至谩骂。把坚持正确革命主张的同志打成“否定无产阶级革命”的“二次革命论者”，攻击他们是“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搞左右合流”的“民猪”，是“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等等。这些，通过一个时期以来在红旗网上发表并被置顶的许多文章以及跟帖已经得到了最好的证明。

这场由大风、工弩等同志关于中国需要一场人民民主革命的主张而引起的革命派内部的争论，在沙海之舟、红军万岁、田木、铁心兰兰、重山重水等同志论述人民民主问题的文章发表后显得异常激烈。去年年末到今年年初，在袁庾华、高居矛、八角楼、马门诺夫、轩辕义工和“马列毛主义战士”等关于人民民主革命的文章发表后，这种争论再次进入了高潮。并遭到几个“革命派”的猛烈攻击和谩骂。

事实上，大风同志在他 2011-11-22 发表的《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捷径》一文就强调并且准确地预言：中国的资产阶级先天不足后天软弱，只能夭亡，不会成“形”。就是在今天官二代、富二代的太子党中也挑选不出来几个像样的

领军人物，背着沉重包袱的薄熙来最终也只能发出“时不利兮骓不逝”、“奈我何”的哀叹。因此，中国的革命只能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能走向成功。

究竟是那些最最革命的“革命派”们没有看到呢，还是看到了也不愿承认呢？

马列毛主义者是从来不怕争论，不怕革命队伍内部的思想斗争的，更讥笑那些粗暴的无能的攻击和谩骂。他们认为，正确的思想只能在同错误思想的斗争中才能渐渐发展和树立起来。因为马列毛主义自身就是在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正如恩格斯所说：“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谁要是象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做的斗争比其他任何人所做的斗争都多（因为我们把资产阶级只当作一个阶级来看待，几乎从来没有去和资产者个人交锋），那他对爆发不可避免的斗争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五卷 380 页）

那么，1、中国还需要不需要进行一场人民民主革命，也就是说还存在不存在民主革命的任务？真的如清源同志所说，“没有封建地主阶级，就不存在人民民主革命”吗？

2、资本主义在我国复辟以后，被重新扶植起来的地主阶级到哪里去了？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还存在不存在封建主义的东西？

3、如何确定革命第一阶段的性质？

这些都是争论的双方都不能回避的问题。我们首先分析第一个问题。

一、“没有封建地主阶级就不存在人民民主革命”吗？

民主革命的任务是什么？是推翻封建专制制度，打倒地主的反动统治，改变封建土地占有制，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变革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进而变革整个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

这里，一是推翻封建专制政权；二是变革封建生产关系；三是变革封建上层建筑。这三个任务是缺一不可的。除掉任何一项，都不能说是完整地、彻底地完成了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但是，这个革命本来的领导阶级——资产阶级是不能也不愿意完整地彻底地完成这个任务的，这是由于其反封建的不彻底性和妥协性决定的。从世界范围看，就中国这样一个经历了两千多年封建统治的国家来说，彻底地完成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的任务就显得更为沉重。

历史证明，资产阶级不是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更是这样，而只有愿意同一切私有制决裂的无产阶级才是最彻底的民主主义者。所以，历史上，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就只能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完成。

封建政权垮台了，地主阶级打倒了，封建生产关系废除了，上层建筑领域里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和封建习惯势力正在被清理。然而，由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走资本主义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矛盾的凸显，在上层建筑领域里铲除封建主义，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就只能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合并在一起了。

全国解放以后直至 1976 年，毛泽东始终都没有忘记领导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同被打倒的、时刻梦想变天复辟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斗争，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反对封、资、修的激烈斗争，批林批孔运动等

等，这些已为大家熟知。这些斗争，准确地说，尤其是思想文化等上层建筑领域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实质上也是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补充和完善。

1976. 10. 6 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以后，历史发生了大倒退。随着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重新被扶植起来，打着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旗号的封建官僚专制体制也死灰复燃，种种封建主义的东西也在政治和文化等上层建筑领域严重回潮。关于这一点，我已经在过去的文章里做过说明。而“马列毛主义战士”也在他的文章里作了具体论述。

我们暂且不论是否还有一个地主阶级的问题（这一点下面会谈到），我想和清源等同志先搞清楚，当前中国有没有专制制度存在的问题？

“什么是专制制度？专制制度（专制政体，无限君主制）是一种最高权力完全地整个地（无限制地）由沙皇一人独占的管理形式。沙皇颁布法律，任命官吏，搜刮和挥霍人民的钱财，人民对立法和监督管理一概不得过问。因此，专制制度就是官吏和警察专权，而人民无权。”《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1899 年底）载于 1924 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 8—9 期合刊，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第 4 卷第 240—273 页

这不是非常符合当今中国的政治现实吗？“沙皇一人独占”和“垂帘听政”、“退休了还幕后主政”、“一人为主，六人（或八人）配合的一个大官僚集团独占”有什么区别？

专制制度的存在是封建政治的典型特征。如果清源同志非要把人民被官吏和警察捆住手脚，堵住嘴不许说话，说成是资本专制，而不是封建专制，那就说明是他把基本概念搞混了。固然这两种专制都是在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不许人民群众起来造反，而且和社会主义的人民专制相比，它们都是落后的，反动的。但是，历史地看，辩证地看，资本专制比封建专制进步，资产阶级民主比封建式“民主”（例如大臣宫廷议事）进步，这难道可以否定吗？一个是锁住你的手脚，堵住你的嘴，人民没有丝毫的民主权利；一个是允许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有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罢工的权力，哪一个更好些呢？

三十多年来，官僚资产阶级统治集团不仅残酷地镇压、迫害了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上千万无产阶级优秀分子，而且把后来反抗他们反动统治的以 MG 为代表的一切革命者，以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罪的名义投入监狱。为防止人民大起义，把国防军裁编为武警部队，和庞大的公安部队一起“维稳”，致使国家对付老百姓的“维稳”费用超过了国防军费的开支。对上访群众设立黑监狱，甚至连人民纪念毛泽东的群众活动也被宣布为“非法”，还把带头人抓去劳教。对工人反对资本家的罢工和每年数万起群众维权运动进行无情打压，对一切试图维护民权的人进行迫害。…

这里，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为了使人民不能反抗，连宪法上明文规定的、一般资本主义国家都允许的那些最基本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罢工等民主权利也取消了。这等于把人民的手脚束缚起来，把他们的嘴堵住，只许压迫，不许反抗。更令人嗤之以鼻的是，这个拥有几百万强大军事武装力量的统治者竟然会害怕几个小小的红色网站，动辄封网封频道，封闭旗帜网、马评网和红色中国网等为代表的十几个红色网站至今一年还不敢开通。足足暴露出其反动腐朽怯懦的专制本性。

请问，在这样一个对人民实行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的专制国家里，推翻专制制度难道不是人民民主革命的任务吗？置言之，不需要进行一场推翻专制制度的人民民主革命吗？

当今中国，看一个人是不是革命的，关键要看他对官僚资产阶级专制统治的态度。凡是以各种方式坚决反对这个封建法西斯专制统治的，他就是站在了无产阶级和革命的人民群众一边。反之，以各种方式维护这个专制统治的，他就站在了反共反人民的官僚资产阶级一边，而不管他口头上怎样地标榜自己。

我们就封建主义在政治和文化等上层建筑领域严重回潮，或封建主义的东西在社会中普遍存在这个问题进行分析，是否还有一个人民民主革命的任务？

清源同志把我们举出的大量事例，说成只是一种封建形式的回归，而不是封建内容的回复（这种把形式和内容割裂开来分析事物的方法表明了他长期错误的思维方式，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内容），那么，请问：

如果说在天门广场东侧竖起孔夫子雕像只是封建形式回归的话，那么，特色党在国内和世界各地办孔子学院，传播儒经是什么？

如果年年举办大型祭孔活动，在某些学校举行孔子拈笔礼只是封建形式的话，那么打着弘扬国学的旗号，提倡尊孔读经，对幼儿园的儿童都倡导背“三字经”、“弟子规”是什么？

如果大修庙宇求神拜佛之风仅仅是形式的话，那么，银幕上连篇累牍的所谓历史剧，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充斥舞台，传播的又是什么内容？

如果“弱势群体”们为了维权而求“清官”为“民”做主只是形式的回归的话，那么，接连发生的访民集体下跪事件，表现的是否国民潜意识中根深蒂固的“青天大老爷”和“我等小民”的封建奴性心理？

二十世纪末“新慈禧”垂帘听政丑剧的上演，军事大司马自封核心以“枪指挥党”，接二连三废黜党国最高领导人，指定甚至隔代指定接班人，这些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垄断大资产阶级都难以办到的，在这个有特色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却成为现实。这体现的是资本专制吗？所以，我们说官僚资产阶级专制是封建性的专制难道不是事实吗？

要看到，之所以官僚资产阶级能够复辟三十多年没被推翻，与封建特色专制制度的恢复和封建理念对国民意识的深层影响有着重要的关联。这样看来，在一个“没有封建地主阶级的”社会里，同样也有一个人民民主革命的任务。如果那些严重影响国民意识的封建旧思想、旧文化、旧习惯不在革命的过程中抛弃掉，人民群众中的民主意识不能再次激发出来，人民群众中社会主义的民主思想就难以树立，社会主义革命也就会向后延迟。

二、封建地主阶级的隐形转化。

党的“十大”《政治报告》早就预言：如果刘、林一类上台复辟资本主义，必然要把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重新扶植起来。修正主义的法西斯党，就会对中国人民实行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

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个科学的论断完全符合我国阶级斗争的实际。

三十多年过去了，被重新扶植起来的旧的地主阶级成员基本上死光了。但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这一点马列毛主义战士已经在他的《与清源同志商榷——今天的中国是否存在残存的封建地主阶级？》一文中讲清楚了。

虽然是“残存”，但是能量不可低估。因为这个被打倒三十年后又重新被扶植起来的反动阶级有着广泛的厚重的思想和政治文化基础，党国的政权机构里还有他们的政治代理人。所以他们的政协委员敢于公开在政协会议上提议恢复封建帝制，不久前互联网上还有署名“爱新觉罗氏”的，要为封建皇帝家族翻案等等。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还应该注意，复辟以后，这个曾经向原来的农会和党的基层干部反攻倒算的反动阶级，又把他们的政治希望寄托到了打着共产党旗号的当政的官僚资产阶级身上。这不仅是因为这个官僚资产阶级集团推行了一条符合他们阶级利益的路线，而且这个集团内的许多成员本身就出身于地主阶级，他们的总头子邓小平就是出身于官僚大地主家庭。当初，他们这些人参加民主革命并不是为了什么共产主义，他们“思想上并没有入党。他们的世界观还没有跳出小生产的圈子。”“他们加入共产党，为无产阶级办事，不过是为了抬高自己这个商品的等级，不过是为了向无产阶级要高价。”

合作化时期，他们就听从他们的地主老子的意见反对农村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文革时期，他们对自己的地主老子接受贫下中农的批判怀恨在心。现在，他们这个在文革中被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打倒在地的阶级复辟了，于是，对文革和造反派彻底的清算就开始了。解散人民公社，让贫下中农“一夜退回解放前”，重走一家一户单干的老路，美其名曰“联产承包责任制”，而且一包三十年不变。工业上，以企业改制为名，强制毛泽东共产党建立培养起来的对社会主义制度充满热爱的五千万工人大军统统下岗、失业，这种疯狂的阶级报复也便顺理成章了。这里，我们分明听到了被扶植起来的地主阶级那咬牙切齿的声音：你们这些穷鬼，分了我的地，想搞社会主义，没门儿！

然而，这个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治代理人，虽然敢于借口“资本主义还没有在中国得到充分发展”，而“补资本主义的课”，甚至把新生资本家封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拉入党内。却怎么也不敢让被打倒的地主阶级再次光明正大地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因为他们也害怕否定自己执政的合法性，只能用新的更隐蔽的方法掩盖他们的罪恶目的。这就是农村没有再出现地主土地占有制的根本原因。

为了搞清这一点，不得不看一看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农业生产关系的区别。

我们知道，封建社会的农业生产关系，只涉及地主和农民两个阶级。地主靠地租剥削农民，不借助于劳动力的买卖。封建地租吞没了农民的全部剩余产品。

而资本主义的农业关系则涉及土地所有者、农业资本家（或租地农场主）、农业雇佣工人三个阶级。土地所有者和农业资本家共同剥削农业工人的剩余价值。有些农场的土地所有者和农业资本家是同一个人。于是这位一身二任的剥削者对农业工人进行了双重的剥削：先是以农业资本家的身份剥削一次，然后又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剥削一次。

以上就是资本主义农业与封建农业关系的根本区别。存不存在地租剥削形式，有没有农业资本家（农场主）和失去土地专以为农业资本家打工为生的雇佣农业工人，是基本的标志。

资本主义复辟后，中国农业的生产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已经普遍形成了农业资本家和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农业工人这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吗？

地租形式的剥削消灭了吗？

在中国农业中，随着允许土地流转政策的颁布，农场主（农业资本家）和农业工人还刚刚产生。几亿农民的大多数仍然是靠租用国家（集体）土地为生，尽管其中一部分在农闲时可以外出打工以资养家。

农民依靠艰辛的劳动在承包的土地上获得的粮食，除下自己的食粮，必须缴公粮。多余的部分可以作为余粮卖给“国家”，价格低自不必说，主要是不能得到现钱，只能拿到一张不知何时才能对兑现的“白条子”。加上农用工业品价格连年上涨，自下而上的沉重剥削逼得广大农民发出了“中国就缺陈胜吴光了！”的呼声。全国各地不断发生农民起来抗粮抗捐的事件，统治阶级就要坐不稳了，连老谋深算的陈云也不得不惊呼“谷贱伤农”。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2003年以后，胡温政权对反抗日益激烈的广大农民做了妥协，被迫取消农业税，不再让农民交粮租，每亩地给点补助的原因。但是，很快，化肥、种子、农药等农用品价格的飞涨就抵消了农民从统治者的妥协那里得到的部分好处。

剥削阶级是不会改变他的剥削本性的。几亿农民不用再“交皇粮”了，真是天大的好事！但是，官僚资产阶级这个大土地所有者是不会也不甘心这么下去，让农民白白地使用土地的，况且还要给补助。于是，他们开始在土地问题上做起了文章。

以招商引资发展工业搞“开发区”为名，用低廉的价格大肆侵吞占用农村土地，以房地产开发为名，在城乡大搞“拆迁”，把大片大片的土地卖给富豪建别墅，搞起了“土地财政”。最近又提出的全国农村城镇化，把农民赶上楼，则是为了把这种“土地财政”推到它的顶端。

问题很清楚，这个以“国家”名义出现的官僚资产阶级，它的从中央到地方的相关机构，各级政府的一、二把手和有关负责人，直到农村支部书记、村长，成了实际上的大大小小的土地所有者——“地主”。土地的使用、开发、出租、转让、出售等都是他们说了算，广大的农民是没有权利的。这就是广东乌坎和全国许多地方发生农民抗暴的根本原因。

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候，失去土地的农民转化为工业雇佣工人和农业雇佣工人，而一部分地主则转化为土地所有者或农业资本家。

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后，还保持着原来的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关系吗？答案是否定的。

农业已经改变为农业工人向农业资本家（农场主）出卖劳动力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了吗？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也还是最近几年的事情，而且没有普遍性。

中国农业究竟属于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呢？

农民还是在租用国家（集体）的土地上辛勤耕作的农民。公开的私人占有大面积土地的“地主”，被那些戴着红帽子的各级政权机关中的官僚分子代替了。

老的地主阶级死了，新的“地主”阶级产生了，他们就是打着共产党旗号的兼有大土地所有者（大地主）身份的官僚资产阶级统治集团，而且这个集团中的许多官僚资产阶级分子本身就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

问题在于，我们很多左派同志通常习惯把这个以“国家”名义出现的大土地所有者，也当做超阶级的“国家”，而看不清这个以“国家”名义出现的大土地所有者的阶级面目。他们和广大农民的关系，实际上还没有脱离封建农业

生产关系中地主和农民的关系。对于复辟后再次被扶植起来的地主阶级发生的这种隐形转化，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同志忽略了这一点。

今年年初的中央一号文件，实际上是推进中国农业资本主义化进程的号令。所谓“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等等，不过是为了进行新的“圈地运动”，夺取农民租用的土地，使他们变成失掉土地为农业资本家打工的农业雇佣工人罢了。

三、如何确定革命第一阶段的性质？

这是由当前阶段的社会性质、革命主要对象的性质以及革命任务的性质所决定的。

前面，我们已经搞清楚：一，即使没有一个封建地主阶级，中国也还有推翻专制制度并在上层建筑领域铲除封建主义的政治、思想和文化的民主革命的任务；

二，资本主义复辟后被扶植起来的地主阶级已经隐形转化为新的大土地所有者（地主）——官僚资产阶级，他们可以随意支配土地，中国农业还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封建生产关系。因此，打倒这个大土地所有者也同样是民主革命的任务。

就是说，上述革命任务还都属于民主革命的性质

由于第一阶段的主要革命对象——官僚资产阶级，既有封建地主阶级的属性，也有官僚买办阶级的属性，自身又是垄断资产阶级，所以，打倒官僚资产阶级的革命不仅有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政治意义，也有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意义。换句话说，革命不仅是民主革命的性质，也带有一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那种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截然分为两体的观点是错误的，不符合事实的。试问，官僚资产阶级集团的主要成员中，哪一个不是和美帝国主义、国际资本财团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的联系？

有人就这场严肃的政治争论向他们认为的“民主革命论者”（即所谓的“二次革命论者”）发出了下面的通牒：

“民主革命论”者如不能正面回应以下问题，就免谈了

关于当前关于当前无产阶级面临的是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探讨和争论，……现在，这个探讨和争论已经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事实上已经争论的很清楚了。为了不至于老是拘泥于这个问题的争论而妨碍了其他方面的工作，请主张搞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论者正面回应以下问题，如果不能正面回应，就免谈了。（注意：这些问题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旗帜、纲领、路线等方面的重大原则问题，这里不涉及策略问题）

1、社会的性质

社会主义革命论者：资本主义的性质。

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论者：

2、社会的主要矛盾

社会主义革命论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

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论者：

3、革命的性质

社会主义革命论者：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

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论者：

4、革命的对象

社会主义革命论者：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论者：

5、革命的前途

社会主义革命论者：无产阶级专政。

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论者：

6、革命的动力阶级

社会主义革命论者：无产阶级和包括小资产阶级（劳动阶级，不是小资本家阶级）在内的其他劳动阶级。

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论者：

作为无产阶级不断革命和革命阶段统一论者，即马列毛主义无产阶级革命论者，只好奉命答卷。

1、当今社会的性质

社会主义革命论者：资本主义的性质：

马列毛主义无产阶级革命论者：当今中国社会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官僚资本主义或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前一种说法没有指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个别性），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大忌，无产阶级的理论越切合实际，越有针对性，越好。

2、社会的主要矛盾

社会主义革命论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

马列毛主义无产阶级革命论者：前一种说法本身没错。但是没有指出在官僚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矛盾的焦点。

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广大人民群众与一小撮官僚资产阶级的矛盾，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当前社会条件下的集中表现。

3、革命的性质

社会主义革命论者：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

马列毛主义无产阶级革命论者：总体上，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第二次社会主义大革命。其中，第一阶段的革命斗争主要是人民民主革命的性质，但一定程度上也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

4、革命的对象

社会主义革命论者：资产阶级。

马列毛主义无产阶级革命论者：中国无产阶级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革命第一阶段，也就是当前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当时占全国人口百分之零点四左右的官僚资产阶级，这是我们当前最主要的敌人。

5、革命的前途

社会主义革命论者：无产阶级专政。

马列毛主义无产阶级革命论者：重建共产党，重建无产阶级专政，重建社会主义制度。

6、革命的动力阶级

社会主义革命论者：无产阶级和包括小资产阶级（劳动阶级，不是小资本家阶级）在内的其他劳动阶级。

马列毛主义无产阶级革命论者：上面说法与“社会主义革命论者”前述：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自相矛盾的。小资产阶级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动力。但是，在第一阶段反对官僚资产阶级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它和其他劳动阶级一样是革命的动力。正确的说法是：为了推翻专制制度，重建人民民主，必须建立一个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最广泛的革命民主统一战线。一切主张打倒官僚资产阶级专制统治的阶级、阶层和政治派别都是我们团结、联合或利用的力量，哪怕这种联合或利用只是暂时的，有条件的。

总之，中国无产阶级进行的第二次社会主义大革命第一阶段的任务，是一个打倒官僚资产阶级，推翻专制制度的人民民主革命的任务。目的是废除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争取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力和政治自由，重建人民民主专政。关于反对专制问题，“九天揽月”同志已在他的《谈“打倒专制”》一文中作了详尽的论述。这里不再重复。

最后，让我们一起学习列宁的教导：“为什么推翻专制制度应该是俄国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呢？这是因为在专制制度下，工人阶级不能广泛地展开自己的斗争，无论在经济方面或政治方面都不能夺取任何巩固的阵地，不能建立巩固的群众性的组织，不能在全体劳动群众面前举起社会革命的旗帜，也不能教会他们为社会革命而斗争。只有争得了政治自由，整个工人阶级才能坚决地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这个斗争的最终目的就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组织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争得了政治自由，只有广泛地展开群众性的斗争，俄国工人阶级才能建立争取社会主义最终胜利所必需的组织。”

今天，重温列宁的教导，我们感到那样的真切，不是非常符合我国当前的斗争实际吗？

一切愿意在中国进行第二次社会主义大革命的同志，是统一我们认识的时候了！统一了革命理论，统一了思想认识，下一步干什么大家是心照不宣的。坚定地迈开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推翻专制制度，争取政治自由！

2013年8月1日

对人民民主革命论的善意批评

-----兼答风雨如同志

看了风雨如同志对“人民民主革命论”的论述，以及和我再商榷的文章，使我更清楚了“人民民主革命论”的基本观点。正像我对太行同志大作略作批评一样，我想对风雨如同志的意见，也简要作一点回答。

同志们之间讨论问题，有话直说。我想再一次明确重申，“人民民主革命论”是不正确的。

按照风雨如同志的解释，这一理论，实质是要在我们面对的社会主义革命历史任务之前，再加一个以反对专制为主题的“人民民主革命”。在这一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国家”，实现了“最低纲领”之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从风雨如同志表达的这个意义上看，说他们是“二次革命论”，大体是符合实际的。当然，这不是中共历史上出现过的“二次革命论”，是一种新的发明，新的“二次革命论”。但是，既然他们自己不喜欢这个提法，我们还是应该尊重他们的意愿，不用此提法。提法不是关键，关键的问题在，“人民民主革命论”对不对。

我认为“人民民主革命论”是不正确的，风雨如同志为这一理论所做的论述也是不正确的。我觉得有许多理论问题需要略作讨论。

一、对于社会革命的理解不正确。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严格意义上的可以称得起的社会革命，总是社会形态的革命，既是社会经济形态的革命，也是社会政治形态的革命。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表述他的研究方法时，讲得很清楚的，也是很权威的。社会革命，是阶级的革命，既是经济关系的革命，也是政治关系的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就政治关系、政治形态而言，主要是上层建筑的革命，是国体的革命，即哪个阶级占统治地位的革命，而不仅仅是政体形式的革命，就是政体形式的革命也有一个阶级属性的问题。在这里，上层建筑的变动和经济基础的变动是统一的，是不能分割的。

政体是服从于国体的。这就是说，不是不可以探讨政体的革命，而是在探讨政体革命时，不能离开国体革命，也就是政治关系的革命、阶级关系的革命，同时，也不能离开经济关系的革命。而“人民民主革命论”者，在论述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时，恰恰离开了这个最基本的道理。

风雨如同志说，“今天，中国人民之所以灾难沉重是因为她不仅受着资本的统治，而且受着专制的统治；是因为专制的统治远远大于、强于、惨烈于资本的统治；是因为专制的统治是中国无产阶级重建社会主义的一只拦路虎。所以，不首先解决专制统治的问题，就无法解决资本统治的问题。而解决专制统治问题的革命，只能是人民民主革命。所以，在打碎中国人民身上的专制统治的沉重枷锁之前，侈（奢）谈什么重建无产阶级专政、恢复社会主义公有制等，一切的一切，通通都只不过是纸上谈兵，闭门造车，水中捞月，画饼充饥。”

这段话的主要问题就是把政治和经济完全割裂开来了。

第一、专制统治是为残酷的资本主义剥削服务的，二者是一致的，把现在的“专制的统治”说成是“远远大于、强愈、惨烈于资本的统治”，是不正确

的，因为“专制的统治”和资本的统治是一致的，就是资本统治的必然形式。可以说，有多么残酷的资本剥削形式，就有多么残酷的资本压迫形式。二者是完全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政治上的专制的残酷压迫，正是为经济上的残酷剥削服务的。

第二、把解决专制的革命孤立起来，说“不首先解决专制统治的问题，就无法解决资本统治的问题。而解决专制统治问题的革命，只能是人民民主革命。”现在的专制统治是资产阶级的专制统治，是资本主义的专制统治，要解决专制统治的问题，只有革命，而这一革命，不仅是解决专制统治的问题，也是解决资产阶级统治的问题，资本主义统治的问题。当然，我们面对的历史条件决定了，这里的资产阶级首先是指官僚垄断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解决专制统治的革命离不开这一条。一旦，这样的革命胜利，难道仅仅是推翻专制统治的问题吗？难道不是推翻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的问题吗？这个政权，难道不要同时解决专制统治所维护的资本统治的问题吗？

我们这里暂时不讨论对待私营资本主义的策略。

我们这里要讨论的是，只要解决专制制度的问题，也就必然地要解决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专制统治的问题，也就必然地要解决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统治的问题。无法设想，人民起来了，解决了专制统治的问题，执掌了政权，建立了联合政府，人民民主革命任务完成，到此为止，不去解决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的问题，不去解决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统治的问题，这可能吗？讲得通吗？不要忘记，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的问题，绝不仅仅是政体改变的问题。任何上层建筑的革命都是为经济基础开道，为建立和巩固新的经济基础服务。风雨如同志这样设想人民民主革命，是不符合历史规律和历史实际的，很难讲得通。

我想，一旦无产阶级领导发动起人民革命，推翻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专制统治，以无产阶级为领导（通过共产党）的人民群众夺取了政权，建立人民民主国家，那么，这个政权，立即就要对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就要剥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

这是怎样性质的革命？这正是只能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一场反对新生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再革命，一场社会主义的人民革命运动。

可见，硬要把一场革命分成两场革命，是没有根据的。风雨如同志说：

“实现人民民主革命的目标是我们的最低纲领，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我们的最高纲领。”这个说法，不妥当，把实际上的一个目标，人为地分成了两个目标，是一种主观的想象。

与这一点有联系，风雨如同志有一个说法也欠妥当，虽说，这不怪他，这与一个传统的看法有关，只是，现在，认识需要更新。风雨如同志说：“人民民主革命的目标，既不是建立民主政体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建立毛泽东当年提出来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新民主主义论》）的“人民民主国家”（《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人民民主国家是应当的国家形式，也是过渡的国家形式。说其应当是因为：革命是由几个阶级共同完成的，革命政权也就应当由几个阶级共同组成。说其过渡是因为：在完成人民民主革命的任务，把官僚资产阶级的反抗镇压下去之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必然会突出出来，决战将不可避免地在这两大阶级之间展开，人民民主国家的使命也就结束了。”现在看来，这个说法是需要更新的。请问，既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社会主义国

家，而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人民民主国家”，那么，这个人民民主国家，到底应该怎样定性呢？说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这几个革命阶级在联合专政中的地位是一样的吗？我们的宪法回答了这个问题。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宪法的这一规定，明确告诉我们，我们建立的这个国家，虽然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但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就是说，实质是已经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段。

这个实质不仅可以从第一条、第二条的规定看得清清楚楚，还可以从宪法的下列规定看得清清楚楚。

“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在主要有下列各种：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即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资本家所有制。

第六条 国营经济是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力量和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国家保证优先发展国营经济。

矿藏、水流，由法律规定为国有的森林、荒地和其它资源，都属于全民所有。

第七条 合作社经济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或者是劳动群众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半社会主义经济。劳动群众部分集体所有制是组织个体农民、个体手工业者和其它个体劳动者走向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过渡形式。

国家保护合作社的财产，鼓励、指导和帮助合作社经济的发展，并且以发展生产合作为改造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的主要道路。

第八条 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它生产资料所有权。

国家指导和帮助个体农民增加生产，并且鼓励他们根据自愿的原则组织生产合作、供销合作和信用合作。

国家对富农经济采取限制和逐步消灭的政策。

第九条 国家依照法律保护手工业者和其它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

国家指导和帮助个体手工业者和其它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改善经营，并且鼓励他们根据自愿的原则组织生产合作和供销合作。

第十条 国家依照法律保护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其它资本所有权。

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国家通过国家行政机关的管理、国营经济的领导和工人群众的监督，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它们的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鼓励和指导它们转变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

国家禁止资本家的危害公共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破坏国家经济计划的一切非法行为。”

宪法的这些规定，清楚地告诉我们，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历史阶段的开始。

历史事实也是这样的。

1959年底，毛主席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作了理论上的总结，讲了这样一段话，可以看作是对中国革命历史结果的明确结论：“我们经过解放战争，赢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我们立即没收了占全国工业、运输业固定资产80%的官僚资本，转为全民

所有。同时，用了三年的时间，完成全国的土地改革。如果因此说全国解放以后，‘革命在最初阶段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只是后来才逐渐地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不对的。”（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113页。）同志们都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毛主席和刘少奇有分歧，毛主席不赞成并批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提法和策略。

结论只能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国家，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特定的较低的形式，自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特定的较低的形式。

不知风雨如诸同志是否能接受？

虽然由于革命的起点较低，一旦夺取政权，我们不会立即实行完全的彻底的较高历史阶段的社会主义政策，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性质。人民民主专政，是较低的社会主义国体形式，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形式并存，是较低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一种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并不影响我们的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已经通过革命掌握了政权，这就是一个伟大的飞跃，一个伟大的质变，接下来，我们要完成一个漫长的也是艰难的历史渐进过程，这是质量互变规律的展开，需要我们有一点辩证思维，我们会慢慢地做得越来越好。历史教训告诉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找到办法，争取做到党不变质，国不变色，使社会主义能够稳步前进，只有这样，走向共产主义就是有把握的。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

二、“人民民主革命”提法不妥。

在这个问题上，从风雨如、太行等同志的论述来看，在认识上也是有不妥之处的。我们也做一点讨论。

第一、民主革命是有特定的含意的。这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毛主席说，“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同时，毛主席也说，“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毛主席这里使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民主革命”实际是一个意思，这就告诉我们，通常说“民主革命”就是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上次，我在和太行作讨论的时候，说过：“在这里，人民民主革命的提法，是不正确的。同志们都知道一个常识，所谓‘民主革命’，总是、就是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导师从来就是这样使用这一概念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从来不说无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为什么？道理很简单。无产阶级的革命，决不是仅仅争取民主的革命，而是，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从科学意义上来说，无产阶级革命最终是要实现民主的消亡的，这一点，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有明确的说明，他借用恩格斯的话说，‘社会民主主义’这个党的名称‘对于政治上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整个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党来说，这个词还是不确切的’。列宁指出，‘民主愈完全，它成为多余的东西的时候就愈接近。’‘民主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不是一个东西’。正是基于这个道理，无产阶级革命从来不会用民主革命来表达。哪怕是一个时期的口号，可以明确提出，我们要争取民主，但是，不能用‘民主革命’来表达，就是‘人民民主革命’也不对。当着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都明确指出革命还没有超出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没有使用无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样的概念。”这个道理，我就不重复了。

风雨如同志的误解是明显的，因为他说：“即无论是解决封建主义专制制度，还是解决官僚资本主义专制制度，都是民主革命。”又说：“推翻封建地主阶级专制制度的革命是民主革命，推翻官僚资产阶级专制制度的革命也是民主革命。简言之，只要是针对专制制度的革命，就是民主革命。换言之，民主革命的对象是专制制度，而不仅仅是封建专制制度。”

这显然是把推翻专制制度的革命仅仅局限于政体的变动，这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历史实际上都是不正确的。道理在前面已经说过。

从这段话还可看出，风雨如同志离开了“民主革命”是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这一特定含意。而且，把社会革命孤立地只看作是解决专制制度的革命，请风雨如同志想一想，历史上有哪一次革命是这样的只反对专制制度的民主革命？就是你们常引用俄国的反对沙皇的专制制度，也不仅仅是反对专制制度，而是反对整个封建主义的社会制度、包括农奴制残余。至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更不用说了，完全是一场翻天覆地的政治大革命、社会大革命。

我看，风雨如同志对专制制度问题的认识，有一些片面性。他说：

“让我们来看一看封建主义专制制度本和官僚资本主义有什么异同。

不同点。二者所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不同。封建主义专制制度建立在封建主义所有制之上，官僚资本主义专制制度建立在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之上。这一点虽然是重要的，但是，它仅仅说明了专制制度的经济实质，而没有说明，也无法说明专制制度的政治实质和政治危害。

相同点。那么，什么是专制制度的政治实质呢？列宁说：在专制制度下，工人阶级不能广泛地展开自己的斗争，无论在经济方面或政治方面都不能夺取任何巩固的阵地，不能在全体劳动群众面前举起社会革命的旗帜，也不能教会他们为社会革命而斗争。（《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1899年底，

《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220页）---这，就是专制制度的政治危害。无论封建主义的专制制度，还是官僚资本主义的专制制度，都是如此。这一点不也已经被今天的实践所证明了吗？

如果你不能否定这一点，即无论是封建主义专制制度还是官僚资本主义专制制度，其政治实质和政治危害都是一样的，或者，如果你不能将封建主义专制制度和官僚资本主义专制制度的政治实质和政治危害加以明晰的、具体的、本质上的区分（纯粹形式方面的区别肯定是有，但那是无关紧要的。例如，都是杀人的武器，一个叫作大刀片，一个叫做机关枪，这难道不是纯粹形式上的区别吗？）；那么，你也就无法否定下面这一点，即无论是解决封建主义专制制度，还是解决官僚资本主义专制制度，都是民主革命。这是任和人都无法否定的。因为否定了这一点，也就否定了社会性质（社会二级本质）决定革命性质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这些论述是不准确的。

既然说封建主义专制制度和官僚资本主义专制制度的经济基础不同，一个是建立在封建主义所有制之上的，一个是建立在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之上的，对于这一点，怎么能说“仅仅说明了专制制度的经济实质，而没有说明，也无法说明专制制度的政治实质和政治危害”？

什么是政治实质？政治就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而阶级的实质，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是封建主义专制制度，还是资本主义专制制度，这本身正是政治

实质。它回答了是哪个阶级、哪种社会的专制制度。这怎么能说“没有说明，也无法说明专制制度的政治实质”呢？

至于说到政治危害，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不同专制制度的危害是不同的。考察历史，可以看到，不同社会形态下的专制制度，是并不一样的。封建主义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专制制度在形式上还是有很大不同。风雨如同志所引列宁讲的俄国沙皇的专制制度的危害，我看，和希特勒的法西斯专制制度的危害就有很大的不同。当然，专制就是专制，其危害，有共同点，但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社会形态下，其形式、其危害还是有区别的。

更重要的是，不同的专制制度的危害，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就是维护的经济关系、政治统治是不同的。这恐怕无须多作解释。例如，我们现在面对的专制制度的危害，就是很具体很残酷的，这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法西斯专制制度。这一专制制度的危害，十分具体地使中国特色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能够残酷地压迫剥削中国劳动人民。

正是基于这些并不正确的理论，风雨如同志认为“在苏东剧变中，那几个实行专制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复辟，事实上也是在类人民民主革命中倒台的，而不是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倒台的。对这样的事实，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呢？”在这个问题上，发生“视而不见”的恐怕是风雨如同志。苏东剧变，不是类人民民主革命，而是所谓“颜色革命”，实质是资产阶级革命，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战胜了修正主义的官僚特权社会制度，是资产阶级战胜了官僚特权阶级，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战胜了法西斯特权阶级专制制度。这不单是政体的革命，而是社会制度的革命。风雨如同志恰恰没有看到这一点。

风雨如同志强调要深入事物的一级一级的本质看问题。但是，风雨如同志自己恰恰没有很好地做到这一点。

风雨如同志的设问，“如果你不能将封建主义专制制度和官僚资本主义专制制度的政治实质和政治危害加以明晰的、具体的、本质上的区分”，在我们看来，恰恰相反，不同阶级的不同专制制度，是完全可以也必须“明晰的、具体的、本质的区分”，以便从实际出发，进行反对这种具体的专制的斗争。苏东正是一个例子。

三、谈一点思想方法

1、不要作简单的历史比拟。把我们现在的面临的革命，和列宁时代的俄国革命模拟，和毛主席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比拟，都是不恰当的。还是要从我们面对的现实实际出发。

2、对革命导师的教导，要真懂，要消化，要弄清楚革命导师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做出这样的教导的。不能简单地浮浅地从某些表面的相似去运用革命导师的教导。要克服教条主义。

3、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能够贯通的。我们在运用的时后，一定要把握住这个体系，而不是片言只语。这是能否正确认识社会问题的关键。我们对于当前革命性质的认识的分歧，主要还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水平不够好造成的。我们还是要在马列毛主义上下功夫。

最后，我要说，中国是毛泽东主义的故乡。中国人民受到过毛主席关于反对修正主义的思想理论的深刻教育，并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经历过反对修正主义上台的文化大革命的实践锻炼。反对修正主义背叛革命，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坚决捍卫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的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中国人民不会在修正主义猖獗一时、资本主义复辟得逞的困难面前屈服。毛主席的旗帜，始终

是中国人民手中的一面革命的旗帜、造反的旗帜，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坚信，反动的法西斯专制统治，并不表明他们的强大，而是表明他们的虚弱。他们越是拒绝民主，等于越是拒绝人民，等于越是帮助人民觉悟起来，不再迷信民主的追求、权益的维护，而是走向革命，走向自己解放自己，这就为发动中国社会主义再革命创造了条件。正是基于这个现实，我们已经看到，社会主义再革命越来越逼近地提上了日程，在中国重建社会主义的一天已经为期不远了。

让我们牢记革命者的信条：勇敢，勇敢，再勇敢！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一定要实现！

谢谢同志们，谢谢风雨如、太行等同志。

2019年3月3日

附：风雨如同志的意见

有人说，你们的主张是“二次革命论”，事先搞民主革命，让自由资产阶级上台，然后在搞社会主义革命。是这样吗？

答：确实有一些人像你所说的这样理解我们。但是，这是一种误解。当然，我们也注意到，有的人是故意把我们的主张同历史上的“二次革命论”混为一谈，这就不是误解，而是歪曲事实，混淆视听了。好吧。下面我就把我们的主张概括起来说给你听：

第一，今天，中国人民之所以灾难沉重是因为她不仅受着资本的统治，而且受着专制的统治；是因为专制的统治远远大于、强于、惨烈于资本的统治；是因为专制的统治是中国无产阶级重建社会主义的一只拦路虎。所以，不首先解决专制统治的问题，就无法解决资本统治的问题。而解决专制统治问题的革命，只能是人民民主革命。所以，在打碎中国人民身上的专制统治的沉重枷锁之前，侈（奢）谈什么重建无产阶级专政、恢复社会主义公有制等等等等，一切的一切，通通都不过是纸上谈兵，闭门造车，水中捞月，画饼充饥。

第二，人民民主革命的目标，既不是建立民主政体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建立毛泽东当年提出来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新民主主义论》）的“人民民主国家”（《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人民民主国家是应当的国家形式，也是过渡的国家形式。说其应当是因为：革命是由几个阶级共同完成的，革命政权也就应当由几个阶级共同组成。说其过渡是因为：在完成人民民主革命的任务，把官僚资产阶级的反抗镇压下去之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必然会突出出来，决战将不可避免地在这两大阶级之间展开，人民民主国家的使命也就结束了。

第三，实现人民民主革命的目标是我们的最低纲领，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我们的最高纲领。没有最低纲领，就没有最高纲领。所以，我们坚决反对泛左翼内部实际存在的空想的、过高估计无产阶级力量的、认为在官僚资产阶级专制制度下可以直接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左”倾机会主义的一次革命论。同时，我们也坚决反对泛左翼内部实际存在的悲观的、过低估计无产阶级力量的、认为在官僚资产阶级专制制度下只能先让自由资产阶级上台，搞资产阶级宪政民主，然后无产阶级再搞社会主义革命的“二次革命论”。

太行玉笛跟贴说：风雨如同志已经系统地回答了前面几位同志的提问。我是完全同意的。不了解革命阶段论的同志特别是心存误解的同志请认真一读。

风雨如同志又说：

有人说，只要不存在封建制度，就不存在民主革命，你认为正确吗？

答：我认为完全不正确。封建地主阶级建立的专制制度，官僚资产阶级建立的制度也是专制制度。推翻封建地主阶级专制制度的革命是民主革命，推翻官僚资产阶级专制制度的革命也是民主革命。简言之，只要是针对专制制度的革命，就是民主革命。换言之，民主革命的对象是专制制度，而不仅仅是封建专制制度。所以，那种不存在封建制度就不存在民主革命的说法，是一种典型的教条主义的说法。

在苏东剧变中，那几个实行专制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复辟，事实上也是在类人民民主革命中倒台的，而不是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倒台的。对这样的事实，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呢？

太行同志支持此论说：这是严峻的事实。

风雨如同志又写了：《再与项观奇同志商榷》

项观奇同志在《就太行玉笛同志的大作略作讨论》一文中写道----
在这个复辟了资本主义的中国，现在的专政，到底是不是资产阶级专政。有法西斯，有封建特色，是专制制度。但是，这些特点到底隶属于资产阶级专政，还是隶属于封建地主阶级专政。不管有多少封建性，到底是资本主义属性占主导，还是封建主义属性占主导，是不能模棱两可的。

-----是的，对这个问题，确实不能模棱两可。让我们来看一看封建主义专制制度本和官僚资本主义有什么异同。

不同点。二者所赖以生存的精既基础不同。封建主义专制制度建立在封建主义所有制之上，官僚资本主义专制制度建立在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之上。这一点虽然是重要的，但是，它仅仅说明了专制制度的经济实质，而没有说明，也无法说明专制制度的政治实质和政治危害。

相同点。那么，什么是专制制度的政治实质呢？列宁说：在专制制度下，工人阶级不能广泛地展开自己的斗争，无论在经济方面或政治方面都不能夺取任何巩固的阵地，不能在全体劳动群众面前举起社会革命的旗帜，也不能教会他们为社会革命而斗争。（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1899年底，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220页）---这，就是专制制度的政治危害。无论封建主义的专制制度，还是官僚资本主义的专制制度，都是如此。这一点不也已经被今天的实践所证明了吗？

如果你不能否定这一点，即无论是封建主义专制制度还是官僚资本主义专制制度，其政治实质和政治危害都是一样的，或者，如果你不能将封建主义专制制度和官僚资本主义专制制度的政治实质和政治危害加以明晰的、具体的、本质上的区分（纯粹形式方面的区别肯定是有，但那是无关紧要的。例如，都是杀人的武器，一个叫作大刀片，一个叫做机关枪，这难道不是纯粹形式上的区别吗？）；那么，你也就无法否定下面这一点，即无论是解决封建主义专制制度，还是解决官僚资本主义专制制度，都是民主革命。这是任和人都无法否定的。因为否定了这一点，也就否定了社会性质（社会二级本质）决定革命性质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回复项观奇同志

内容提要：

- 一、关于革命要分两步走的问题
- 二、关于国体和政体的关系问题
- 三、关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问题
- 四、关于革命的性质问题
- 五、关于革命的目标问题
- 六、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问题
- 七、关于苏东剧变问题
- 八、关于历史比较问题

读了项观奇同志的文章《对人民民主革命论的善意批评——兼答风雨如同志》，觉得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一、关于革命要分两步走的问题

项观奇同志说：“按照风雨如同志的解释，这一理论，实质是要在我们面对的社会主义革命历史任务之前，再加一个以反对专制为主题的‘人民民主革命’。在这一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国家’，实现了‘最低纲领’之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不是“要在我们面对的社会主义革命历史任务之前……”。我们今天直接面对的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历史任务”，而是“人民民主革命历史任务”。这是两种具有部分质的区别的历史任务，后者为前者扫清道路、奠定基础。所以，正确的表述应当是：中国人民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应当分两步走。第一步，开展人民民主革命，解决官僚资产阶级问题；第二步，开展社会主义革命，解决一切资产阶级问题。前者是最低纲领，后者是最高纲领，没有最低纲领，就没有最高纲领。

太行玉笛同志认为：中国第二次社会主义大革命需要分两步走……我认为这种提法是不准确的。因为，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包含一个民主革命阶段，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建议将“中国第二次社会主义大革命需要分两步走”修改为“中国人民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需要分两步走”。

二、关于国体和政体的关系问题

项观奇同志说：“政体是服从于国体的。这就是说，不是不可以探讨政体的革命，而是在探讨政体革命时，不能离开国体革命，也就是政治关系的革命，同时，也不能离开经济关系的革命。而‘人民民主革命论’者，在论述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时，恰恰离开了这个最基本的道理。”“这显然是把推翻专制制度的革命仅仅局限于政体的变动，这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历史实际上都是不正确的。”

——毛泽东说：“全世界多种多样的国家体制中，按其政权的阶级性质来划分，基本地不外乎这三种：（甲）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乙）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丙）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新民主主义论》）”这里的甲乙丙，就是三种“国体”。人民民主革命的目标就是建立“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这不就是由“甲”国体转化为“丙”国体了吗？这怎么是“政体的革命”呢？什么是“政体的革命”？那是在“资产阶级专

政”的国体框架内，将资产阶级专制政体国家改造为资产阶级民主政体国家（民主共和国）。这不是我们的主张。

《现代汉语词典》对“制度”的解释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系：社会主义制度。封建宗法制度。”在这里，“制度”就是“国体”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不知为什么，项观奇同志将“专制制度”理解的如此狭隘？更不知为什么，项观奇同志总是将解决“专制制度”的革命理解为“政体”的变更？这不仅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术语不通，也于现代汉语的词语含义不通。

项观奇同志说：“请风雨如同志想一想，历史上有哪一次革命是这样的只反对专制制度的民主革命？就是你们常引用俄国的反对沙皇的专制制度，也不仅仅是反对专制制度，而是反对整个封建主义的社会制度、包括农奴制残余。至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更不用说了，完全是一场翻天覆地的政治大革命、社会大革命。”

——我在我的文章中所说的“专制制度”，既包含了官僚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制度，也包含了官僚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和政治制度，是指整个社会制度。不错，这场革命要解决的问题确实很多，这场革命也确实翻天覆地，但是，解决“专制制度”问题是“纲”，其余都是“目”。

三、关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问题

项观奇同志引用了我的一段话：“今天，中国人民之所以灾难深重，是因为她不仅受着资本的统治，而且受着专制的统治；是因为专制的统治远远大于、强于、惨烈于资本的统治；是因为专制的统治是中国无产阶级重建社会主义的一只拦路虎。所以，不首先解决专制统治的问题，就无法解决资本统治的问题。而解决专制统治问题的革命，只能是人民民主革命。所以，在打碎中国人民身上的专制统治的沉重枷锁之前，侈谈什么重建无产阶级专政、恢复社会主义公有制等等等等，一切的一切，通通都不过是纸上谈兵，闭门造车，水中捞月，画饼充饥。”

——为了行文简洁，我这里将新型的官僚资产阶级的专制统治简称为“专制的统治”，将官僚资产阶级之外的民间资产阶级或资本家阶级或一般资产阶级的统治简称为“资本的统治”。

“新型的官僚资产阶级的专制统治”和“民间资产阶级的统治”两个概念，都照顾到了经济内容和政治内容，是经济内容和政治内容的统一体。我想，这是所有的读者都会这样理解，也不能不这样理解的一个问题。所以，项观奇同志所说的“这段话的主要问题就是把政治和经济完全割裂开来了。”以及下面的几点分析，是完全误解了我的意思。

项观奇同志说：“专制统治是为残酷的资本主义剥削服务的，二者是一致的，把现在的‘专制的统治’说成是‘远远大于、强愈、惨烈于资本的统治’，是不正确的，因为‘专制的统治’和资本的统治是一致的，就是资本统治的必然形式。可以说，有多么残酷的资本剥削形式，就有多么残酷的资本压迫形式。二者是完全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政治上的专制的残酷压迫，正是为经济上的残酷剥削服务的。”

——恕我直言，这段话失之肤浅了。让我们来看一看列宁是怎样分析这个问题的吧，列宁说：

“所有这些社会主义者忘记了，专制制度的利益仅仅在某些情况下并且仅仅同有产阶级的某些利益相一致，而且往往不是同所有这些阶级的利益相一致，而是同它们的个别阶层的利益相一致。资产阶级其他阶层的利益，整个资产阶级的更广泛的利益，以及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利益，必然要产生反对专制制度的自由主义反政府派。例如，如果说专制制度保证资产阶级有可能采用最粗暴的剥削方式，那么另一方面，专制制度却给生产力的广泛发展和教育的普及设置无数障碍，因此不仅引起小资产阶级起来反对它，有时还引起大资产阶级起来反对它。如果说专制制度保证（？）保护资产阶级防备社会主义，那么另一方面，这种保护在居民无权的情况

下必然要变成警察专横，从而激怒所有的人。……”（《政治鼓动和“阶级观点”》，1902年2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248—249页）

——列宁不愧为伟大的革命导师，看问题就是深刻。这里，我想运用一次在我看来是科学的历史比较：列宁的这番话，好像是今天早上才写好的，好像写的就是我们。

“资本的统治”，侧重强调资本家阶级的经济剥削；“专制的统治”侧重强调官僚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的政治压迫。比较而言，它们二者对于人民的损害，哪个更大、更强、更惨烈呢？40年了，这件事情难道不是朗若白昼吗？

以 JIASHI 事件为例。JIASHI 工人固然受着资本家的剥削，受着资本的统治。但是，是谁把他们迫害到今天这个悲惨的地步？难道不是政府的机器、专制统治的工具吗？资本家再狠毒，有权力这样做吗？这种情况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里就鲜有发生，因为他们那里不存在法西斯式的“专制的统治”，最近在法国发生的“黄马甲”运动就是证明。而我们中国的“专制的统治远远大于、强于、惨烈于资本的统治”的事情，难道不是每天都在我们的眼前发生吗？这难道还有什么争议吗？

所以，我说“专制的统治是中国无产阶级重建社会主义的一只拦路虎。”并且要首先解决这个拦路虎的问题，然后再去解决资本统治的问题，难道不对吗？或者，在今天，官僚资产阶级问题和一般资本家阶级问题，难道可以一次性同时解决吗？

所以，项观奇同志所说的“这一革命，不仅是解决专制统治的问题，也是解决资产阶级统治的问题，资本主义统治的问题。”是脱离了中国阶级斗争和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客观实际的，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愿望。

项观奇同志说：“无法设想，人民起来了，解决了专制统治的问题，执掌了政权，建立了联合政府，人民民主革命任务完成，到此为止，不去解决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的问题，不去解决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统治的问题，这可能吗？”

——是的，这不可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和“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统治”同“专制统治”是同一件事情。解决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和“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统治”问题，也就同时解决了“专制统治”的问题。怎么可以把事实上的同一件事情看作不同的两件事情呢？或者，“专制统治”只是一个抽象的东西，人民民主革命是在同一个抽象的东西作斗争？这可能吗？

此外，这里存在一个逻辑不自洽的问题。既然说“执掌了政权”，那就意味着已经解决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和经济统治问题。如果没有解决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和经济统治问题，谈何“执掌了政权”呢？难道说不解决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和经济统治问题，也可以执掌政权吗？

四、关于革命的性质问题

项观奇同志说：“我想，一旦无产阶级领导发动起人民革命，推翻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专制统治，以无产阶级为领导（通过共产党）的人民群众夺取了政权，建立人民民主国家，那么，这个政权，立即就要对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就要剥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这是怎样性质的革命？这正是只能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一场反对新生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再革命，一场社会主义的人民革命运动。”

——不，这样的革命，恰恰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说：“决定革命性质的力量，是主要的敌人和主要的革命者两方面。”（《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1948年3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1967年版，第1231页）——在今天，主要的敌人是官僚资产阶级，

而不是一切资产阶级。解决官僚资产阶级的革命是人民民主革命，解决一切资产阶级的革命才是社会主义革命。这难道还有疑问吗？或者，解决官僚资产阶级的革命和解决一切资产阶级的革命是没有区别的事情吗？

项观奇同志说：“民主革命是有特定的含意的。这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志们都知道一个常识，所谓‘民主革命’，总是、就是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导师从来就是这样使用这一概念的。”

——列宁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旧的答案，那就是只忠于学说的字句，而不是忠于学说的精神，就是只背诵过去的结论，而不善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来分析新的政治局势。”

（《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1903年7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22页）斯大林说：“马克思主义不承认绝对适应于一切时代和时期的不变的结论和公式。马克思主义是一切教条主义的敌人。”（《答同志们》，1950年，《斯大林选集》下卷，1979年版，第538页）——是的，我们今天究竟是应当“只背诵过去的结论”呢，还是应当“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来分析新的政治局势”呢？

五、关于革命的目标问题

项观奇同志说：“说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这几个革命阶级在联合专政中的地位是一样的吗？”

——无产阶级的地位如何，取决于无产阶级能否争得革命的领导权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争得领导权。在即将到来的暴风雨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从理论上讲，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无产阶级争取到绝对的领导权。这当然是最理想的。这意味着，无产阶级可以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是，这却是不现实的。它只具备理论的可能性，而不具备现实的可能性。今天中国的无产阶级还没有具备做到这一点的足够的阶级力量，还处于一盘散沙状态。在今天中国存在的三大政治势力（无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中，无产阶级是最弱的。而且，她也不太可能在暴风雨到来时迅速而优质地组织起来。不看别的，你只看“左派”的“窝里斗”，就可以预见暴风雨来临时的情景了。

第二种可能：无产阶级没有争取到领导权，当了尾巴。自由资产阶级占绝对优势，在中国搞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是可能的。当然，自由资产阶级各派政治力量之间也存在“窝里斗”现象，但是，它们具有其它方面无产阶级所不具有的优势，例如：经费、舆论阵地、西方国家的支持等等。如果这样，就是无产阶级的失败，尤其是左派、毛派的失败。这意味着，左派经过几十年的耕耘，在应当收获的季节里一无所获。但是，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出现的概率是极小的。因为，虽然无产阶级的力量很不强大，但是在无产阶级队伍里，在左派队伍里，不乏有识之士和卓越人才，他们将在同自由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发挥关键作用。

第三种可能：无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各争得大概一半的领导权，二者大体上势均力敌。或者无产阶级略强一点，或者自由资产阶级略强一点。甚至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政权并存的局面。其中很可能还有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参与其中。这不是最理想的，却是最可能的。实现这点，就是左派的胜利。实现这点，革命的结果就是建立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人民民主国家。

东欧几个国家在二战结束前后、社会主义革命开始前所建立的人民民主革命政权，就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参加。例如：阿尔巴尼亚的“民主阵线”、罗马尼亚的“民族民主阵线”、保加利亚的“祖国阵线”、南斯拉夫的“人民阵线”、捷克斯洛伐克的“民族阵线”等。当时，这几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在联合政府里分别占多数、微弱多数和少数。后来，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不占优势的无产阶级政党才逐步在联合政府里占据了主导地位或领导地位。这几个国家最迟于1948年结束了几个政党联合执政的状况，建立了无

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无产阶级政党一方面将愿意革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加以改造，使它们融入无产阶级的队伍；另一方面将不愿意革命甚至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以和平的或暴力的方式驱逐出革命政权。

严格地说，1949年10月1日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也是“人民民主国家”。（毛泽东说：“在我们这样的人民民主国家里，不应当写那样不适当的条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954年6月14日）但是，同东欧国家不同的是：那时中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处在无产阶级政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它们没有同无产阶级政党抗争的力量。

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以今天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来看，人民民主革命成功后，其革命政权的演变轨迹，很有可能同当年的东欧国家具有某些相似之处。

六、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问题

项观奇同志说：“结论只能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国家，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特定的较低的形式，自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特定的较低的形式。”

——列宁说：“当不仅革命成为事实，而且革命的完全胜利也成为事实的时候，我们就会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专政的口号，即完全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来‘调换’（也许是在将来的新的马尔丁诺夫们的恐怖的号叫声中）民主专政的口号。”（《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这里所说的“革命成为事实”的“事实”，是指民主革命；这里所说的“革命的完全胜利也成为事实”的事实，是指社会主义革命。那么，“调换”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这两个概念没有区别，谈何“调换”呢？当然，这是历史。然而，历史上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人民民主革命如果成功，必然还会发生一个由人民民主专政到无产阶级专政的“调换”过程。这是毫无疑义的。

列宁说：“马尔丁诺夫不懂得这一点，他把推翻专制制度时的临时革命政府同推翻资产阶级时的必不可少的无产阶级统治混为一谈，他把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同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混为一谈。”（《社会民主党和临时革命政府》，1905年，《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4页）

列宁说：“在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区分民主主义专政和社会主义专政，或者更确切些说，根本就没有谈到民主主义专政，因为那时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已经衰老，而社会主义已经临近。因此他们当时也没有把最低纲领跟最高纲领区分开来。如果要作这种区分（我们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现在正在这样做，我们正在同‘社会革命党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义进行斗争，因为他们不懂得这种区分），那么就必须专门剖析社会主义专政和民主主义专政的问题。”（《论临时革命政府》，1905年，《列宁全集》第10卷，???)

列宁说：“公社所必须完成的实际任务，首先是实民主专政而不是社会主义专政，也就是实施我们的‘最低纲领’”。（《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巴黎公社和民主专政的任务〉一文写的结尾》，1905年7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125页）

毛泽东说：“现在是工人阶级领导着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和民族资产阶级对旧时代的地主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专政。这样的专政，可以执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也可以执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到了它执行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时候，它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就鲜明地显露出来了。”（《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1956年8月、9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1992年版，第145—146页）

——以上所引革命导师的论述告诉我们：说“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没有错，但是，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二者没有区别。在今天，这个问题的现实意义在于：二者的区别，不是所谓较低形式和较高形式的区别，而是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区别。

七、关于苏东剧变问题

项观奇同志说：“苏东剧变，不是类人民民主革命，而是所谓颜色革命，实质是资产阶级革命，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战胜了修正主义的官僚特权社会制度，是资产阶级战胜了官僚特权阶级，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战胜了法西斯特权阶级专制制度。这不单是政体的革命，而是社会制度的革命。风雨如同志恰恰没有看到这一点。”

——我之所以说苏东剧变是一场“类人民民主革命”，是因为：首先，苏东剧变肯定不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其次，苏东剧变是一件同人民民主革命类似的事情，类似点有：第一，它是人民起来将专制制度解决了；第二，它是不彻底的革命或半革命，但是毕竟同革命沾边；第三，它是以建立民主制度为目标的“革命”。这些，事实上就是“颜色革命”的主要特征。

项观奇同志说：“苏东剧变……这不单是政体的革命，而是社会制度的革命。”——这样说恐怕有点过头。列宁说：“资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只可能是不彻底的革命（严格地说这不是革命，而是改良）。只有在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领导下，它才可能是真正的革命。”

（《俄国革命的长处和弱点》，1907年4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15卷，第195页）苏东剧变正是“政体的革命”，是变资产阶级专制政体为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革命”。

此外，我想指出：如果我没有在“人民民主革命”前面冠以“类”字，如果我说“苏东剧变就是人民民主革命”，那么，项观奇同志的上述意见我基本都能接受，因为苏东剧变确实不是“人民民主革命”。然而，“人民民主革命”和“类人民民主革命”是相同的概念吗？这里存在着偷换概念的问题。我认为，这样讨论问题，起码是不严谨的。

八、关于历史比较问题

项观奇同志说：“不要作简单的历史模拟。把我们现在面临的革命，和列宁时代的俄国革命模拟，和毛主席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模拟，都是不恰当的。还是要从我们面对的现实实际出发。”

——在这个问题上，我习惯使用“历史比较”这个词。说不要作简单的历史比较，也就是列宁所说的“庸俗的类比”当然是对的。但是，绝不能反对科学的历史比较。项观奇同志在许多演讲中，在许多文章中，包括这篇文章，都使用了历史比较。说“要从我们面对的现实实际出发。”当然是对的，但是，人们在“现实”中往往还要以史为鉴。

列宁说：“如果要作历史类比，那就应当分清并且确切指出不同事件的相同点，否则就不是作历史对比，而是信口开河。”（《我们的取消派》，1911年，《列宁全集》第2版，第20卷，第127页）列宁对历史比较提出了科学的要求——“分清并且确切指出不同事件的相同点”。这样做了，就是科学的历史比较，否则，就是庸俗的历史比较或“信口开河”。

列宁在回顾马克思总结的1848年德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归纳出有关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若干原理之后说：“只要根据具体的民族特点作相应的改变，只要把封建制度改成农奴制度，所有这些原理就完全适用于1905年的俄国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这是一个典型的科学历史比较的例子。在革命导师的著作中，类似的例子太多了，不胜枚举。

所以，我认为，一方面，我们要讲清楚简单历史比较的错误，另一方面，也要讲清楚科学历史比较的正确。二者不可偏废。

文章写得很长了，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写，就是关于专制制度的实质和危害问题。这个问题我另外单独写一篇文章吧。

最后，感谢项观奇同志，督促我温习了革命导师的著作。文章如有错误，请指正。致以革命的敬礼！

风雨如

2019年3月10日

再回复项观奇同志

内容提要：

- 01、关于革命性质问题
- 02、关于革命阶段问题
- 03、关于国体和政体的关系问题
- 04、关于专制统治和资本统治的关系问题
- 05、关于革命和政权问题
- 06、关于官僚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
- 07、关于“创造发明”问题
- 08、关于领导权问题
- 09、关于人民民主革命问题

读了项观奇同志《对〈回复项观奇同志〉的回复》，觉得：其中有的意见我可以接受并改正我的错误，其中有的意见我仍然不能接受并坚持我的观点。故写了这篇再回复。

01、关于革命性质问题

项观奇同志说：“在风雨如同志看来，‘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复辟’的革命，‘解决官僚资产阶级问题的革命’，是人民民主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我不同意，在我看来，只要是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不管是哪种具体的资本主义形态，总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有步骤，但是，不管有多少步骤、多少阶段，都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范围内。”

——革命的性质是由社会的性质决定的。如果今天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一般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那革命的性质当然就是社会主义革命。问题是今天中国社会的性质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而是专制的资本主义。在专制的资本主义下所发生的革命，可能是资产阶级的不彻底的民主革命（例如“苏东剧变”），也可能是人民民主革命，唯独不可能是直接的社会主义革命。

——中国固然是个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它又是官僚资本主义社会，是实行法西斯专政的社会。正是官僚资本主义法西斯专政这个社会性质，决定了革命的性质是人民民主革命。“只要是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不管是哪种具体的资本主义形态，总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这种说法没有区分事物的“初级本质”和“二级本质”，更没有认识到“二级本质”

的重要意义。例如，我们面前站着两个坏人，一个是小偷，一个是杀人犯。对于法官来说，可以不管他们俩是哪种具体形态的坏人，而给他们俩同样的量刑吗？

项观奇同志说：“同志们可以看出，有点转换概念了吧。好。就算这样，我很高兴，因为你说的正是社会主义革命！一场对官僚资产阶级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大革命，除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担当外，难道还有别的选择吗？如果把这样的革命称为人民民主革命，那就完全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就不是马列毛主义的观点了。”

——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认为：一场对官僚资产阶级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大革命，除了人民民主革命可以担当外，难道还有别的选择吗？如果把这样的革命称为社会主义革命，那就完全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就不是马列毛主义的观点了。

项观奇同志说：“如果照前面的意思说，‘无产阶级没有争取到领导权，当了尾巴。自由资产阶级占绝对优势，在中国搞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那这只能说是一场颜色革命，或者，别的说法，反正，这是资产阶级的胜利，不是人民革命的胜利，是不是你们的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那要你们自己回答。如果是，那就是说，你们的人民民主革命实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历史上旧的民主革命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是，在今天，情况不同了。今天的人民民主革命具有两重性。毛泽东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长时期内是反帝反封建。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又提出了反对官僚资本主义。（这几句我补引的，因为这是历史背景，是形成毛主席这个看法的历史条件。）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包含着两重性：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另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1960年2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3页）这个论断用在今天也是基本正确的。

——反对“官僚”资产阶级，意味着反对法西斯制度，意味着暂时不触动一般资产阶级的所有制，所以，这个革命带有资产阶级的性质。另一方面，反对官僚“资产阶级”，又是反对资产阶级的主要部分——大资产阶级，绝对地触动它们的所有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所以，这个革命又带有社会主义的性质。

02、关于革命阶段问题

项观奇同志说：“风雨如同志这里明确说，提法应该是‘中国人民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需要分两步走’。但是，从上面的表述看，这个说法有自相矛盾之处。一是，既然把整个革命斗争称为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那完成了第一步，即解决官僚资产阶级的问题，不就完成了这一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了吗？还要什么第二步？二是，如果只是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又说第二步要‘解决一切资产阶级问题’，这样性质的第二步怎么能纳入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呢？官僚资本主义之所以划出来，不就是因为它不同于、不包涵‘一切资产阶级’吗？”

——这个意见我完全接受，我的表述确实存在“自相矛盾”之处，感谢项观奇同志的指正。为了使我的表述克服“自相矛盾”，我决定将这个意思修改如下：

中国人民重新获得解放的斗争应当分两步走。第一步，开展人民民主革命，解决官僚资产阶级的专制统治问题；第二步，开展社会主义革命，解决一般资产阶级（非官僚资产阶级

或民间资产阶级)的资本统治问题。前者是最低纲领,后者是最高纲领,没有最低纲领,就没有最高纲领。

项观奇同志在文章中引用了原来的话:“现在的专制统治是资产阶级的专制统治,是资本主义的专制统治,要解决专制统治的问题,只有革命,而这一革命,不仅是解决专制统治的问题,也是解决资产阶级统治的问题,资本主义统治的问题。当然,我们面对的历史条件决定了,这里的资产阶级首先是指官僚垄断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解决专制统治的革命离不开这一条。一旦,这样的革命胜利,难道仅仅是推翻专制统治的问题吗?难道不是推翻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的问题吗?这个政权,难道不要同时解决专制统治所维护的资本统治的问题吗?”

——是的,人民民主革命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专制制度问题。只有在人民民主革命成功之后,才有可能解决“资本统治”即一般资产阶级统治的问题。这是两个问题,也是必须分开的两个历史阶段。

——此外,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探索。在今天,一般资产阶级或民间资产阶级或非官僚资产阶级,是属于统治阶级的范畴,还是属于人民的范畴?我认为,它们属于人民的范畴。所以,在今天,不能把它们当作敌人和革命的对象。

——官僚资产阶级是我们的主要敌人,一切非官僚资产阶级成员而拥护官僚资产阶级的人或曰官僚资产阶级的走狗是我们的次要敌人,一般资产阶级是我们今天的朋友,明天的敌人。

项观奇同志说:“这个解释是软弱的。不是我误解了风雨如同志用语的含意,而是风雨如同志做了新的解释。其实这个解释依然还是不通的。因为这和‘不首先解决专制统治的问题,就无法解决资本统治的问题’说法相矛盾,如果这句话里,专制制度包涵了资本统治,那首先解决的问题,也就包涵了解决资本统治,至少是官僚资本的统治,那这里的‘无法解决资本统治’也就是多余的了。”

——我依然坚持我的“不首先解决专制统治的问题,就无法解决资本统治的问题。”的观点。在今天,我们必须将“专制统治”和“资本统治”加以区分。因为解决这两个问题的革命是性质不完全相同的革命,解决这两个敌人的斗争是性质不完全相同的斗争。只有完成了第一场斗争,才能开始第二场斗争。恩格斯说得好:“虽然它们彼此之间应当进行激烈的斗争,但是只有在它们彼此是单独地对立的时候,这一斗争才能进行到底。”(《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1865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2003年版,第112页)

03、关于国体和政体的关系问题

项观奇同志说:“风雨如同志,不能转换概念。我们不是讨论的一般社会制度。我们讨论的针对的很具体,就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制制度,就是这种政治统治的形式,也就是政体。我们是同志之间讨论问题,故意转换概念的辩论方式不合适。”

——我没有转换概念。我讨论的“制度”从来都不是抽象的,它就是指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法西斯制度。这个制度当然是政体。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何解决这个政体问题?

——从理论上说，改变这种政体，有三种办法。第一，用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取代它。第二，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取代它。第三，用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民主共和国（人民民主国家）取代它。以今天中国社会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无非是这种关系的具体体现）来看，第一种办法是不现实也不可能的；第二种办法有一定的现实性和可能性，但是概率极小；只有第三种办法具有最大的现实性和可能性。

——毫无疑问，政体是国体的形式。国体决定政体。但是，毛泽东说：“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矛盾论》）艾思奇说：“虽然内容决定形式，但形式并不是消极的、被动的因素，它对于内容有重大的能动作用。……不仅如此，当着不变更形式，内容就不能发展的时候，形式的变更甚至起着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对于官僚资产阶级法西斯制度这个“政体”兼“形式”的变革，又一次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不实行这种变革，中国其它一切问题包括资本统治的问题都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04、关于专制统治和资本统治的关系问题

项观奇同志说：“我是肤浅。但是，我读列宁的这类话，还是肤浅地想，这还不是说专制统治为经济剥削服务吗？有什么深奥的？列宁的话，我读不出风雨如同志说的，‘专制的统治’，‘远远大于、强愈、惨烈于资本的统治’。专制不残酷还是专制吗？看到这一点，更该认识到，这种残酷的政治统治和残酷的经济剥削是一致的。”

——列宁说的非常明确：“资产阶级其他阶层的利益，整个资产阶级的更广泛的利益，以及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利益，必然要产生反对专制制度的自由主义反政府派。”如果说“专制的统治和资本的统治是一致的”，怎么会“产生反对专制制度的自由主义反政府派”呢？这怎么解释呢？

——列宁说的非常明确：“如果说专制制度保证资产阶级有可能采用最粗暴的剥削方式，那么另一方面，专制制度却给生产力的广泛发展和教育的普及设置无数障碍，因此不仅引起小资产阶级起来反对它，有时还引起大资产阶级起来反对它。”如果仅仅存在残酷的政治统治和残酷的经济剥削一致的一面，怎么会出现“不仅引起小资产阶级起来反对它，有时还引起大资产阶级起来反对它。”的情况呢？这怎么解释呢？

——列宁说的非常明确：“所有这些社会主义者忘记了，专制制度的利益仅仅在某些情况下并且仅仅同有产阶级的某些利益相一致，而且往往不是同所有这些阶级的利益相一致，而是同它们的个别阶层的利益相一致。”“某些利益相一致”和“一致”难道是完全一致的吗？为什么忽略二者的不相一致，而仅仅强调二者的一致呢？这是什么原因呢？

——代表官僚资产阶级的邓小平和代表自由资产阶级的赵紫阳，他们之间固然也有一致的方面，然而他们之间更有不一致的方面，而正是这不一一致的方面使他们之间的矛盾升级、激化，走向对抗。这是不争的事实。在今天，“专制的统治”坚持专制制度，“资本的统治”要求宪政民主。二者针锋相对，这怎么能说是“专制的统治和资本的统治是一致的”呢？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专制统治和资本统治既有一致的一面，又有矛盾的一面。并且，一致是相对的，矛盾是绝对的。所以，我们不能只看到二者一致的一面，而忽视二

者矛盾的一面。二者矛盾的一面之所以不可忽视，是因为，革命，有可能在它们之间的厮杀声中打开缺口或拉开序幕。

项观奇同志说：“当然有争议。难道不正是在这种法西斯专制制度下，中国的资本主义剥削特别残酷吗？不是连奴隶制、农奴制的超经济剥削都复活起来了吗？”

——是这样的。但是，我并没有说，资本主义剥削不残酷。“专制的统治远远大于、强于、惨烈于资本的统治”。这句话里并没有“资本的统治”不惨烈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专制的统治”比“资本的统治”更惨烈。同样，我也没有否认“连奴隶制、农奴制的超经济剥削都复活起来了”的事实。但是，如果拿奴隶制、农奴制的超经济剥削的事实同柳丝大屠杀的事实相比，哪一个更为惨烈呢？“三条石”、“包身工”、“收租院”的事实都是惨烈的；然而，同“四一二”惨案相比，哪一个更为惨烈呢？历史上，还有什么事情比滥杀无辜、草菅人命的事情更为惨烈呢？

——被超经济剥削和被因为一篇文章、一次集会、一个组建工会或其它社会团体的要求等等就被关进监狱，这两个事实，哪个更惨烈呢？周秀云以及同周秀云命运相似的千千万万个冤魂，是死于资本家之手，还是死于警察之手？或者，他们是死于“资本的统治”，还是死于“专制的统治”？

项观奇同志说：“经济上呢，中国工人阶级的劳动状况能和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里的工人阶级的劳动状况相比吗？中国资本剥削的残酷不同样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里也‘鲜有发生’吗？”

——是这样的。但是，这恰恰说明，专制统治同资本统治的不一致。这恰恰说明，资产阶级专制制度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不一致。这恰恰说明，“专制的统治远远大于、强于、惨烈于资本的统治”。

——在讨论专制统治和资本统治哪个更惨烈的问题时，项观奇同志强调了二者的因果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意见倒是一致的。富士康的N连跳事件固然是惨烈的，然而，是谁把富士康请进来并且保护起来的呢？可以说，没有专制的统治，就没有富士康之类的多如牛毛的惨烈剥削中国人民的血汗工厂。不仅如此，如果没有了专制的统治，一切奴隶制、农奴制的超经济剥削的现象，都会在一夜之间从中华大地上消失。

05、关于革命和政权问题

项观奇同志说：“你看，到了关键时刻，风雨如同志又退缩了，不取得政权，不解决哪个阶级统治的问题，那还是革命吗？没有政权，就是你们的人民民主革命也会流产。”

——人民民主革命难道不是革命吗，革命难道不包含着政权问题吗？世界上难道还存在着不是以政权为目的的革命吗？

06、关于官僚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

项观奇同志说：“只有主席的话，没有疑问。但你的发挥，有疑问。你的这一命题，是错误的，即：‘解决官僚资产阶级的革命是人民民主革命，解决一切资产阶级的革命才是社会主义革命。’在我看来，官僚资产阶级的本质也是资产阶级，一切资产阶级的本质也是资产阶

级，正因为他们的本质都是资产阶级，所以，我们反对这两种有区别的资产阶级的革命，要解决的这两种有区别的资产阶级的问题，都属于社会主义革命。正因为有区别，我们的社会主义再革命的步骤、策略，也会有区别，说第一步，第二步，也行，但是，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步、第二步，不是人民民主革命的第一步，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二步。”

——我认为“官僚资产阶级的本质也是资产阶级”这句话是值得商榷的。

——列宁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说：‘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只能这样理解并且应该这样理解。’我敢肯定，这是一种经院式的论断。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写出一本论述人类历史上的这种资本主义的书籍，因为我们现在才第一次经历这种资本主义。在此以前，关于国家资本主义写得还象样的书籍，都是在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这种条件、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文献》，1922年3—4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114页）

——如果拿列宁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同我们所说的“官僚资本主义”做简单的比较，当然是不正确的；但是，如果拿列宁所运用的分析“国家资本主义”的辩证逻辑的规则和方法来分析我们所说的“官僚资本主义”，则不仅是正确的，甚至是必要的。

“官僚资产阶级的本质也是资产阶级”和“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只能这样理解并且应该这样理解。”——这两种说法非常相似。但是，表面上看来是正确的命题，在实际生活中却是“经院式的论断”了。在这里，形式逻辑已经不起作用了，因为这两个命题恰恰都是符合形式逻辑的规则。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展开，我另外再写文章探讨吧。这篇文章已经够长了。

07、关于“创造发明”问题

项观奇同志说：“这里，风雨如同志大概找不到革命导师的支持他们的论点的语录，于是就强调创造发明。创造发明，总是必须的。但是，要正确。你们的问题在于离开了民主革命这一命题的特定含意，以为反对专制，争取民主，就是人民民主革命，其实，经过这几次的交锋，已经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这个理论是错误的，不是对马列毛主义的发展，而是对马列毛主义的背离。从理论上实践上对于我们目前要进行的社会主义再革命是有害的、非常有害的。希望同志们清醒。不要坚持错误。”

——我没有“强调创造发明”。我只是强调了“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来分析新的政治局势。”和“马克思主义不承认绝对适应于一切时代和时期的不变的结论和公式。”这些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常识。强调常识和“强调创造发明”隔着十分遥远的距离。

——“其实，经过这几次的交锋，已经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这个理论是错误的，不是对马列毛主义的发展，而是对马列毛主义的背离。”——这个结论恐怕为时过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是非，政治是非等等，还是让未来的实践来检验吧。

08、关于领导权问题

项观奇同志说：“这里最大的问题是，风雨如同志没有告诉我们，在这场革命中，到底哪个阶级取得了领导权，哪个阶级在革命中占主导。”

——恐怕，这个问题谁也无法“告诉我们”。是否能够争得领导权？在多大程度上争得领导权？这完全是一个实践问题，是属于无产阶级的历史主动性、能动性问题。我在上一篇文章中写道：“在即将到来的暴风雨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从理论上讲，有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无产阶级争取到绝对的领导权。……第二种可能：无产阶级没有争取到领导权，当了尾巴。……第三种可能：无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各争得大概一半的领导权，二者大体上势均力敌。或者无产阶级略强一点，或者自由资产阶级略强一点。”我个人认为，第三种可能性最大。——这些，都是理论分析。这种分析，不但是允许的，也是必要的。至于结局如何，不取决于我们的分析，而取决于无产阶级阶级力量的变化状况和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组织程度、斗争纲领和斗争策略的正确与否。到那时，也只有到那时，理论分析的对与错才能得到验证，“哪个阶级取得了领导权”的问题才能得到回答。

09、关于人民民主革命问题

项观奇同志说：“就目前我们所讨论的问题而言，不管是哪种情况，我认为，要么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通过共产党）社会主义革命，要么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所谓颜色革命。如同苏东。没有抽象的阶级属性不明确的人民民主革命的道路。”

——列宁针对孟什维克对“人民革命”（马克思语）的错误理解时写道：“在他们看来，除了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对立，再没有任何东西，而且他们对这种对立的理解也是非常死板的。”（《国家与革命》）

——中国正处在人民民主革命的前夜。这场革命是由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大部分民间资产阶级参加的阶级属性十分明确的革命，也是一场最为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革命。虽然我们不知道这场革命在哪一天开始，在哪一天结束，但是我们知道：这场革命是一次，也是第一次把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从复辟的官僚资产阶级专制制度的锁链里解放出来，从而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道路的伟大的革命。我们已经听到了她的脚步声。

最后，再一次感谢项观奇同志对我文章的指正，使我及时纠正了错误。这篇文章如有错误，仍希批评指正。

风雨如

2019年3月24日

人民民主革命论的要害问题清楚了

——评风雨如同志的《再回复项观奇同志》

首先，我要说，我们是在进行一场关于我们面对的革命的性质的严肃的理论探讨，进行这样的讨论，要有正确的态度。风雨如同志在回复我的大作中说：“读了项观奇同志《对〈回复项观奇同志〉的回复》，觉得：其中有的意见我可以接受并改正我的错误，其中有的意见我仍然不能接受并坚持我的观点。”我赞赏这样的态度和学风。这就是一种正确的态度和学风，能够接受正

确的批评，又能够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一切以正确与否为转移。我希望大家、自然包括我，都持这样一种正确的态度和学风。

看了《再回复》，我总得感觉是，问题越来越清楚，而且，问题的要害也越来越清楚。

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要害就是，反对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革命的性质，到底是人民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

我看问题就集中于此。其它的问题，是相应的次生的问题。下面，我就风雨如同志所列题目，一一做一点评论。

一 关于革命性质问题

先看风雨如同志自己的表述（均用黑体字）：

项观奇同志说：“在风雨如同志看来，‘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复辟’的革命，‘解决官僚资产阶级问题的革命’，是人民民主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我不同意，在我看来，只要是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不管是哪种具体的资本主义形态，总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有步骤，但是，不管有多少步骤、多少阶段，都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范围之内。”

——革命的性质是由社会的性质决定的。如果今天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一般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那革命的性质当然就是社会主义革命。问题是今天中国社会的性质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而是专制的资本主义。在专制的资本主义下所发生的革命，可能是资产阶级的不彻底的民主革命（例如“苏东剧变”），也可能是人民民主革命，唯独不可能是直接的社会主义革命。

——中国固然是个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它又是官僚资本主义社会，是实行法西斯专政的社会。正是官僚资本主义法西斯专政这个社会性质，决定了革命的性质是人民民主革命。“只要是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不管是哪种具体的资本主义形态，总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这种说法没有区分事物的“初级本质”和“二级本质”，更没有认识到“二级本质”的重要意义。例如，我们面前站着两个坏人，一个是小偷，一个是杀人犯。对于法官来说，可以不管他们俩是哪种具体形态的坏人，而给他们俩同样的量刑吗？

项观奇同志说：“同志们可以看出，有点转换概念了吧。好。就算这样，我很高兴，因为你说的正是社会主义革命！一场对官僚资产阶级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大革命，除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担当外，难道还有别的选择吗？如果把这样的革命称为人民民主革命，那就完全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就不是马列毛主义的观点了。”

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认为：一场对官僚资产阶级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大革命，除了人民民主革命可以担当外，难道还有别的选择吗？如果把这

样的革命称为社会主义革命，那就完全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就不是马列毛主义的观点了。

我完整地引述了风雨如同志的意见，虽然长了一点，但是能说明问题。问题就在，“一场对官僚资产阶级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大革命，除了人民民主革命可以担当外，难道还有别的选择吗？如果把这样的革命称为社会主义革命，那就完全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就不是马列毛主义的观点了。”

这是我们理论分歧的焦点所在。

这个焦点就是：“一场对官僚资产阶级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大革命”，到底是人民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

其实，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问题了。风雨如同志说，“正是官僚资本主义法西斯专政这个社会性质，决定了革命的性质是人民民主革命。”这个推论是不正确的。道理很简单。“官僚资本主义法西斯专政”的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就资本主义属性这一点来说，和民主共和国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同样的。这里没有多么深刻的道理。风雨如同志举例子说，“例如，我们面前站着两个坏人，一个是小偷，一个是杀人犯。对于法官来说，可以不管他们俩是哪种具体形态的坏人，而给他们俩同样的量刑吗？”这种举例子的简单类比的论证方法，我批评过，不是一个好的能够发现真理的思想方法。我们谈论的是社会形态的问题，哪小偷和杀人犯作比，很不合适。但是，哪怕就这个例子来说，风雨如同志的论证也说不过去。小偷和杀人犯，都是坏人，更准确说，都是罪犯。就罪犯这一点来说，其本质是共同的。所以要由法官判刑。这里的罪犯，就是定性，就像是资本主义定性。然后，根据不同的犯罪“形态”，给予量刑。这里的不同犯罪形态，就像资本主义的不同形态，是专制的还是民主共和的。这里的量刑，刑，就是要革命，要进行革资本主义命的社会主义革命；量，就是考虑革命的形式，鉴于我们面对的是实行法西斯专制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实行无产阶级领导的（通过共产党），以工农阶级为主力军的，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社会主义再革命。

不管是官僚专制的资本主义或者是民主共和国的资本主义都是资本主义，反对这两种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自然都是社会主义革命。专制也罢，民主也罢，是政体形式的不同，不是社会形态性质的不同，二者都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这一点，似乎风雨如同志也不持反对意见。只是因为存在专制，是专制的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在风雨如同志看来，进行反对这样的资本主义的革命就只能是人民民主革命。但是，风雨如同志和二次论的许多同志一样，始终没有回答，你们所谓的人民民主革命到底是无产阶级的人民民主革命还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一革命的目的，到底是要用怎样的新的社会形态代替打倒了的官僚资本主义社会形态？

按照风雨如同志这里行文的意思，好像人民民主革命实际是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意思，因为他说“如果把这样的革命称为社会主义革命，那就完全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

但是，风雨如同志又不接受这样的意见。他说：“历史上旧的民主革命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是，在今天，情况不同了。今天的人民民主革命具有两重性。毛泽东说：‘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長時期內是反帝反封建。在解放戰爭時期，我們又提出了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繁体字这几句是我补引

的，因为这是历史背景，是形成毛主席这个看法的历史条件。）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包含着两重性：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另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1960年2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3页）这个论断用在今天也是基本正确的。”

“反对‘官僚’资产阶级，意味着反对法西斯制度，意味着暂时不触动一般资产阶级的所有制，所以，这个革命带有资产阶级的性质。另一方面，反对官僚‘资产阶级’，又是反对资产阶级的主要部分——大资产阶级，绝对地触动它们的所有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所以，这个革命又带有社会主义的性质。”

毛主席的话很清楚，他是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推翻三座大山的口号而言的。而且，毛主席这里补充的意见，恰恰是“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这一点，因为过去并没有这样认识过。风雨如同志现在恰恰是抛弃这一点，而且，不要忘了，历史条件已经变化，我们面对的就是革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命的历史任务。就算是“这个论断用在今天也是基本正确的。”但是，你们的人民民主革命的提法恰恰没有把“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这一点体现出来。

相反，风雨如同志甚至认为“这个革命带有资产阶级的性质”。他的论辩的根据是，“反对‘官僚’资产阶级，意味着反对法西斯制度，意味着暂时不触动一般资产阶级的所有制，所以，这个革命带有资产阶级的性质”。

原来如此，人民民主革命竟然是“带有资产阶级的性质”的革命。这就是说，我们要进行一场带有资产阶级的性质的革命。更全面地说就是，我们要进行一场反对官僚资产阶级的带有资产阶级的性质的革命。这能讲得通吗？

也许，风雨如同志会说，不，因为他又说了，“另一方面，反对官僚‘资产阶级’，又是反对资产阶级的主要部分——大资产阶级，绝对地触动它们的所有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所以，这个革命又带有社会主义的性质。”

还是我肤浅。我真读不懂风雨如同志的意思。人民民主革命到底是什么阶级性质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呢？还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还是部份资产阶级革命、部份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哪一个占主导）？是哪个阶级领导这样的革命？等等，等等，这些非常重要的不可回避的要害问题，是不能用折中主义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去回答的。这些，我真得读不懂。还是请风雨如同志指教。

二 关于革命阶段问题

项观奇同志说：“风雨如同志这里明确说，提法应该是‘中国人民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需要分两步走’。但是，从上面的表述看，这个说法有自相矛盾之处。一是，既然把整个革命斗争称为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那完成了第一步，即解决官僚资产阶级的问题，不就完成了这一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了吗？还要什么第二步？二是，如果只是反对官僚资本主

义的斗争，又说第二步要‘解决一切资产阶级问题’，这样性质的第二步怎么能纳入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呢？官僚资本主义之所以划出来，不就是因为它不同于、不包涵‘一切资产阶级’吗？”

这个意见我完全接受，我的表述确实存在“自相矛盾”之处，感谢项观奇同志的指正。为了使我的表述克服“自相矛盾”，我决定将这个意思修改如下：

中国人民重新获得解放的斗争应当分两步走。第一步，开展人民民主革命，解决官僚资产阶级的专制统治问题；第二步，开展社会主义革命，解决一般资产阶级（非官僚资产阶级或民间资产阶级）的资本统治问题。前者是最低纲领，后者是最高纲领，没有最低纲领，就没有最高纲领。

项观奇同志在文章中引用了原来的话：“现在的专制统治是资产阶级的专制统治，是资本主义的专制统治，要解决专制统治的问题，只有革命，而这一革命，不仅是解决专制统治的问题，也是解决资产阶级统治的问题，资本主义统治的问题。当然，我们面对的历史条件决定了，这里的资产阶级首先是指官僚垄断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解决专制统治的革命离不开这一条。一旦，这样的革命胜利，难道仅仅是推翻专制统治的问题吗？难道不是推翻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的问题吗？这个政权，难道不要同时解决专制统治所维护的资本统治的问题吗？”

是的，人民民主革命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专制制度问题。只有在人民民主革命成功之后，才有可能解决“资本统治”即一般资产阶级统治的问题。这是两个问题，也是必须分开的两个历史阶段。

此外，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探索。在今天，一般资产阶级或民间资产阶级或非官僚资产阶级，是属于统治阶级的范畴，还是属于人民的范畴？我认为，它们属于人民的范畴。所以，在今天，不能把它们当作敌人和革命的对象。

官僚资产阶级是我们的主要敌人，一切非官僚资产阶级成员而拥护官僚资产阶级的人或曰官僚资产阶级的走狗是我们的次要敌人，一般资产阶级是我们今天的朋友，明天的敌人。

项观奇同志说：“这个解释是软弱的。不是我误解了风雨如同志用语的含意，而是风雨如同志做了新的解释。其实这个解释依然还是不通的。因为这和‘不首先解决专制统治的问题，就无法解决资本统治的问题’说法相矛盾，如果这句话里，专制制度包涵了资本统治，那首先解决的问题，也就包涵了解决资本统治，至少是官僚资本的统治，那这里的‘无法解决资本统治’也就是多余的了。”

我依然坚持我的“不首先解决专制统治的问题，就无法解决资本统治的问题。”的观点。在今天，我们必须将“专制统治”和“资本统治”加以区分。因为解决这两个问题的革命是性质不完全相同的革命，解决这两个敌人的斗争是性质不完全相同的斗争。只有完成了第一场斗争，才能开始第二场斗争。恩格斯说得好：“虽然它们彼此之间应当进行激烈的斗争，但是只有在它们彼此是单独地对立的时候，这一斗争才能进行到底。”（《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1865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2003年版，第112页）

风雨如同志的辩解是软弱的，而且，错误在加深。因为他说，“我依然坚持我的‘不首先解决专制统治的问题，就无法解决资本统治的问题。’的观点。在今天，我们必须将‘专制统治’和‘资本统治’加以区分。因为解决这两个问题的革命是性质不完全相同的革命，解决这两个敌人的斗争是性质不完全相同的斗争。只有完成了第一场斗争，才能开始第二场斗争。”

同志们可以看得很清楚。风雨如同志的一个错误认识就是，把反对实行法西斯专制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革命，人为地分成两场斗争，先是反对专制统治，然后再反对资本统治，在理论上提出所谓“我们必须将‘专制统治’和‘资本统治’加以区分”的说法。

这是站不住脚的。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都是先夺取政权，解决上层建筑的问题，随之，实现整个经济基础的变革，达到从政治形态到经济形态的全社会形态的革命。政治和经济是统一的，是一个统一体。具体到我们讨论的问题，怎么可以把法西斯专制统治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绝对割裂开来呢？法西斯专制统治和官僚垄断资本的统治是统一的，不可分的，因而是社会主义再革命的不可分割的统一的内容。

至于处理私营资本主义的策略，是一个从属的问题。这要看处理这一问题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不管实际会怎样处理这个阶级及其经济，相对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来说，它只有从属的意义。推翻法西斯专制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剥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是社会主义再革命不可分割的历史任务，是主导这场革命，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从而决定着这场革命的性质总纲。

三 关于国体和政体的关系问题

风雨如同志也做了反批评，他说：

项观奇同志说：“风雨如同志，不能转换概念。我们不是讨论的一般社会制度。我们讨论的针对的很具体，就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制制度，就是这种政治统治的形式，也就是政体。我们是同志之间讨论问题，故意转换概念的辩论方式不合适。”

我没有转换概念。我讨论的“制度”从来都不是抽象的，它就是指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法西斯制度。这个制度当然是政体。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何解决这个政体问题？

从理论上说，改变这种政体，有三种办法。第一，用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取代它。第二，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取代它。第三，用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民主共和国（人民民主国家）取代它。以今天中国社会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无非是这种关系的具体体现）来看，第一种办法是不现实也不可能的；第二种办法有一定的现实性和可能性，但是概率极小；只有第三种办法具有最大的现实性和可能性。

毫无疑问，政体是国体的形式。国体决定政体。但是，毛泽东说：“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矛盾论》）艾思奇说：“虽然内容决定形式，但形式并不是消极的、被动的因素，它对于内容有重大的能动作用。……不仅如此，当着不变更形式，内容就不能发展的时候，形式的变更甚至起着主

要的、决定的作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对于官僚资产阶级法西斯制度这个“政体”兼“形式”的变革，又一次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不实行这种变革，中国其它一切问题包括资本统治的问题都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我说风雨如同志转换概念，是从事实出发的，我找了“转换”这个很软的说法，但是，风雨如同志还是不接受。

我再讲事实。

现在，风雨如同志说，“我讨论的“制度”从来都不是抽象的，它就是指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法西斯制度。这个制度当然是政体。”

可是，在《回复项观奇同志》一文中，风雨如同志是这样说的，“《现代汉语词典》对“制度”的解释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系：社会主义制度。封建宗法制度。”在这里，“制度”就是“国体”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不知为什么，项观奇同志将“专制制度”理解的如此狭隘？更不知为什么，项观奇同志总是将解决“专制制度”的革命理解为“政体”的变更？这不仅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术语不通，也于现代汉语的词语含义不通。““我在我的文章中所说的“专制制度”，既包含了官僚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制度，也包含了官僚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和政治制度，是指整个社会制度。”

请同志们看一看，风雨如同志是不是一再转换概念。专制制度，到底是政体，还是国体，甚至是无所不包的社会形态，风雨如同志前后的说法是矛盾的、不一致的。

词典不错，制度，是个宽泛的社会形态的概念，专制制度，则主要是指政治制度是专制的。这是常识。我们讨论的是后者。风雨如同志以“制度”转换“专制制度”，离开了我们讨论的对象。

这件事，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何况风雨如同志现在也认为专制制度是政体了，老帐可以不算。

四、关于专制统治和资本统治的关系问题

对这个争论问题，风雨如同志也坚持他的意见：

项观奇同志说：“我是肤浅。但是，我读列宁的这类话，还是肤浅地想，这还不是说专制统治为经济剥削服务吗？有什么深奥的？列宁的话，我读不出风雨如同志说的，‘专制的统治’，‘远远大于、强愈、惨烈于资本的统治’。专制不残酷还是专制吗？看到这一点，更该认识到，这种残酷的政治统治和残酷的经济剥削是一致的。”

列宁说的非常明确：“资产阶级其他阶层的利益，整个资产阶级的更广泛的利益，以及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利益，必然要产生反对专制制度的自由主义反政府派。”如果说“专制的统治和资本的统治是一致的”，怎么会“产生反对专制制度的自由主义反政府派”呢？这怎么解释呢？

列宁说的非常明确：“如果说专制制度保证资产阶级有可能采用最粗暴的剥削方式，那么另一方面，专制制度却给生产力的广泛发展和教育的普及设

置无数障碍，因此不仅引起小资产阶级起来反对它，有时还引起大资产阶级起来反对它。”如果仅仅存在残酷的政治统治和残酷的经济剥削一致的一面，怎么会出现“不仅引起小资产阶级起来反对它，有时还引起大资产阶级起来反对它。”的情况呢？这怎么解释呢？不是說慘烈於的意思，而是列寧說的道理。

列宁说的非常明确：“所有这些社会主义者忘记了，专制制度的利益仅仅在某些情况下并且仅仅同有产阶级的某些利益相一致，而且往往不是同所有这些阶级的利益相一致，而是同它们的个别阶层的利益相一致。”“某些利益相一致”和“一致”难道是完全一致的吗？为什么忽略二者的不相一致，而仅仅强调二者的一致呢？这是什么原因呢？這是俄國。

代表官僚资产阶级的邓小平和代表自由资产阶级的赵紫阳，他们之间固然也有一致的方面，然而他们之间更有不一致的方面，而正是这不一一致的方面使他们之间的矛盾升级、激化，走向对抗。这是不争的事实。在今天，“专制的统治”坚持专制制度，“资本的统治”要求宪政民主。二者针锋相对，这怎么能说是“专制的统治和资本的统治是一致的”呢？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专制统治和资本统治既有一致的一面，又有矛盾的一面。并且，一致是相对的，矛盾是绝对的。所以，我们不能只看到二者一致的一面，而忽视二者矛盾的一面。二者矛盾的一面之所以不可忽视，是因为，革命，有可能在它们之间的厮杀声中打开缺口或拉开序幕。

项观奇同志说：“当然有争议。难道不正是在这种法西斯专制制度下，中国的资本主义剥削特别残酷吗？不是连奴隶制、农奴制的超经济剥削都复活起来了吗？”

是这样的。但是，我并没有说，资本主义剥削不残酷。“专制的统治远远大于、强于、惨烈于资本的统治”。这句话里并没有“资本的统治”不惨烈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专制的统治”比“资本的统治”更惨烈。同样，我也没有否认“连奴隶制、农奴制的超经济剥削都复活起来了”的事实。但是，如果拿奴隶制、农奴制的超经济剥削的事实同柳丝大屠杀的事实相比，哪一个更为惨烈呢？“三条石”、“包身工”、“收租院”的事实都是惨烈的；然而，同“四一二”惨案相比，哪一个更为惨烈呢？历史上，还有什么事情比滥杀无辜、草菅人命的事情更为惨烈呢？

被超经济剥削和被因为一篇文章、一次集会、一个组建工会或其它社会团体的要求等等就被关进监狱，这两个事实，哪个更惨烈呢？周秀云以及同周秀云命运相似的千千万万个冤魂，是死于资本家之手，还是死于警察之手？或者，他们是死于“资本的统治”，还是死于“专制的统治”？

项观奇同志说：“经济上呢，中国工人阶级的劳动状况能和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里的工人阶级的劳动状况相比吗？中国资本剥削的残酷不同样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里也‘鲜有发生’吗？”

是这样的。但是，这恰恰说明，专制统治同资本统治的不一致。这恰恰说明，资产阶级专制制度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不一致。这恰恰说明，“专制的统治远远大于、强于、惨烈于资本的统治”。

在讨论专制统治和资本统治哪个更惨烈的问题时，项观奇同志强调了二者的因果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意见倒是一致的。富士康的N连跳事件固然是惨烈的，然而，是谁把富士康请进来并且保护起来的呢？可以说，没有专制的统治，就没有富士康之类的多如牛毛的惨烈剥削中国人民的血汗工厂。

不仅如此，如果没有了专制的统治，一切奴隶制、农奴制的超经济剥削的现象，都会在一夜之间从中华大地上消失。

有风雨如同志的最后一段话，也就可以不争论了。我不喜欢太较真。

至于列宁的话，说的是当时的俄国，在反对沙皇专制统治时，列宁讲的这些情况是准确的，意见是正确的。这和我们今天面临的国情不一样。我不想多作讨论。但是，我要指出，二次论的同志总是爱把革命导师关于当年欧洲还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的一些意见，套用到中国今天，这是典型的离开现实实际的教条主义思想方法，不可取。

但是，如果说，专制制度好像脱离了官僚资本的统治，这个说法不准确。资本统治，不仅是私营资本的统治，也包涵而且占主导的是官僚垄断资本的统治。专制统治和官僚垄断资本的统治是一致的。

五、关于革命和政权问题

项观奇同志说：“你看，到了关键时刻，风雨如同志又退缩了，不取得政权，不解决哪个阶级统治的问题，那还是革命吗？没有政权，就是你们的人民民主革命也会流产。”

人民民主革命难道不是革命吗，革命难道不包含着政权问题吗？世界上难道还存在着不是以政权为目的的革命吗？

我的话，是针对风雨如同志的下列意见而说的：“项观奇同志所说的‘这一革命，不仅是解决专制统治的问题，也是解决资产阶级统治的问题，资本主义统治的问题。’是脱离了中国阶级斗争和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客观实际的，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愿望。”

照现在风雨如同志的意见，我说的有什么错？而且，在我看来，这正是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可能建立的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除非你们的人民民主革命夺取政权后是要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共和国的政权。

六、关于官僚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

项观奇同志说：“只有主席的话，没有疑问。但你的发挥，有疑问。你的这一命题，是错误的，即：‘解决官僚资产阶级的革命是人民民主革命，解决一切资产阶级的革命才是社会主义革命。’在我看来，官僚资产阶级的本质也是资产阶级，一切资产阶级的本质也是资产阶级，正因为他们的本质都是资产阶级，所以，我们反对这两种有区别的资产阶级的革命，要解决的这两种有区别的资产阶级的的问题，都属于社会主义革命。正因为有区别，我们的社会主义再革命的步骤、策略，也会有区别，说第一步，第二步，也行，但是，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步、第二步，不是人民民主革命的第一步，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二步。”

我认为“官僚资产阶级的本质也是资产阶级”这句话是值得商榷的。

列宁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说：‘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只能这样理解并且应该这样理解。’我敢肯定，这是一种经院式的论断。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写出一本论述人类历史上的这种资本主义的书籍，因为我们现在才第一次经历这种资本主义。在此以前，关于国家资本主义写得还象样的书籍，都是在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这种条件、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文献》，1922年3—4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114页）

如果拿列宁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同我们所说的“官僚资本主义”做简单的比较，当然是不正确的；但是，如果拿列宁所运用的分析“国家资本主义”的辩证逻辑的规则和方法来分析我们所说的“官僚资本主义”，则不仅是正确的，甚至是必要的。

“官僚资产阶级的本质也是资产阶级”和“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只能这样理解并且应该这样理解。”——这两种说法非常相似。但是，表面上看来是正确的命题，在实际生活中却是“经院式的论断”了。在这里，形式逻辑已经不起作用了，因为这两个命题恰恰都是符合形式逻辑的规则。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展开，我另外再写文章探讨吧。这篇文章已经够长了。

风雨如同志没有说出他的意见。我也不好与之讨论。至于列宁的话，我是赞成的。我不知道风雨如同志是怎样理解的。我有我的理解，我明白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错在哪里，也不止此人有这样的错误，当时，很多人不理解这个问题，甚至以为列宁背叛了革命。风雨如同志没谈自己的意见，我也就不多说。这里只强调，我说的官僚资产阶级的本质也是资产阶级是一个正确的意见，和形式逻辑无关。我希望看到风雨如同志的文章。

七、关于“创造发明”问题

项观奇同志说：“这里，风雨如同志大概找不到革命导师的支持他们的论点的语录，于是就强调创造发明。创造发明，总是必须的。但是，要正确。你们的问题在于离开了民主革命这一命题的特定含意，以为反对专制，争取民主，就是人民民主革命，其实，经过这几次的交锋，已经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这个理论是错误的，不是对马列毛主义的发展，而是对马列毛主义的背离。从理论上实践上对于我们目前要进行的社会主义再革命是有害的、非常有害的。希望同志们清醒。不要坚持错误。”

我没有“强调创造发明”。我只是强调了“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来分析新的政治局势。”和“马克思主义不承认绝对适应于一切时代和时期的不变的结论和公式。”这些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常识。强调常识和“强调创造发明”隔着十分遥远的距离。

“其实，经过这几次的交锋，已经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这个理论是错误的，不是对马列毛主义的发展，而是对马列毛主义的背离。”——这个结论恐怕为时过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是非，政治是非等等，还是让未来的实践来检验吧。

我的看法不变。是非已经比较清楚。风雨如等同志如果坚持自己的意见，那我多说也没有用，就各自保留自己的看法吧。我们的讨论可以大体到此为止，因为我们还有更重要的实践课题要做。

八、关于领导权问题

项观奇同志说：“这里最大的问题是，风雨如同志没有告诉我们，在这场革命中，到底哪个阶级取得了领导权，哪个阶级在革命中占主导。”

恐怕，这个问题谁也无法“告诉我们”。是否能够争得领导权？在多大程度上争得领导权？这完全是一个实践问题，是属于无产阶级的历史主动性、能动性问题。我在上一篇文章中写道：“在即将到来的暴风雨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从理论上讲，有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无产阶级争取到绝对的领导权。……第二种可能：无产阶级没有争取到领导权，当了尾巴。……第三种可能：无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各争得大概一半的领导权，二者大体上势均力敌。或者无产阶级略强一点，或者自由资产阶级略强一点。”我个人认为，第三种可能性最大。——这些，都是理论分析。这种分析，不但是允许的，也是必要的。至于结局如何，不取决于我们的分析，而取决于无产阶级阶级力量的变化状况和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组织程度、斗争纲领和斗争策略的正确与否。到那时，也只有到那时，理论分析的对与错才能得到验证，“哪个阶级取得了领导权”的问题才能得到回答。

既然风雨如同志这样说，我也就不必再问。

但是，作为以马列毛主义为指导的一个共产党，对自己面临的革命任务是必须回答这些问题的，必须有一条正确的革命路线，我们之所以要讨论这些理论问题，也是为了这个目的。

同志们想一想吧！

九、关于人民民主革命问题

项观奇同志说：“就目前我们所讨论的问题而言，不管是哪种情况，我认为，要么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通过共产党）社会主义革命，要么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所谓颜色革命。如同苏东。没有抽象的阶级属性不明确的人民民主革命的道路。”

列宁针对孟什维克对“人民革命”（马克思语）的错误理解时写道：“在他们看来，除了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对立，再没有任何东西，而且他们对这种对立的理解也是非常死板的。”（《国家与革命》）

中国正处在人民民主革命的前夜。这场革命是由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大部分民间资产阶级参加的阶级属性十分明确的革命，也是一场最为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革命。虽然我们不知道这场革命在哪一天开始，在哪一天结束，但是我们知道：这场革命是一次，也是第一次把中国无产

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从复辟的官僚资产阶级专制制度的锁链里解放出来，从而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道路的伟大的革命。我们已经听到了她的脚步声。

最后，再一次感谢项观奇同志对我文章的指正，使我及时纠正了错误。这篇文章如有错误，仍希批评指正。风雨如 2019年3月24日

我还能说什么呢？已经没有必要再说什么。一切都是清楚的。只有二次论的同志才能弄得懂“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道路的伟大的革命”到底是什么革命。

谢谢风雨如同志的客气。重要的是我们要虚心地对真理，真诚地接受真理，把真理看得高于一切。和风雨如同志共勉。

项观奇 2019.4.8 四八烈士纪念日

就太行玉笛同志的大作略作讨论

项观奇

太行玉笛同志（以下简称太行）将他在2013年2月发表在红旗网上、并在同年8月重发的大作，昨天在我们红群里发表出来。这对于我们讨论所谓“二次革命论”的问题（现在知道了，太行他们实际是革命阶段论者），是很有好处的。

我觉得太行的文章写得很用心，一些意见也讲得挺好。我读后，很高兴，因为在我们的队伍里，多一点有理论研究能力的同志，对于我们担当的伟大历史使命是非常必要的。

我觉得分歧不是很严重。所以，我想就太行的大作，加一点评语，略作讨论，也许这样就能够消除分歧。这是我的愿望。

为了便于看清分歧，我采取评论太行大作原话的方式，一一列举。这样，我写起来方便，大家阅读也方便。

一、太行大作的题目说明，他实际还是社会主义革命论者。

他的大作的题目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推翻专制制度，争取政治自由》

既然是“无产阶级革命”，那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甚至共产主义革命，是同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特定历史内容，就是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就是实现共产主义。无产阶级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是这两个阶级的阶级本性的根本不同决定的。

二、太行大作一开始，就写了他的一个重要的基本的意见。

“他说：把马列毛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再声明：

针对中国这样一个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又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国家，由于现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性质，由于复辟后当政的官僚资产阶级集团对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实行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中国依然存在封建特色的专制制度，分析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各社会阶级的现状，可以而且应该得出结论：中国无产阶级旨在重建共产党、重建无产阶级专政、重建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二次社会主义大革命需要分两步走。第一，推翻官僚专制制度，重建无产阶级为主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第二，在达到上述革命目标的基础上，不停顿、有步骤地进入以消灭私有制、消灭整个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为目的的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这是汲取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经验，把马列毛主义和当前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政治主张。是坚持马列毛主义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的辩证统一论的正确革命主张。

由于资本主义复辟后中国历史的大倒退，由于当政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多重阶级属性，由于专制制度的存在，大革命的第一阶段（即准备阶段）的政治目标或纲领，只能是推翻专制制度，争取人民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政治自由，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因为这个阶段革命的性质主要的还是民主革命的性质，所以我们称之为人民民主革命，以区别于历史上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当然不是说，人民民主革命要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因为它实质上是无产阶级第二次社会主义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任何把这两个阶段既然分开，甚至对立起来的观点都是机械的、片面的、形而上学的思想观点。

当然，不能否认第一阶段的革命也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因为官僚资产阶级也是资产阶级，尽管它和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不同，有着明显的封建和买办的特点。这也正说明这场大革命的两个阶段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

这段话中是有几点可以讨论的。

1、太行承认，“中国这样一个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又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国家”，承认“现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性质”，既然中国社会的性质是资本主义的，那么，这里的专政，其基本阶级属性也应该是资产阶级的，即资产阶级专政。但是，太行没有强调这一点，而是说“由于复辟后当政的官僚资产阶级集团对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实行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中国依然存在封建特色的专制制度”。但是，就算是这样，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在这个复辟了资本主义的中国，现在的专政，到底是不是资产阶级专政。有法西斯，有封建特色，是专制制度，但是，这些特点到底隶属于资产阶级专政，还是隶属于封建地主阶级的专政。不管有多少封建性，到底是资本主义属性占主导，还是封建主义属性占主导，是不能模棱两可的。这涉及到我们要革什么阶级的命，要进行一场怎样性质的社会革命。在我看来，不管带上多少封建性，资本主义还是占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专政还是其基本属性，因此，我们要革资本主义的命，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自然，如列宁所教导的，当我们从事这一革命的时候，理所当然地要顺便扫荡封建性。太行强调封建性不错，但是，不说、不强调资产阶级专政，不妥。

2、接下来，太行认为：“分析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各社会阶级的现状，可以而且应该得出结论：中国无产阶级旨在重建共产党、重建无产阶级专政、重建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二次社会主义大革命需要分两步走。第一，推翻官僚专制制度，重建无产阶级为主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第二，在达到

上述革命目标的基础上，不停顿、有步骤地进入以消灭私有制、消灭整个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为目的的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这个“两步走”，别人称之为“二次革命论”。怎么个叫法，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不对。我认为这个两步走的设想和论述是不对的。

第一步，怎么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呢？正是。重建无产阶级为主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就是重建无产阶级专政，只是，限于历史条件，只能建立以无产阶级为主导（通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多阶级联盟的人民民主专政。这是决定一切的政权的变动。这正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第二步，是政权在手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没有第一步，夺取政权，第二步是谈不到的。夺取政权，正是革命的最重要的标志。这里，当然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标志。没有这场革命，“不停顿、有步骤地进入以消灭私有制、消灭整个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为目的的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存在的。这是一场革命，同属社会主义革命。只是形式低一点，从人民民主专政做起。

3、太行还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复辟后中国历史的大倒退，由于当政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多重阶级属性，由于专制制度的存在，大革命的第一阶段（即准备阶段）的政治目标或纲领，只能是推翻专制制度，争取人民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政治自由，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因为这个阶段革命的性质主要的还是民主革命的性质，所以我们称之为人民民主革命，以区别于历史上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当然不是说，人民民主革命要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因为它实质上是无产阶级第二次社会主义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任何把这两个阶段既然分开，甚至对立起来的观点都是机械的、片面的、形而上学的思想观点。

当然，不能否认第一阶段的革命也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因为官僚资产阶级也是资产阶级，尽管它和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不同，有着明显的封建和买办的特点。这也正说明这场大革命的两个阶段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

这一段的论述，问题更多，也更大一点。因为涉及到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和纲领。

说“由于当政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多重阶级属性，由于专制制度的存在，大革命的第一阶段（即准备阶段）的政治目标或纲领，只能是推翻专制制度，争取人民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政治自由，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

这段话有几点不妥。

怎么叫多重阶级属性？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基本阶级属性就是资产阶级，任何一个阶级都会有特点，资产阶级也可以带上封建性，但是，基本的阶级属性只能是资产阶级的，很难说是多重的。这样说，会模糊这个阶级的基本阶级属性。任何事物总是由占主导地位的矛盾方面确定事物的性质的。

把推翻专制制度，夺取政权，从而成为统治阶级的革命称为大革命的第一阶段（即准备阶段），是不正确的。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政权在哪个阶级手里这一点是决定一切的，这是大家熟知的道理。怎么可以把这一斗争，称之为准备阶段？这不是准备阶段，这正是革命！百分之百的革命！

说“大革命的第一阶段（即准备阶段）的政治目标或纲领，只能是推翻专制制度，争取人民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政治自由，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因为这个阶段革命的性质主要的还是民主革命的性质，所以我们称之为人民民主革命”。这里的很多说法是不正确的。最大的问题在于，把我们进行推翻专

制制度的革命，仅仅局限于是“争取人民民主和无产阶级政治自由”的革命，说“这个阶段革命的性质主要还是民主革命的性质”。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按照这里的说法，实际是把我們面临的历史任务仅仅规定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面临的历史任务，结果，自然就把我們面临的社会主义革命混淆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这里，人民民主革命的提法，是不正确的。同志们都知道一个常识，所谓“民主革命”，总是、就是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导师从来就是这样使用这一概念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从来不说无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为什么？道理很简单。无产阶级的革命，决不是仅仅争取民主的革命，而是，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从科学意义上来说，无产阶级革命最终是要实现民主的消亡的，这一点，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有明确的说明，他借用恩格斯的话说，“社会民主主义”这个党的名称“对于政治上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整个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党来说，这个词还是不确切的”。列宁指出，“民主愈完全，它成为多余的东西的时候就愈接近。”“民主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不是一个东西”。正是基于这个道理，无产阶级革命从来不会用民主革命来表达。哪怕是一个时期的口号，可以明确提出，我们要争取民主，但是，不能用“民主革命”来表达，就是“人民民主革命”也不对。当着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都明确指出革命还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没有使用无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样的概念。

这是一个许多人常犯的错误，因而可以原谅。但是，作为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犯这样的理论错误到底还是不应该的。要想读懂马列毛的书，还要下功夫。

“推翻专制制度，争取人民民主和无产阶级政治自由，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对。但是，实现这一切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共产主义革命，虽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艰难的不断革命的过程。但是，这个目标和纲领是必须明确的，是不能称之为民主革命的。我们要夺取政权，要人民当家作主，但是，目标和纲领并不到此为止，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是最终目标和纲领。因此，把这种夺权斗争，称之为人民民主革命，是大革命的准备阶段，是完全错误的。这是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准备阶段，而是进行阶段，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夺权斗争阶段。推翻专制制度和夺取政权是统一的，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任务。

可以看出，这个提法的最大的问题，在于不敢举起社会主义这面旗帜，一场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革命，不提社会主义革命，而提人民民主革命，这二是不符合马列毛主义的理论，二是不符合我们面临的历史实际、历史任务，三是将会失去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也许是为了联合自由民主派资产阶级而不去惊动这个阶级，要是这样想，那错误就更大一点。看起来，这样提口号，也许会和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派达成暂时的联合，但是，这更会失去工农群众的支持，不要忘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基础和力量源泉，来自工农群众，一旦失去工农群众的支持，我们就没有资格和力量去和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派争夺革命的领导权。

以上太行所论，是太行大作的基本观点，可以说是太行大作的总纲。我讨论得多一点、细一点。下面太行的文字，都是一些具体问题。我就只简要地加几句评语说一说。我想，足够了。我的评语用黑体字。

一、“没有封建地主阶级就不存在人民民主革命”吗？

民主革命的任务是什么？是推翻封建专制制度，打倒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改变封建土地占有制，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变革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进而变革整个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

这里，一是推翻封建专制政权；二是变革封建生产关系；三是变革封建上层建筑。这三个任务是缺一不可的。除掉任何一项，都不能说是完整地、彻底地完成了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但是，这个革命本来的领导阶级——资产阶级是不能也不愿意完整地彻底地完成这个任务的，这是由于其反封建的不彻底性和妥协性决定的。从世界范围看，就中国这样一个经历了两千多年封建统治的国家来说，彻底地完成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的任务就显得更为沉重。

历史证明，资产阶级不是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更是这样，而只有愿意同一切私有制决裂的无产阶级才是最彻底的民主主义者。所以，历史上，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就只能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完成。

封建政权垮台了，地主阶级打倒了，封建生产关系废除了，上层建筑领域里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和封建习惯势力正在被清理。然而，由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走资本主义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矛盾的凸显，在上层建筑领域里铲除封建主义，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就只能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合并在一起了。

全国解放以后直至 1976 年，毛泽东始终都没有忘记领导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同被打倒的、时刻梦想变天复辟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斗争，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反对封、资、修的激烈斗争，批林批孔运动等等，这些已为大家熟知。这些斗争，准确地说，尤其是思想文化等上层建筑领域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实质上也是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补充和完善。

这是对的。这是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长期的历史任务。从马到列到毛主席，都是这样说的，没有纯粹的历史现象，社会主义革命继续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未完成的历史任务，正常。但是，这是社会主义继续革命。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继续，相反，资产阶级常常会把旧的反动的落后的东西复活起来。

1976.10.6 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以后，历史发生了大倒退。随着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重新被扶植起来，打着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旗号的封建官僚专制体制也死灰复燃，种种封建主义的东西也在政治和文化等上层建筑领域严重回潮。关于这一点，我已经在过去的文章里做过说明。而“马列毛主义战士”也在他的文章里作了具体论述。

但是，这些都是从属于最坏的资本主义，一旦，重建社会主义，这又从属于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历史任务。

我们暂且不论是否还有一个地主阶级的问题（这一点下面会谈到），我想和清源等同志先搞清楚，当前中国有没有专制制度存在的问题？

“什么是专制制度？专制制度（专制政体，无限君主制）是一种最高权力完全地整个地（无限制地）由沙皇一人独占的管理形式。沙皇颁布法律，任命官吏，搜刮和挥霍人民的钱财，人民对立法和监督管理一概不得过问。因此，专制制度就是官吏和警察专权，而人民无权。”《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1899 年底）

载于 1924 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 8—9 期合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第 4 卷第 240—273 页

这不是非常符合当今中国的政治现实吗？“沙皇一人独占”和“垂帘听政”、“退休了还幕后主政”、“一人为主，六人（或八人）配合的一个大官僚集团独占”有什么区别？

专制制度的存在是封建政治的典型特征。如果清源同志非要把人民被官吏和警察捆住手脚，堵住嘴不许说话，说成是资本专制，而不是封建专制，那就说明是他把基本概念搞混了。固然这两种专制都是在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不许人民群众起来造反，而且和社会主义的人民专制相比，它们都是落后的，反动的。但是，历史地看，辩证地看，资本专制比封建专制进步，资产阶级民主比封建式“民主”（例如大臣宫廷议事）进步，这难道可以否定吗？一个是锁住你的手脚，堵住你的嘴，人民没有丝毫的民主权利；一个是允许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有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罢工的权力，哪一个更好些呢？

三十多年来，官僚资产阶级统治集团不仅残酷地镇压、迫害了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上千万无产阶级优秀分子，而且把后来反抗他们反动统治的以 MG 为代表的一切革命者，以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罪的名义投入监狱。为防止人民大起义，把国防军裁编为武警部队，和庞大的公安部队一起“维稳”，致使国家对付老百姓的“维稳”费用超过了国防军费的开支。对上访群众设立黑监狱，甚至连人民纪念毛泽东的群众活动也被宣布为“非法”，还把带头人抓去劳教。对工人反对资本家的罢工和每年数万起群众维权运动进行无情打压，对一切试图维护民权的人进行迫害。…

这里，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为了使人民不能反抗，连宪法上明文规定的、一般资本主义国家都允许的那些最基本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罢工等民主权利也取消了。这等于把人民的手脚束缚起来，把他们的嘴堵住，只许压迫，不许反抗。更令人嗤之以鼻的是，这个拥有几百万强大军事武装力量的统治者竟然会害怕几个小小的红色网站，动辄封网封频道，封闭旗帜网、马评网和红色中国网等为代表的十几个红色网站至今一年还不敢开通。足足暴露出其反动腐朽怯懦的专制本性。

请问，在这样一个对人民实行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的专制国家里，推翻专制制度难道不是人民民主革命的任务吗？置言之，不需要进行一场推翻专制制度的人民民主革命吗？

当今中国，看一个人是不是革命的，关键要看他对官僚资产阶级专制统治的态度。凡是以各种方式坚决反对这个封建法西斯专制统治的，他就是站在了无产阶级和革命的人民群众一边。反之，以各种方式维护这个专制统治的，他就站在了反共反人民的官僚资产阶级一边，而不管他口头上怎样地标榜自己。

这里的要害问题在于，太行不承认资产阶级有个法西斯专政的问题。这是直接违背主席教导的。主席明确说，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就会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就会搞资本主义复辟，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主席用希特勒比戴高乐坏，生动地准确地告诉我们有一个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的问题。怎么一说专制，就只有封建专制呢？中国自先秦商周（夏资料不够），就是专制政体，那时，还没有进入地主制社会呢。

我们就封建主义在政治和文化等上层建筑领域严重回潮，或封建主义的东西在社会中普遍存在这个问题进行分析，是否还有一个人民民主革命的任务？

清源同志把我们举出的大量事例，说成只是一种封建形式的回归，而不是封建内容的回复（这种把形式和内容割裂开来分析事物的方法表明了他长期错误的思维方式，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内容），那么，请问：

如果说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竖起孔夫子雕像只是封建形式回归的话，那么，特色党在国内和世界各地办孔子学院，传播儒经是什么？

如果年年举办大型祭孔活动，在某些学校举行孔子拈笔礼只是封建形式的话，那么打着弘扬国学的旗号，提倡尊孔读经，对幼儿园的儿童都倡导背“三字经”、“弟子规”是什么？

如果大修庙宇求神拜佛之风仅仅是形式的话，那么，银幕上连篇累牍的所谓历史剧，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充斥舞台，传播的又是什么内容？

如果“弱势群体”们为了维权而求“清官”为“民”做主只是形式的回归的话，那么，接连发生的访民集体下跪事件，表现的是否国民潜意识中根深蒂固的“青天大老爷”和“我等小民”的封建奴性心理？

二十世纪末“新慈禧”垂帘听政丑剧的上演，军事大司马自封核心以“枪指挥党”，接二连三废黜党国最高领导人，指定甚至隔代指定接班人，这些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垄断大资产阶级都难以办到的，在这个有特色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却成为现实。这体现的是资本专制吗？所以，我们说官僚资产阶级专制是封建性的专制难道不是事实吗？

要看到，之所以官僚资产阶级能够复辟三十多年没被推翻，与封建特色专制制度的恢复和封建理念对国民意识的深层影响有着重要的关联。这样看来，在一个“没有封建地主阶级的”社会里，同样也有一个人民民主革命的任务。

如果那些严重影响国民意识的封建旧思想、旧文化、旧习惯不在革命的过程中抛弃掉，人民群众中的民主意识不能再次激发出来，人民群众中社会主义的民主思想就难以树立，社会主义革命也就会向后延迟。

这里，太行对清源同志形式和内容说法的批评意见，我同意。主要是封建思想文化的复辟。既有形式，也有内容。二者统一。但是，我们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继续革命就是要扫除这些封建余毒，把反封建反迷信的斗争继续进行下去。这正是我国社会主义再革命的历史任务，而不是人民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

二、封建地主阶级的隐形转化。

党的“十大”《政治报告》早就预言：如果刘、林一类上台复辟资本主义，必然要把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重新扶植起来。修正主义的法西斯党，就会对中国人民实行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

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个科学的论断完全符合我国阶级斗争的实际。

三十多年过去了，被重新扶植起来的旧的地主阶级成员基本上死光了。但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这一点马列毛主义战士已经在他的《与清源同志商榷——今天的中国是否存在残存的封建地主阶级？》一文中讲清楚了。

虽然是“残存”，但是能量不可低估。因为这个被打倒三十年后又重新被扶植起来的反动阶级有着广泛的厚重的思想和政治文化基础，党国的政权机构里还有他们的政治代理人。所以他们的政协委员敢于公开在政协会议上提议恢复封建帝制，不久前互联网上还有署名“爱新觉罗氏”的，要为封建皇帝家族翻案等等。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还应该注意，复辟以后，这个曾经向原来的农会和党的基层干部反攻倒算的反动阶级，又把他们的政治希望寄托到了打着共产党旗号的当政的官僚资产阶级身上。这不仅是因为这个官僚资产阶级集团推行了一条符合他们阶级利益的路线，而且这个集团内的许多成员本身就出身于地主阶级，他们的总头子邓小平就是出身于官僚大地主家庭。当初，他们这些人参加民主革命并不是为了什么共产主义，他们“思想上并没有入党。他们的世界观还没有跳出小生产的圈子。”“他们加入共产党，为无产阶级办事，不过是为了抬高自己这个商品的等级，不过是为了向无产阶级要高价。”

合作化时期，他们就听从他们的地主老子的意见反对农村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文革时期，他们对自己的地主老子接受贫下中农的批判怀恨在心。现在，他们这个在文革中被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打倒在地地的阶级复辟了，于是，对文革和造反派彻底的清算就开始了。解散人民公社，让贫下中农“一夜退回解放前”，重走一家一户单干的老路，美其名曰“联产承包责任制”，而且一包三十年不变。工业上，以企业改制为名，强制毛泽东共产党建立培养起来的对社会主义制度充满热爱的五千万工人大军统统下岗、失业，这种疯狂的阶级报复也使顺理成章了。这里，我们分明听到了被扶植起来的地主阶级那咬牙切齿的声音：你们这些穷鬼，分了我的地，想搞社会主义，没门儿！

然而，这个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治代理人，虽然敢于借口“资本主义还没有在中国得到充分发展”，而“补资本主义的课”，甚至把新生资本家封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拉入党内。却怎么也不敢让被打倒的地主阶级再次光明正大地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因为他们也害怕否定自己执政的合法性，只能用新的更隐蔽的方法掩盖他们的罪恶目的。这就是农村没有再出现地主土地占有制的根本原因。

为了搞清这一点，不得不看一看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农业生产关系的区别。我们知道，封建社会的农业生产关系，只涉及地主和农民两个阶级。地主靠地租剥削农民，不借助于劳动力的买卖。封建地租吞没了农民的全部剩余产品。

而资本主义的农业关系则涉及土地所有者、农业资本家（或租地农场主）、农业雇佣工人三个阶级。土地所有者和农业资本家共同剥削农业工人的剩余价值。有些农场的土地所有者和农业资本家是同一个人。于是这位一身二任的剥削者对农业工人进行了双重的剥削：先是以农业资本家的身份剥削一次，然后又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剥削一次。

以上就是资本主义农业与封建农业关系的根本区别。存不存在地租剥削形式，有没有农业资本家（农场主）和失去土地专以为农业资本家打工为生的雇佣农业工人，是基本的标志。

资本主义复辟后，中国农业生产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已经普遍形成了农业资本家和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农业工人这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吗？

地租形式的剥削消灭了吗？

在中国农业中，随着允许土地流转政策的颁布，农场主（农业资本家）和农业工人还刚刚产生。几亿农民的大多数仍然是靠租用国家（集体）土地为生，尽管其中一部分在农闲时可以外出打工以资养家。

农民依靠艰辛的劳动在承包的土地上获得的粮食，除下自己的食粮，必须缴公粮。多余的部分可以作为余粮卖给“国家”，价格低自不必说，主要是不

能得到现钱，只能拿到一张不知何时才能对兑现的“白条子”。加上农用工业品价格连年上涨，自下而上的沉重剥削逼得广大农民发出了“中国就缺陈胜吴光了！”的呼声。全国各地不断发生农民起来抗粮抗捐的事件，统治阶级就要坐不稳了，连老谋深算的陈云也不得不惊呼“谷贱伤农”。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2003年以后，胡温政权对反抗日益激烈的广大农民做了妥协，被迫取消农业税，不再让农民交粮租，每亩地给点补助的原因。但是，很快，化肥、种子、农药等农用品价格的飞涨就抵消了农民从统治者的妥协那里得到的部分好处。

剥削阶级是不会改变他的剥削本性的。几亿农民不用再“交皇粮”了，真是天大的好事！但是，官僚资产阶级这个大土地所有者是不会也不甘心这么下去，让农民白白地使用土地的，况且还要给补助。于是，他们开始在土地问题上做起了文章。

以招商引资发展工业搞“开发区”为名，用低廉的价格大肆侵吞占用农村土地，以房地产开发为名，在城乡大搞“拆迁”，把大片大片的土地卖给富豪建别墅，搞起了“土地财政”。最近又提出的全国农村城镇化，把农民赶上楼，则是为了把这种“土地财政”推到它的顶端。

问题很清楚，这个以“国家”名义出现的官僚资产阶级，它的从中央到地方的相关机构，各级政府的一、二把手和有关负责人，直到农村支部书记、村长，成了实际上的大大小小的土地所有者——“地主”。土地的使用、开发、出租、转让、出售等都是他们说了算，广大的农民是没有权利的。这就是广东乌坎和全国许多地方发生农民抗暴的根本原因。

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候，失去土地的农民转化为工业雇佣工人和农业雇佣工人，而一部分地主则转化为土地所有者或农业资本家。

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后，还保持着原来的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关系吗？答案是否定的。

农业已经改变为农业工人向农业资本家（农场主）出卖劳动力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了吗？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也还是最近几年的事情，而且没有普遍性。

中国农业究竟属于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呢？

农民还是在租用国家（集体）的土地上辛勤耕作的农民。公开的私人占有大面积土地的“地主”，被那些戴着红帽子的各级政权机关中的官僚分子代替了。

老的地主阶级死了，新的“地主”阶级产生了，他们就是打着共产党旗号的兼有大土地所有者（大地主）身份的官僚资产阶级统治集团，而且这个集团中的许多官僚资产阶级分子本身就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

问题在于，我们很多左派同志通常习惯把这个以“国家”名义出现的大土地所有者，也当做超阶级的“国家”，而看不清这个以“国家”名义出现的大土地所有者的阶级面目。他们和广大农民的关系，实际上还没有脱离封建农业生产关系中地主和农民的关系。对于复辟后再次被扶植起来的地主阶级发生的这种隐形转化，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同志忽略了这一点。

今年年初的中央一号文件，实际上是推进中国农业资本主义化进程的号令。所谓“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等等，不过

是为了进行新的“圈地运动”，夺取农民租用的土地，使他们变成失掉土地为农业资本家打工的农业雇佣工人罢了。

农村最初的责任制，实际还是复辟、发展小农资本主义经济。直到今年的一号文件，对农村的经济改革还是拿不出办法。在这四十年的改开过程中，农村的问题是和全国的资本主义复辟相统一的。至于这里所揭露的许多问题，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必然产物，实质还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农民的剥削。这还不能概括为封建生产关系的复辟，所以，文中也没有明确这样说，也的确不好随意下结论，因为这关系到革命的对象和革命的斗争方向、斗争策略。这是必须非常慎重的，前提是必须正确分析农村经济关系。

另外，不要忘记，在宏观考察全国问题时，工业农业相比，工业占主导，城市农村相比，城市占主导。

三、如何确定革命第一阶段的性质？

这是由当前阶段的社会性质、革命主要对象的性质以及革命任务的性质所决定的。

前面，我们已经搞清楚：一，即使没有一个封建地主阶级，中国也还有推翻专制制度并在上层建筑领域铲除封建主义的政治、思想和文化的民主革命的任务；二，资本主义复辟后被扶植起来的地主阶级已经隐形转化为新的大土地所有者（地主）——官僚资产阶级，他们可以随意支配土地，中国农业还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封建生产关系。因此，打倒这个大土地所有者也同样是民主革命的任务。

就是说，上述革命任务还都属于民主革命的性质

由于第一阶段的主要革命对象——官僚资产阶级，既有封建地主阶级的属性，也有官僚买办阶级的属性，自身又是垄断资产阶级，所以，打倒官僚资产阶级的革命不仅有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政治意义，也有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意义。换句话说，革命不仅是民主革命的性质，也带有一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那种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截然分为两体的观点是错误的，不符合事实的。试问，官僚资产阶级集团的主要成员中，哪一个不是和美帝国主义、国际资本财团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的联系？

这里的论述，只能证明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再革命的过程中，会必然地附带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没有完成的历史任务，也包括清除资本主义复辟四十年中封建思想文化的死灰复燃。

有人就这场严肃的政治争论向他们认为的“民主革命论者”（即所谓的“二次革命论者”）发出了下面的通牒：“民主革命论”者如不能正面回应以下问题，就免谈了。

关于当前关于当前无产阶级面临的是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探讨和争论，……现在，这个探讨和争论已经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事实上已经争论的很清楚了。为了不至于老是拘泥于这个问题的争论而妨碍了其他方面的工作，请主张搞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论者正面回应以下问题，如果不能正面回应，就免谈了。（注意：这些问题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旗帜、纲领、路线等方面的重大原则问题，这里不涉及策略问题）

1、社会的性质

社会主义革命论者：资本主义的性质。

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论者：

2、社会的主要矛盾

社会主义革命论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

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论者：

3、革命的性质

社会主义革命论者：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

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论者：

4、革命的对象

社会主义革命论者：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论者：

5、革命的前途

社会主义革命论者：无产阶级专政。

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论者：

6、革命的动力阶级

社会主义革命论者：无产阶级和包括小资产阶级（劳动阶级，不是小资本家阶级）在内的其他劳动阶级。

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论者：

作为无产阶级不断革命和革命阶段统一论者，即马列毛主义无产阶级革命论者，只好奉命答卷。

1、当今社会的性质

社会主义革命论者：资本主义的性质：

马列毛主义无产阶级革命论者：

当今中国社会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官僚资本主义或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前一种说法没有指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个别性），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大忌，无产阶级的理论越切合实际，越有针对性，越好。

同意後者。

2、社会的主要矛盾

社会主义革命论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

马列毛主义无产阶级革命论者：

前一种说法本身没错。但是没有指出在官僚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矛盾的焦点。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广大人民群众与一小撮官僚资产阶级的矛盾，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当前社会条件下的集中表现。

大体同意后者。

3、革命的性质

社会主义革命论者：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

马列毛主义无产阶级革命论者：

总体上，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第二次社会主义大革命。其中，第一阶段的革命斗争主要是人民民主革命的性质，但一定程度上也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

我认为是重建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再革命。

4、革命的对象

社会主义革命论者：资产阶级。

马列毛主义无产阶级革命论者：

中国无产阶级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革命第一阶段，也就是当前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当时占全国人口百分之零点四左右的官僚资产阶级，这是我们当前最主要的敌人。

我认为在政治和经济政策上，还应更有更广泛的统一战线策略。

5、革命的前途

社会主义革命论者：无产阶级专政。

马列毛主义无产阶级革命论者：

重建共产党，重建无产阶级专政，重建社会主义制度。

重建新型的人民民主专政。

6、革命的动力阶级

社会主义革命论者：无产阶级和包括小资产阶级（劳动阶级，不是小资本家阶级）在内的其他劳动阶级。

马列毛主义无产阶级革命论者：

上面说法与“社会主义革命论者”前述：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自相矛盾的。小资产阶级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动力。但是，在第一阶段反对官僚资产阶级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它和其他劳动阶级一样是革命的动力。

正确的说法是：为了推翻专制制度，重建人民民主，必须建立一个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最广泛的革命民主统一战线。一切主张打倒官僚资产阶级专制统治的阶级、阶层和政治派别都是我们团结、联合或利用的力量，哪怕这种联合或利用只是暂时的，有条件的。

我认为社会主义再革命的主要阶级力量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站在工农一边的革命知识分子。至于统一战线力量组合，以现实的实际状况为出发点，例如，在进行争取民主的斗争时，可以联合自由民主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总之，中国无产阶级进行的第二次社会主义大革命第一阶段的任务，是一个打倒官僚资产阶级，推翻专制制度的人民民主革命的任务。目的是废除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争取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力和政治自由，重建人民民主专政。关于反对专制问题，“九天揽月”同志已在他的《谈“打倒专制”》一文中作了详尽的论述。这里不再重复。

最后，让我们一起学习列宁的教导：“为什么推翻专制制度应该是俄国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呢？这是因为在专制制度下，工人阶级不能广泛地展开自己的斗争，无论在经济方面或政治方面都不能夺取任何巩固的阵地，不能建立巩固的群众性的组织，不能在全体劳动群众面前举起社会革命的旗帜，也不能教会他们为社会革命而斗争。只有争得了政治自由，整个工人阶级才能坚决地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这个斗争的最终目的就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组织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争得了政治自由，只有广泛地展开群众性的斗争，俄国工人阶级才能建立争取社会主义最终胜利所必需的组织。”

今天，重温列宁的教导，我们感到那样的真切，不是非常符合我国当前的斗争实际吗？

不。历史条件和当年的俄国完全不同了。

一切愿意在中国进行第二次社会主义大革命的同志，是统一我们认识的时候了！统一了革命理论，统一了思想认识，下一步干什么大家是心照不宣的。坚定地迈开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推翻专制制度，争取政治自由！

反对修正主义上台带来的资本主义复辟的苦难，反对修正主义上台带来的法西斯资产阶级残酷专政，掀起社会主义再革命运动，重建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让人民重新过上社会主义的美好生活！

2013 年 8 月 1 日

2019 年 2 月 24 日评论

对“二次革命论”批评汇编

按语：

多年来，我曾以同志的友善态度对“二次革命论”进行过批评。但是，直到今天，这一分歧还是没有解决。持二次革命论的同志总以为真理还是在他们手里，我则属于“思想顽固”，“理论不足”，“存在短板”……等等。

今天，我们要再作一次讨论。我希望通过这次讨论，我们能够统一到正确的思想路线上来，至少希望大多数同志能够作到这一点。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我们很难走出这个阴影，虽然我们自己并不一定意识到这一点。人总是这样，就是这样，不然不是现实的人。任何人纠正一个错误认识是很困难的。尽管老祖宗留下了许多这方面的训诫，但接受的人还是很少，诚如毛主席 1958 年走到济南时所言，人这个动物就是爱骄傲。是的，主席说得对。可是，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好好地老老实实地听毛主席的教导呢？

我希望我们通过这讨论能够有所进步。

下面，我把我过去一部份文章中對“二次革命論”的一些批評，彙編起來，這比一時的談話可能考慮得更周到些，供同志們參考和批評。

《中国毛派共产主义者联合起来！

——中国毛派共产主义者洛阳会议纪要》节选

2015.2.6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洛阳会议的第一任务就是学习马列毛主义理论。通过学习，大家认为，《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理没有过时，《宣言》依然是我们毛派共产主义者的最基本的纲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也没有过时。列宁对时代的分析，对帝国主义本性和特征的分析，依然是我们认识当今世界的理论指导。毛主席的社会主义革命论，更是我们当前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统治、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直接的理论指导。

现在看来，毛主席的社会主义革命论，既包括社会主义革命（夺取政权）、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也包括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广义的）的理论；又包括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必须进行社会主义再革命的理论。这三部分理论是有机统一、不可绝然分割的。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对应，可以简称之为社会主义革命论。这是毛主席一生的两个伟大贡献，具有全世界范围里的普遍意义。

我们要充分尊重马列毛，凡是马列毛已经讲清楚的问题，不要搞画蛇添足。

正是运用马列毛主义理论、特别是毛主席的社会主义革命论，我们可以清楚看到：

中国已经是一个以修正主义为政治特征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复辟的程度已经远远超过当年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

在这个社会基本定性问题上，毛派共产主义者不能有丝毫的动摇和妥协。

这个社会的主导经济是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私营资本主义以及外国垄断资本主义构成其广泛的基础。贪污受贿是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占有剩余价值的特定形式。权钱交易，官商勾结，充当买办，既是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和私营资本主义、外国垄断资本主义合流的形式，又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私营资产阶级、外国垄断资产阶级分割剩余价值的特定形式。

私营资产阶级和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可比性。因为历史背景、历史条件完全不同。私营资产阶级已经失去了当年民族资产阶级所具有的革命性的一面，而必然地不可摆脱地带上依附性。对内依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依附于权力；对外依附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依附于超额利润的分割。这种依附性，决定了私营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阶级立场和政治态度。

在这样的经济关系中，工人阶级重新沦为雇佣劳动者。农民阶级正在分化，要么走进雇佣工人阶级行列，如农民工；要么在小生产中挣扎；上升为农业资产阶级的是极少数。

这个社会的政治统治，是以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为主导的整个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工农劳动者阶级成为了这个统治阶级的专政对象。

在这样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的基础上，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也占据了统治地位。一切前资本主义的腐朽的垃圾都被复活起来。

这就是当前中国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思想关系状况。

在这样的基础上，必然地重新产生阶级分化、阶级矛盾、阶级对抗。

在众多的阶级矛盾中，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工农劳动者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尽管，工人阶级经常地大量地进行的是反对私营资本主义和外国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斗争、维权斗争，但是，在这样的斗争中，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总是毫不犹豫地站在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一边，并运用手中的暴力国家机器，对工农劳动者阶级实行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

这就是我们面对的毛主席多次强调的修正主义上台后必然带来的“最坏的资本主义”。这是我们认识中国问题的实际的出发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质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特色”二字不过是修正主义骗人的把戏。看不到修正主义这个政治特征，就看不到中国资本主义的特点，就不能从这个实际出发去规定我们的斗争策略。就会犯教条主义的简单化的错误。看不到“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资本主义，就会抹杀社会主义已经被资本主义替代，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变成资产阶级专政，共产党已经变成资产阶级党的事实。就会犯右倾机会主义、实际也是修正主义的错误。

“救党保国”就是这样的典型的错误口号。

只有认清我们面对的是“最坏的资本主义”，认清资本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本性也是不会改变的，才能进而认清我们面对的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我们要进行的是革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命的社会主义革命。

这是我们面对的社会革命任务的性质的判断，是我们的斗争的大方向。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不能在理论上发生任何偏差，不能用主观愿望代替阶级分析。

反对以修正主义为政治特征的资本主义的斗争不仅是阶级斗争，而且是特别残酷的阶级斗争。我们只能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去进行这场斗争。其它任何的方式方法都是行不通的幻想。最终必然导致失败。

正是基于这一点，会议认为，我们必须警惕打着各种类似“救党保国”旗号的极少数投机分子的破坏活动。多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极少数投机分子和文革中的保皇派的骨干人物一样，他们实际是修正主义统治者的附庸和家奴。那时是，白天“造反”，晚上汇报，“丢车保帅”，目的在转移斗争大方向。现在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只反汉奸，不反路线；用民族矛盾掩盖阶级矛盾，目的也是转移斗争大方向。当年的保守派，不去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却专门炮打造反派。现在的“保救派”同样，不去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却专门炮打造反的毛派、无产阶级革命派。那一顶顶大帽子，就是他们急于表演“宋江打方腊”丑剧的铁证。这极少数人和历史上的革命队伍中的修正主义者一样，不仅会破坏革命队伍的团结，而且会导致革命斗争的失败。我们提请一切愿意反对修正主义统治的革命同志，要认清这极少数人的阶级本质，认清其欺骗伎俩，及时和这些人划清界线。

社会主义革命是革命，我们必须坚持革命路线。这是马列毛革命导师的一贯的思想。不管革命的手段有怎样的变化，革命的本质不能放弃。这一道理已经反复为共运史所证明。反对修正主义上台带来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也只能是这样。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是解决修正主义上台导致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唯一手段。舍此没有其它的任何的手段可以完成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

这是一场伟大的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再革命。现在看来，这场革命的最可能的形式是在大中城市掀起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人民群众革命运动。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马列毛革命导师是一再这样讲的，《国际歌》是这样唱的，巴黎公社、十月革命、中国革命是这样干的。不管具体斗争形式怎样不同，只要人民群众发动起来，掀起革命风暴，斗争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现在看来，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反对修正主义统治、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主义再革命斗争。

文革初的1966年，毛主席在给江青的信中曾预言，如果将来发生右派的反革命政变，左派有可能举起他的旗帜，遵循他的教导，团结起来，打倒右派。

随后，在文革中，毛主席针对上海即将发生“一月风暴”，曾敏锐地指出，上海的学生起来了，工人起来了，机关干部也起来了，上海大有希望了。在毛主席看来，只要人民起来了，修正主义就要完蛋了。

这个道理，被随后发生的全国各地的夺权斗争所证明。“死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的呐喊响遍全国。人民起来了，就能从走资派手中夺取政权，就能自己解放自己，就能把人民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虽说那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局部的部分的夺权斗争。

苏东剧变的历史经验也从另一个侧面验证了这个道理。正是人民群众起来了，才最终结束了修正主义的腐朽统治。只是因为没有真正共产党人的领导，斗争的结果是再建资本主义。

中国1989年的动荡，也可以算作一次验证。当着人民群众起来时，修正主义统治者惊慌失措，内部发生分裂。这是一次历史机遇。可惜，当时，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反攻倒算中基本上都被投入狱中，无法担当运动的领导，而发动这场斗争的资产阶级自由派，表现的是软弱和愚蠢。这给了执政者以时间和机会，最终凭借暴力继续维持自己的统治。但是，留下的历史经验值得深思。

这些切近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最有力的最能实现社会主义再革命的手段是人民群众革命运动。这是任何其它的改良手段所不可比的。正如晚年恩格斯在著名的《导言》中所说，革命，无疑是历史进步、历史变动的“最权威的手段”。而且，恩格斯还特意叮嘱，主动进攻，胜过 1848 年曾运用过的防守性巷战。

中国毛派共产主义者要走这条革命路线，只能走这条革命路线。我们要发动一场人民群众革命运动，结束以修正主义为政治特征的资产阶级统治，实现社会主义再革命，重建马列毛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

走这条革命路线，就要突破修正主义的法西斯专制统治。修正主义依然声称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虽然是经过他们修改的）。这给了我们合法斗争的可能。我们就是要求落实宪法第 35 条赋予人民的各项民主权利。我们是以社会主义民主诉求去对抗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制。也许得到的只能是有限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但总比法西斯专制对工农劳动者阶级有利，有利于组织起来，有利于宣传发动群众。

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我们对民主的最高的诉求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而这只有在掀起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再革命运动，并取得政权后，才能最终实现。这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再革命和争取民主的斗争的必然的相互统一的历史步骤，也是我们争取民主的根本意义、根本目的所在。只要政权在手，人民当家作主，这不仅是社会主义再革命的胜利，同时又是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新起点。

争取民主是当前斗争的切入点。这是一个艰巨的斗争任务。我们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只要是反对法西斯专制的力量，我们都可以联合，只是不要忘记我们的阶级独立性，不要忘记我们路线、目的和方向。

走这条革命路线，我们就要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宣传群众、发动群众上。理论是革命的灵魂，群众是革命的物质力量。只有实现这二者的结合，用马列毛主义武装群众，才能掀起社会主义再革命运动。我们一切工作的落脚点就在这里。为此，我们毛派共产主义者，必须深入工农群众，做群众的学生，实现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参予工农群众的一切革命实践活动，在革命实践活动中逐步实现马列毛主义理论转化为工农群众的思想武器。

走这条革命路线，我们还要认真看书，弄通马列毛主义。同志们一致认为，进行这场反对以修正主义为政治特征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斗争，我们在理论上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对未来究竟建设一个怎样的可以相对抗拒产生修正主义，抗拒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我们更是盲点很多，这都需要我们在马列毛主义指导下，再学习，再认识，难度相当大。共产党人却不懂马列，这好像是一个讽刺，但又是一个事实，这甚至是导致发生修正主义、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原因。同志们一定要对这个问题保持清醒的认识，要认真严肃地对待。如果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那么，要想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必须掌握马列毛主义。马列毛主义的红旗举得越高，社会主义再革命的胜利就越有把握。

努力学习，发动群众，争取民主，是我们毛派共产主义者现在要把握的三项任务。

总纲是社会主义革命。

总路线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经过共产党），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进步力量，反对以修正主义为政治特征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

反动统治，为在中国重建马列毛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而奋斗。

《关于“一次革命”和“二次革命”的争论》的跟贴

2015. 3.15

在红旗网上，有围绕民主问题发生的“一次革命”还是“二次革命”的争论，而且，影响了团结，影响了对争取民主这一斗争策略的统一认识和共同斗争。

在我看来，因此影响团结不好，影响斗争更不应该。这些同志在重大原则问题上还是有同可求的，完全可以求同存异。

在团结的大前提下，理论原则、策略原则最好还是经过讨论搞清楚。一时搞不清楚，难免，允许商量，允许善意批评。例如，我这里的不少议论就可能有错误，同志们一旦发现，请指出，只要你说得对，我随时准备修正错误。

我没有仔细研究过双方的不同意见，仅能说点个人的原则意见。

第一、我们要进行的无疑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现在的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以及由这种基本矛盾决定的历史阶段的属性决定的。

正像我们在前面论述的，争取民主的策略，是当前进行这场伟大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策略和重大步骤

不能一提争取民主，就以为是争取资产阶级民主，更不能认为，把争取民主作为当前的重大策略，就是要先进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就是“二次革命论”，不能作这样的简单化推论。

我们争取、捍卫的民主权利，是毛主席亲自领导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利，这部宪法是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社会主义宪法，因此，十分清楚，我们以宪法为旗帜争取的民主，是无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只要争取到宪法规定的权利，肯定会对展开社会主义革命有利，而且可以说，这是打破专制，展开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有力的战略步骤。

第二、修正主义的官僚特权垄断资产阶级实行专制统治，是其反动性、落后性、腐朽性的表现，但是，这和封建地主阶级的专制主义，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不同的，简言之，这不是同一个历史时代的历史问题。因此，不能把我们今天争取社会主义民主的斗争，说成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斗争，就是说成是新民主主义的争取民主的斗争也是不正确的。

我们是在特定的具有修正主义特征同时也具有法西斯特征的官僚特权垄断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争取民主，特征是形式，阶级是本质，从本质上看，我们是在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样的斗争，只能是为了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也正因为具有这样的本质，形式毕竟是这一本质的外在表现，因此，反对专制，争取民主，就必然具有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

马列毛主义的国家理论学说是马列毛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尤其对于现实的社会主义革命，对于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有极强的现实意义。我们应该认真地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列毛关于这一理论的原著，特别是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是这一理论的系统的论著，更值得我们逐字逐句认真学习，弄懂弄通。读马列毛，是我们毛派现在面临的一个十分现实又十分艰巨的学习任务。说现实，是

因为我们对这些理论还不真懂；说艰巨，是因为读这些书，不是一次、一遍就能弄懂的。这是所有读过马列毛的同志的共同感受

〈开创社会主义再革命的新阶段 ——“中国毛派联合”韶山会议纪要〉节选

2015. 12. 27

2、会议认为，斗争实践证明，《洛阳会议纪要》对于目前中国社会基本矛盾、阶级矛盾、主要矛盾以及由此而来的革命性质、革命动力、革命形式的诸多分析，都是基本正确的，是我们需要继续坚持和贯彻的理论、路线、方针。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阶段的基本结束，同时，也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历史阶段的基本开始。

这是一个马列毛主义的科学论断。

只要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建立起来，不管因为怎样不同的历史条件而采取不同的政体形式，例如在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形式，这都意味着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社会主义社会，开始建立起来。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从不完全向完全的不断革命的逐步过渡的漫长历史过程。马克思最初从理论上提出了这一思想，列宁联系俄国的具体的革命实践，继承、发展了马克思的思想，毛主席又联系中国的具体的革命实践，继承、发展了马克思、列宁的思想，正是在这样代代相续的实践摸索、理论探讨的基础上，才诞生了伟大的马列毛主义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

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的基本点在于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社会主义的发展存在着两种可能的倾向、两种可能的前途，也就是说，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

历史验证了这一理论。苏东和中国都并非偶然地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所谓并非偶然，就是说其中寓于着规律性。对于这种规律性，依然有待我们继续认识。

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自1949年10月1日始，但是，在1976年10月6日被打断。历史的分期是要找出相对标志的。中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分界的相对标志就是1976年10月6日的反革命政变。

近四十年的铁的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发生了彻底的资本主义复辟。中国已经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且是法西斯专制的最坏的官僚垄断买办资本主义社会，对内压迫剥削中国劳动人民，对外依附超级帝国主义大国，并把资本的黑手伸向落后的发展中国家。

这个事实验证了马列毛主义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理论，验证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确存在着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1976年10月6日后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不过是1976年10月6日前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区别在于，1976年10月6日后，是资产阶级专政下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1976年10月6日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看到这一斗争的连续性，有利于帮助我们深刻认识当前阶级斗争的性质和规律。

这个事实也告诉我们，我们面对的是资本主义复辟，而不是别的社会性质的复辟，例如不是历史上发生过的封建主义的复辟。因此，我们要进行的再革命，只能是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主义再革命，而不是进行反对封建主义复辟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

毛主席预言过，修正主义上台，复辟资本主义，一是会搞法西斯专制，二是会搞最坏的资本主义。中国当代的历史正是这样展开的。值得我们认真领会的是，毛主席对这一历史现象的质的规定性的概括，还是认为这是属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毛主席拿希特勒和戴高乐做比较，也是以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不同政体形式做比较，一个是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一个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就是说，即便这里的专制带有封建性，是一种封建遗存，它现在也已经从属于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把最反动的东西复活起来，构成资产阶级法西斯专制。

正是基于这样的明确无误的理论认识，我们只能把我们当前面临的革命任务，理解为社会主义再革命。

同时，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也清醒地看到，进行这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再革命，必然地无法回避地面临着反对、突破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的历史任务。

不过，这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而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再革命的历史任务。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从十月革命到中国革命，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单一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这些国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这正是这个时代的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所必然具有的人民大革命的特点。我们要尊重、服从、掌握、驾驭这一历史规律。不能教条主义地认为人民大革命注定就是民主主义革命，尤其不能认为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即便面对必须反对专制，争取民主的革命斗争，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实现社会主义为历史任务的革命的性质，依然只能是这样。至于这一历史规律，会如何历史地展开，我们只能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而不要先验地画地为牢。

3、现在，正是围绕我们究竟面对着怎样的历史任务这个最根本、最要害的问题，我们和一些同志发生分歧。他们以要“打倒”、要“推墙”等大帽子，给“中国毛派联合”，给洛阳会议罗织罪名。

这是完全错误的。

透过那些漂亮包装的言词，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分歧的实质还是在：到底应该怎样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再革命，特别是到底应该怎样认识和对待现在的执政党、包括这个党的最高领导者。

攻击我们的人，否定在中国已经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事实。所谓“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十字路口”的说法，所谓中国现在是“半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的说法，都是妄图以惯用的折中主义的手法，掩盖在中国已经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已经发生根本的阶级关系变动、无产阶级专政已经蜕

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事实。这是历来的修正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的特点，这正是修正主义。

这是我们绝不能接受的，是我们理所当然要给予反对的。

在我们看来，中国已经确定无疑地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专政已经确定无疑地蜕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正是看到这一社会性质的根本变动，我们才把中国毛派共产主义者的历史任务规定为社会主义再革命。

如果要问，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这就不能不涉及要分析、认识领导完成这一资本主义复辟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

谁都看到一个简单的事实，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的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毛主席马列毛主义路线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那时是名副其实的真共产党，现在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假共产党。

这是一个不容抹煞的根本区别，抹煞了这个根本区别，只就“中国共产党”这个名称谈问题，这是修正主义的抹煞事物本质的欺骗手法。

判断一个党的性质，主要要看这个党实际执行的是什么路线。不是看这个党在口头上讲什么，而是看这个党在实际上做什么。39年的历史证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实际执行的是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而且，39年来一以贯之，不动摇，不改变，直至今日。

这条路线，在39年前曾经遭到过毛主席的痛斥，指出这是“不管白猫黑猫”的“猫论”路线，也就是不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对立，放弃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放弃“阶级斗争为纲”的修正主义路线。

实践证明，这是一条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路线。放弃“阶级斗争为纲”并不等于这条路线真的不讲阶级斗争。不是的。邓小平修正主义者放弃的只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实际加强的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一句话，是复辟资本主义。

这个事实验证了毛主席讲的道理，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上台，就要搞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就要搞资本主义，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正是基于此，毛主席把这样的修正主义路线统治的党，称为修正主义党，资产阶级党，法西斯党。

不是我们乱发明，不是我们搞极左，而是老老实实在地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我们不得不沉重地承认，曾经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现在已经堕落为修正主义党、法西斯党、资产阶级党。这个党的领导人已经堕落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甚至是法西斯代表人物。这些领导人扮演的历史角色，绝不是代表个人，而是代表阶级，代表资产阶级，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正是这样的党、这样的党的领导人，领导了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这部令真正的共产党人无比痛苦的历史正在继续。这个党，这个党的领导人，至今没有丝毫的改变。如果谈论是谁要打倒并且已经打倒了中国共产党，只要尊重事实，就应该承认正是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邓小平修正主义集团打倒了真正的革命的中国共产党。

在这种情况下，要我们去“挺”这个党，去“挺”这个党的领导人，难道不就是要我们去“挺”资产阶级，去“挺”资本主义复辟，去“挺”法西斯专政，去“挺”资产阶级剥削压迫工农群众吗？这是我们绝不能答应的，更是我们绝对不会去做的。我们不愿扮演这样的历史丑角。谁愿意扮演这样的丑角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但是，请不要玷污“毛派”这个光荣的称号。

口头上讲阶级斗争观点，一遇实际问题，就忘记、放弃了阶级斗争观点，这正是修正主义者失足的思想、世界观上的原因。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个历

史教训。我们必须坚持用阶级观点分析、认识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上台，不是个人的问题，不是个人的罪孽，包括不是邓小平以来个别领导人的罪孽。这是一个阶级的现象，是阶级斗争，是阶级斗争的结果、以及由此带来的必然的阶级关系的变动。修正主义统治者的阶级本性是不会改变的。我们不能对修正主义统治者抱不切合实际的幻想。阶级斗争只能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去处理。结束修正主义的统治只能靠革命，只有革命一条路。

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在党变修、国变色的情况下，我们依然不会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党员、广大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是不赞成搞修正主义的。但是，不能否定的事实是，八千万共产党员至今并没有改变修正主义路线在全党占统治地位的这个历史和现实，没有改变党的性质已经发生蜕变这个历史和现实。在苏东和中国发生剧变时，可悲在于“竟无一人是男儿”。这个事实是严酷的，是我们不能不正视的。面对这样的事实，说任何空话都无济于事，唯一正确的策略只能是鼓动广大党员、广大干部觉悟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

如何正确认识和正确对待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如何正确认识和正确对待篡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修正主义集团，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看问题，现在在毛派内部发生的分歧，实质是毛派内部的两条思想路线的斗争，是修正主义思想在毛派内部的反映，只有清除了修正主义思想路线的恶劣影响，真正的毛派的大联合、大团结才是可能的，才是有意义的。

我们不回避这种思想路线的斗争，也不畏惧这种思想路线的斗争，我们深知，只有清除了修正主义思想路线的干扰，才能更好地开展反对修正主义统治的斗争。马列毛主义革命导师对此有明确的教导，也有充分的国际共运的历史经验做根据，我们的切身经验也在反复验证这一点。我们对于极个别的投机的机会主义头面人物不抱幻想，正如毛主席所说，机会主义头子改也难。我们把开展这一思想斗争的落脚点、重点，放在帮助广大毛派同志接受马列毛主义的社会主义再革命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从而在接受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基础上觉悟起来、团结起来，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毛主席在九大上曾经高呼：“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是一个马列毛主义的革命原则。我们要牢牢把握这个原则，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坚决反对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反对搞“唯我独革”，“唯我独左”，一定要诚恳地虚心地坚决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同志，落实毛主席的教导，“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4、中国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又是一个修正主义打造的特殊的怪胎的资本主义社会。以修正主义为政治特征的这一特殊的具有极大的欺骗性的资本主义社会，为社会主义再革命带来了特殊的复杂性、艰巨性。我们要充分认识这一点。

修正主义统治者，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干着复辟资本主义的勾当。这是修正主义统治的基本特点。这一特点决定了修正主义统治者的倒行逆施，对于广大劳动人民还具有相当大的欺骗性。这是近四十年来中国历史走了弯路，人民群众迟迟没有起来斗争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展开对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罪行的事实揭露和理论批判，始终是社会主义再革命的必不可少的思想准备、思想发动。没有革命理论的普及，没

有人民群众的普遍觉悟，就没有社会主义再革命。不要忘记，任何一次革命，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这是普遍真理。

多年来，我们已经做了这方面的大量工作。但是，还不够。还要继续努力做下去。

一方面，要结合实际，从理论上说明，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就会搞资本主义复辟，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最坏的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又要结合实际，从理论上说明，必须敢于反对修正主义，必须敢于对修正主义实行造反有理，不然劳动人民就要像在已经过去的四十年中那样，在阶级的压迫和阶级的剥削中苦苦挣扎，永远也不可能得到解放。

另一方面，还要结合活生生的现实中正在发生的劳动人民的苦难，去揭露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残酷的阶级本性，就像过去搞过的忆苦会、诉苦会那样，启发人民群众的阶级感情，帮助人民群众觉悟起来，主动地积极地投身到社会主义再革命运动中来。

阶级的觉悟是靠阶级的理论培育的。一旦马列毛主义的革命理论武装了群众，社会主义再革命就有了胜利的把握。同志们要反复体会革命导师的老话：理论的批判，不能代替物质的批判，但是，理论一经为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

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这种理论的批判，始终要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纲。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修正主义路线是一条资产阶级的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混入革命毛派内部的修正主义思想路线，从内部起破坏作用，如长期存在的保救派思潮；还有一种是来自执政的修正主义执政者的修正主义路线，在这条路线统领下，大搞资本主义复辟，如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

我们必须准备对内外这两种修正主义路线都要进行批判，并处理好其中的斗争策略。

阶级斗争是纲。路线斗争是纲。路线斗争是阶级斗争的集中表现。阶级斗争是路线斗争的本质和基础。我们的理论批判，要始终紧紧抓住路线斗争这个纲。坚持用毛主席的马列毛主义的阶级斗争的路线，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的取消阶级斗争的“猫论”路线。把道理讲清楚，讲彻底，讲好。

只有抓住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这个纲，理论批判才能深入，才能彻底，才能真正从理论上批倒修正主义，才能使人民群众觉悟起来，发动起来，完成进行社会主义再革命、重建科学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历史使命。

明年，适逢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 50 周年。我们完全可以抓住这个契机，掀起一个学习马列毛主义理论、特别是反对修正主义理论的高潮。

我们要借这个机会，大力宣传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理论，反对修正主义的理论，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并结合我们亲身经历的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和这四十年资本主义复辟的残酷事实，认识这些理论的深刻性、正确性、重要性，弄懂、弄通这些理论，用这些理论武装广大人民群众的头脑，从而为发动社会主义再革命做好思想准备、理论准备。

5、会议再次强调，洛阳会议提出要突破专制，争取民主，是符合马列毛革命导师教导的，也是符合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再革命的现实实际的。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问题，这是中国历史前进的不可缺少的历史步骤。

关于这个问题，目前在理论上有很大的争论。因此，需要对这个问题做出我们的回答。

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无产阶级专政、亦或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人民民主专政。通俗地说就是人民当家作主。

道理显而易见。政治统帅经济。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只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存在，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存在。一旦失去无产阶级专政，即便存在公有制形式，实质也会发生蜕变。这已经为从苏东到中国，产生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所证明。

正如列宁所说，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是同义词。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无产阶级民主，同样，没有无产阶级民主，也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问题，只要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必要性，就必须承认无产阶级民主的必然性、必要性。这就把无产阶级民主的重要意义突出出来了。

民主政治是国家形式的最终归宿，是国家制度的最高形式。列宁指出：

“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因此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力。”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7页。）无论从本质还是从形式上看，社会主义民主都是比资本主义民主更进步、更高级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从制度上、实践上保障人民群众享有比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更广泛、更直接、更真实的民主权利，特别是管理国家的权利。正如列宁所说，苏维埃民主“就是全体居民群众真正平等地、真正普遍地参与一切国家事务”。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所在。毛主席不仅在延安与黄炎培谈话中强调，必须在人民中实行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让人人起来负责，就不会人亡政息。而且，在建国后更多次提出这个问题，强调人民群众的最根本的权利是管理国家的权利，并在最后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鼓励、支持人民群众大胆地对如何实现人民群众直接管理国家进行创造、付诸实践。

社会主义变修、社会主义失败的惨痛历史，再次把无产阶级民主的问题，迫切地提上了议事日程。历史教训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保证，一旦失去无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的失败就是必然的。

当然，不能不看到，实现民主是一个历史过程。对于一个经历了长期的封建专制主义社会的古老文明大国来说，尤其是这样。专制主义的历史传统腐蚀了整个中国社会肌体，束缚着中国社会的一切事物，包括束缚着中国人的灵魂。在这种情况下，突破专制，走向民主，是艰难的，是需要不断斗争、不断革命的。

更大的困难在于，我们面对的是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再革命的历史任务。就社会主义再革命而言，没有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阶级运动。只有突破专制，在民主的形式下，哪怕是在资产阶级民主的形式下，才能使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能以统一的阶级意志去统一行动，才能以整个阶级去参与政治斗争，才有严格意义上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这就把突破专制、争取民主的历史任务更迫切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革命导师列宁指出，经济斗争还不是阶级斗争，或者说，“只是阶级斗争的萌

芽”，只有争取民主的斗争，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才是严格意义上的阶级斗争。

不能低估争取民主的政治斗争意义。恩格斯晚年强调：《共产党宣言》早已宣布：“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列宁在为俄国社会民主党草拟的党纲中写道：“俄国工人阶级争取自己解放的斗争是政治斗争，其首要任务是争得政治自由。”（列宁：《社会民主党纲领及其说明》，《列宁全集》第2卷，第70页。）根据这一观点，列宁为社会民主党拟定了9项争取政治自由、争取民主权利的“首先要求”。这包括选举权以及集会、结社、罢工、出版、信仰自由等民主权利。列宁强调，“工人阶级的斗争是政治斗争，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工人阶级不争得对国家事务、国家管理、发布法令的影响，就不可能进行争取自己解放的斗争。”（同上，第89页。）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一文中也说：“如果不争得政治自由并使俄国政治社会制度民主化，就不可能为工人事业进行胜利的斗争。”（《列宁全集》第2卷，第285页。）甚至说：“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争取政治自由与民主制度的先进战士”，“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彻底实现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民主化，因为实行这种民主化，就会使工人成为这个制度的主人。”因此，列宁强调“把工人阶级作为争取民主制度的先进战士突出出来，就会加强民主运动，加强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同上，第289页。）

这些思想和《共产党宣言》中的思想是一致的。列宁是从俄国的实际状况论述争取政治自由、争取民主的意义的。列宁是写作党的纲领，肯定是极为严谨的。这体现了争取民主是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和步骤，体现了“社会主义斗争和民主主义斗争结合”。

这至少是当时的俄国国情决定的。列宁说：“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从来也没有忘记俄国的政治条件，从来也没有梦想在俄国有可能公开建立工人党，从来也没有把争取社会主义的任务和争取政治自由的任务分开。”列宁的教导，对我们认识我们面对法西斯专制到底应该不应该争取争得民主，有极现实的指导意义。

不能过高估计经济斗争的意义，更不能贬低争取民主这一政治斗争的意义。列宁在《我们的纲领》这篇重要文章中阐发了关于这一问题的重要思想。

“这个纲领的实质就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领导这一斗争，争取达到最终目的——由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组织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分经济斗争（反对个别资本家或个别资本家集团，争取改善工人处境）和政治斗争（反对政府，争取扩大民权，即争取民主和争取扩大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力）。有些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主办‘工人思想报’的那些人大概也可以包括在内）认为经济斗争重要得多，而政治斗争则似乎可以推延到比较遥远的将来。这种见解是完全不正确的。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一致认为必须组织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到工人中间进行鼓动，即帮助工人去同厂主进行日常斗争，叫他们注意压迫的种种形式和事实，以此向他们说明联合起来的必要性。但是，因为经济斗争而忘记了政治斗争，那就是背弃了全世界社会民主运动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忘记了全部工人运动史所教导我们的一切。……如果工人不能像德国工人和欧洲其它一切国家（土耳其和俄国除外）工人那样享有自由集会、结社、办报纸、派代表参加人民会议这些权利，那末任何经济斗争都不能使他们的生活状况得到稳固可靠的改善，甚至不可能大规模地进行任何经济斗争。而要想获得这些权利，就必须进行政治斗争。……一切经济斗

争都必然要变成政治斗争，所以社会民主党应该把这两种斗争紧紧地结合成一种无产阶级统一的阶级斗争。这一斗争的首要目的应该是争取政治权利，争取政治自由。……俄国工人阶级即使得不到其它阶级的帮助，也能单独进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但是在政治斗争中工人并不是孤立的。人民的毫无权利和强盗官吏的横行霸道，也激怒了一切不容忍限制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比较正直的受过教育的人，也激怒了受迫害的波兰人、芬兰人、犹太人和俄国的教派信徒，也激怒了受官吏和警察欺压而又无处求援的小商人、小工厂主和小农。所有这些居民集团单独是无力进行坚决的政治斗争的，但是只要工人阶级举起这种斗争的旗帜，他们就会从各方面向工人阶级伸出援助的手。俄国社会民主党一旦成为一切争民权、争民主的战士的领袖，它就会是不可战胜的！”（《列宁选集》第一卷，第204_205页。）

列宁把各个方面的道理都讲得非常透彻。

自然，列宁讲的是俄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理，而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社会主义再革命。不能生搬硬套列宁所讲的道理。我们目前面对的革命任务和当年列宁面对的革命任务是不同的，看不到这个本质的不同是不对的。

但是，同样不对的是，如果看不到两者的一个共同点，即都面对着专制统治，也是不对的，虽然列宁面对的是沙皇封建专制制度，我们面对的是修正主义的法西斯专制制度。

专制制度是一种落后的反动的政治制度，我们这里不去详尽分析中国现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动的落后的政治制度。谁都知道在中国存在这种专制制度不是偶然的，与我们的现实的国情有关，也与我们的历史有关，我们这里只是强调，不管原因是什么，结果是中国存在专制制度，这种制度是一种落后的反动的政治制度，是修正主义统治的政治特点和政治要害。正是基于这种落后性、反动性、严重性，毛主席才说，希特勒比戴高乐坏，也就是法西斯专制比民主共和制坏，虽然都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政治统治。正是从历史比较的观点看问题，在反对修正主义的社会主义再革命的斗争中，反对专制统治，争取政治自由，争取民主的历史任务也就提到了重要位置。我们要充分认识争取无产阶级民主对于今天实现社会主义再革命的重要意义。

但是，这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而是社会主义再革命的历史任务。不要忘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概念的确切含意是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显然不能这样理解我们现正进行的反对专制，争取民主的社会主义再革命的历史任务。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观点。二者是统一的、一致的。先做民主主义革命，再做社会主义革命是这样；从反对法西斯专制制度突破，发动、进行社会主义再革命也是这样。尊重历史发展的顺序，从低到高，从易到难，是最利于调动最广大阶级、最广大群众，结成最广泛统一战线的最合理的历史步骤。这些道理，革命导师是反复讲清楚了。

有的同志强调我们的争取民主，不过是争取资产阶级民主，而在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想争得民主，不过是一种幻想。指责我们的错误就在于是制造幻想，甚至是在帮助统治者麻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

这是一种离开事实的思维的简单化。要是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方式都一样，那么，哪里还会有“希特勒”和“戴高乐”的区别？这是闭眼不看现实。按照这种观点，一切争取政治自由、争取民主权利的政治斗争都是没有意义

的，其结果就是在实践上不去进行这样的政治斗争。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正在这里。

革命导师从来是重视政治统治方式的多样性的。马克思恩格斯对欧美不同国家的不同政治统治特点是非常注意的，并因此指出了这些国家的工人党面临的政治任务有不同。例如对德国，就强调其专制制度的落后性、反动性，强调要先突破这个反动的“外壳”，而谈论英、法、美、瑞士等国的政治制度，就承认这些国家的民主共和制比较发展。这是尊重事实的科学态度。正是基于这个事实，列宁也说，“欧洲其它国家的人民早就争得了政治自由。只有在土耳其和俄国，人民还是苏丹政府和沙皇专制政府的政治奴隶。”“沙皇专制就是官吏专制。沙皇专制就是人民对官吏尤其是对警察的农奴式的依从。沙皇专制就是警察专制。”（列宁《给农村贫民》，《列宁选集》第一卷，第393、395页）

列宁在和经济派、取消派等机会主义派别的论战中，都一再解释要实现无产阶级的联合，要使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去展开阶级斗争，没有政治自由、政治民主是不可能的，包括对同志们一再引用的恩格斯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那句话的解释，列宁也是强调民主共和制为无产阶级从事阶级斗争提供了可能和舞台。而且，列宁还特别强调了无产阶级争取民主所具有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尤其像罢工斗争就完全是无产阶级特有的斗争形式。这不仅没有局限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束缚，而且是对资产阶级专政的反抗斗争。这些道理，值得我们深思，不能用教条主义思维剪裁丰富、复杂、生动的现实生活。

现在，我们的同志都一再感叹我们缺乏有组织的联合起来的斗争，都在呼吁大联合、大团结。这是从事实出发的正确看法。但是，同志们不要忘记，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民主。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弱点，正是专制制度造成的。这正如列宁所说：“要联合起来，就要有建立这种联盟的权利，就要有结社自由，就要有政治自由。政治自由不能立刻使劳动人民摆脱贫困，可是它能给工人一个同贫困作斗争的武器。要同贫困作斗争，除了工人自己联合起来之外，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办法。没有政治自由，几百万人民就没有联合起来的可能。”（同上，396页）所以，只是呼吁团结、联合，不敢首先推倒阻碍团结、联合的专制制度，是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坚决地为政治自由、结社自由而向专制制度作斗争，只有组织起自己阶级的政党，指挥统一的阶级动作，只有办起自己的机关报、网站，把马列毛主义的理论和策略传达给每一位阶级弟兄，达到思想上的真正的统一……只有这样，实现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团结和联合，才不是一句空话。

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之路，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它是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再革命的最好的最实际的榜样。

列宁曾经说：“只要俄国人民争得了政治自由，工人阶级联合的事业，社会主义的事业，会进展得无比迅速，比德国工人的这种事业进展得还要迅速。”（同上，第401页）“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首先是要争取政治自由。有了自由，他们才能把全俄工人广泛地公开地联合起来，去争取新的美好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列宁选集》第一卷第332页。）“除了经过民主主义，经过政治自由，没有其它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同上，第641页）。俄国革命验证了列宁的科学预见。今天，如果中国人民争得了政治自由，那么，发

动社会主义再革命、从而再次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排头兵还会有什么困难吗？

必须认识到，无产阶级争取民主的斗争，不能靠恩赐，不能靠乞求，只有靠斗争，甚至是流血斗争，这是真正意义上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正是这一斗争，能够推动无产阶级革命不断向前、向上发展，这一斗争的最高形式，就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行动起来，运用一切可能运用的手段，包括暴力手段，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可以说，争取无产阶级民主的最高意义就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且，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后，还具有巩固、保护无产阶级专政，杜绝产生特权、产生修正主义的意义。

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的斗争中，积累了大量的丰富的革命经验，包括争取民主的经验，有关论述很多，讲得非常实际，非常透彻，又都经过了俄国革命的实践检验，非常可靠，值得我们重新认真学习。

基于这些道理，会议再次强调，争取民主是我们面对的不能回避的历史任务，一定要踏踏实实地有步骤地做起来。

目前，我们应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35 条为武器，争取起码的民主权利。

毛主席亲自领导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毛主席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中国的社会实际，对民主问题有明确而深刻的科学论述。毛主席提出，在我国的宪法中，要坚持两条基本原则，即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的原则贯穿在我们整个宪法中。另一个就是社会主义原则，即要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毛主席主张，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见《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209 页）毛主席领导制定的《五四宪法》体现的就是这一民主思想，我们今天依然要坚持这一思想。

《五四宪法》，包括后来多次修订的《宪法》，甚至包括现行的经过修正主义统治者修订的《宪法》，都写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应该享有的民主权利。现行的《宪法》的第 35 条，明确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我们争取民主的斗争，完全可以从要求切实落实《宪法》第 35 条做起。我们要和一切违背《宪法》第 35 条，另外制定破坏《宪法》第 35 条执行的所谓“条例”、“法规”做斗争。例如，《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游行示威的自由，但是，在法西斯专制统治下，至今还没有批准过一次公民申请的游行示威。这就是典型的拿法西斯专制的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对抗、破坏《宪法》第 35 条有关规定的执行。这是修正主义的欺骗性的典型表现。我们要揭露这种欺骗性。要反其道而行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宪法》第 35 条的关于民主权利的有关规定，去反对实际践踏《宪法》第 35 条的法西斯专制，进行合法斗争。

基于这一斗争策略，会议决定，把争取落实《宪法》第 35 条，作为我们切近的争取民主的斗争步骤。我们要切实地做起来，要敢打硬仗，不能只是放空

炮。我们的许多其它的斗争，包括维权的斗争、经济的斗争，都可以、也必须和这一政治斗争结合起来。

6、会议再次重申，自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革命导师一再教导我们，“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又一再告诫我们，人民群众要自己解放自己。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是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没有人民群众运动就没有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毛主席晚年一再指挥我们唱《国际歌》，说《国际歌》唱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并且说，“不仅要唱，还要照着做”。《国际歌》唱的就是，不靠神仙皇帝，不靠救世主，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今天，在资本主义复辟、人民重新遭受苦难，需要我们鼓起勇气进行社会主义再革命的关键时刻，重温革命导师的教导，实践革命导师的教导，是我们能否成功发动社会主义再革命的关键。

形势发展到今天，仅仅做网络斗争是远远不够的，也不能只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打转，要大胆依靠工农青年一代，历来的革命都是青年人为主力军的。最近我们提出，“走出网络，走进工农”，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一定要把依靠工农，深入工农，发动工农，掀起工农运动摆在我们一切基础工作的首位。我们要把工农的经济斗争、维权斗争和争取民主、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结合起来，要把经济斗争、维权斗争，提高到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高度。

会议号召，同志们要不畏高压，不怕困难，到工农中去，以维权斗争为切入点，力争打胜几个漂亮仗，扩大“中国毛派联合”的积极影响，提升工农运动的阶级水平、斗争水平。

与这一斗争同步，在适当的时机，组建“中国工农联合”，从组织上把中国工农群众联合起来。

遵照革命导师的教导，也是国际共运的经验，我们要办机关报性质的杂志《新红旗》和网站《人民之声》。既要把网媒办好，更要把纸媒办好。我们要把马列毛主义、特别是毛泽东主义，关于反对修正主义、进行社会主义再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宣传给人民群众，统一人民群众的革命思想，统一人民群众的阶级意志，展开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再革命运动。

我们这样做，无非还是坚持革命导师的一贯思想：只要人民群众起来了，中国就有希望了。

7、在法西斯专政条件下，斗争的形式是一个绝不可忽视、绝不可掉以轻心的重要的问题。必须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不敢斗争，畏惧牺牲，是完全错误的。但是，不顾条件，不顾可能，不善于合法斗争，一味盲动，造成不必要的牺牲，也是完全错误的。斗争是一门艺术。这门艺术可以有无限的创造。工农是创造这门艺术的大师。只要我们深入工农、尊重工农，我们就会找到合适的正确的斗争形式。同时，我们还要向我们的先辈们学习，共产党人在白色恐怖下创造的斗争经验是给我们留下的宝贵法宝。我们要继承这些法宝，学会使用这些法宝，发扬光大这些法宝。

8、会议强调，社会主义再革命，是人民群众的革命，进行这样的革命，必须坚持毛主席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人民革命统一战线的思想。

社会主义再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经过共产党），是以工农阶级、包括站在工农阶级一边愿意投身社会主义再革命的广大干部、广大党员、广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革命，同时，为了成功进行这一革命，还要团结一切可以团

结的劳动者阶级的革命群众、包括从事劳动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群众，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反对法西斯专制统治的集团、阶层、政治力量，从而结成最广泛最有力量的社会主义再革命的统一战线，孤立打击最反动最凶恶的以修正主义、法西斯专制为其政治特征并执掌政权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及其死心踏地依附于这个阶级的私营资产阶级的某些政治势力和公开或不公开支持、操纵这个阶级的外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某些政治势力。

会议认为《洛阳会议纪要》对私营资产阶级的分析是正确的。私营资产阶级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是靠“权钱交易”、残酷压迫剥削工人阶级起家的暴发户，而且身上有浓厚的封建性，这和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本身的出身以及他们扎根的中国社会的特点决定的。他们的命运是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的。必须看到，正是法西斯资产阶级专制给他们带来了一切，因此，一般说来，这个阶级不但不会是反对专制的民主派，而会是维护专制统治的阶级基础。不要忘记，我们进行的是社会主义再革命，这是一场革资产阶级的命，我们的反对专制，争取民主，是和这一革命的阶级性质相统一、相联系的。这和向封建主要民主、要政权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有历史阶段、阶级属性的根本区别。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必须在策略上十分谨慎、十分小心，。

在这个问题上，从简单的历史经验出发，或从脱离现实实际的教条出发，都会发生判断错误。我们要尊重近四十年来的历史经验，要从私营资产阶级的实际政治表现出发，正确决定我们对这个阶级的政治策略，力求避免各种形式的“左”的或右的机会主义。

我们这样说，并不否认，在特定条件下，在特定的时间、地点，私营资产阶级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会发生矛盾，我们并不反对在特定条件下，联合、利用愿意反对法西斯专制的资产阶级政治力量。我们尊重事实，一切从实际出发，而绝不从本本出发，作教条的硬性的先验的规定。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情况更复杂得多。对于其中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派、社会民主主义派，我们要有符合实际的全面的正确的分析。在反对法西斯专制的斗争中，我们与这些派别有可能实行暂时的联合，但是，在未来中国的走向、道路问题上，我们与他们必然会发生不可调和的斗争。

我们必须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坚持阶级斗争的观点。这里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不能作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尾巴。这是由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证明了的，也是由国际共运史的历史经验证明了的。

9、会议重温了马列毛革命导师关于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和理论。坚信列宁的教导，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唯一的武器就是组织。会议强调，在党变修、国变色的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组织工作迫切而艰难。“中国毛派联合”深刻意识到这一点，并要求自己对此有所贡献。

“中国毛派联合”目前只是一支马列毛主义指导下的政治力量，只是一部分坚持马列毛主义信仰、坚持共产主义理想的同志们联系起来的政治群体。我们并不否认，我们希望能够向无产阶级革命党过渡，但是，我们也深知，在宪法的“结社自由”被践踏的情况下，要想实现这一点，只有伴随着我们捍卫宪法第35条、争取民主的斗争的不断深入才有可能。

这是我们坚定不移要实现的目标。我们深知，没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就没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再革命。同时，我们重视实际可行的稳妥的步骤。

会议经过认真讨论和民主程序，确立了“中国毛派联合”近期的联系机制和联系形式。细节略去。

10、会议研究了我们的经济工作，强调指出，为了支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再革命运动，为了满足开展斗争所必须的人力、物力，我们要大抓经济工作，抓好经济工作。目前我们的经济工作已经有了初步的基础，现在需要的是继续发展、继续扩大。关于这一工作的细节，会后会有相应安排。

11、最后，会议呼吁一切真正愿意革命的毛派同志，要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大无畏精神，鼓起社会主义再革命的勇气，果敢发动社会主义再革命运动。

会议强调，我们必须牢记毛主席的教导，“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马列毛主义的灵魂绝不是像邓小平说的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唯物主义认识论。正是坚持这个认识论，坚持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实际出发，马列毛主义的灵魂必然是要革命，要造反，要进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实现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

四十年来我们所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不敢造修正主义的反。毛主席当年说得很清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就要造反，人民就要造反，而且明确说，“不造反就犯错误”。毛主席是对的。毛主席表达的是一种真正的彻底的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气魄。我们辜负了毛主席的希望。我们受到了历史的惩罚：党变修，国变色，人民重新受苦受难。

铁的阶级斗争的事实教育了我们，错误和挫折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变得比较聪明了一点，我们终于认识到，只有革命一条路，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我们要举起马列毛主义的造反有理的红旗，奋起反抗，奋起斗争，奋起革命，造修正主义的反，革修正主义的命，结束修正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争取中国社会主义再革命的伟大胜利。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没有危险的革命是没有的，没有牺牲的革命也是没有的。社会主义再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一样，需要付出牺牲，付出代价。我们依然要发扬毛主席提倡的那种革命豪情：成千成万的革命先烈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韶山会议全面回顾了自洛阳会议以来，中国毛派联合在《洛阳会议纪要》指引下进行斗争的经验和教训。代表们一致认为，实践证明，《洛阳会议纪要》是基本正确的，现在，为了进一步开创社会主义再革命的新阶段，在坚持《洛阳会议纪要》的基础上，还要有新的经验总结，新的思想提出，以上《韶山会议纪要》就是适应这样的需要而作出的。

《韶山会议纪要》，是《洛阳会议纪要》的继续和发展。两个《纪要》，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的整体。中国毛派联合的同志们必须把两个《纪要》作为一个统一整体去理解、去贯彻。

修正主义者总是靠欺骗过日子，他们欺骗人民，也欺骗自己，在欺骗中不可避免地陷入盲目性。他们看不到，也不愿承认，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正一步一步朝我们走来，革命的客观形势正在逐步走向成熟。

我们马列毛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不同，我们不仅以科学的态度认真分析革命形势的到来，而且看到，即便在革命形势到来之时，能不能发动革命，还要取决于革命的主观力量的成熟度。正是基于这一点，“中国毛派联合”决心接受历史的考验，我们决心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不辜负人民的期望，在中国历

史将要发生、必将发生重大转折的关键时刻，担当起历史赋予我们的发动、推动革命的时代重任。

毛主席说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今天，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现正进行的社会主义再革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只是，那时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现在是在无产阶级专政被颠覆为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再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演习，也是实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形式是一月革命。一月革命的原则是，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这个伟大原则是永存的。在五十年后的今天，这个原则并没有过时。尽管我们没有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保护，尽管因此我们要面对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但是，也许正因为发生了这个根本变化，正因为有了那时没有的特殊困难，我们更要坚信这个原则，坚持这个原则，贯彻这个原则，这个原则体现了马列毛主义的最根本的道理，只要有用马列毛主义武装起来的共产党的领导，只要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只要有广大劳动人民的革命大联合，就有能力向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就有能力胜利实现社会主义再革命。

我们有决心、有保证夺取胜利，因为永垂不朽的革命导师毛主席与我们同在。

面对即将到来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大决战，让我们振臂高呼：

中国毛派共产主义者联合起来！

中国人民联合起来！

社会主义再革命胜利万岁！

中国毛派联合 2015 年 12 月 27 日

《论人民民主》一书节选

2016.8.18

三 争取人民民主，具有社会主义再革命的纲领意义

在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近四十年的统治下，中国发生了彻底的资本主义复辟。而且，这一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正是毛主席预见的最坏的资本主义。

经济上是三位一体的官僚垄断买办资本主义、外国垄断资本主义和依附前二者的大私有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这一经济体系，盗取国家资源，榨取人民血汗，催生了举世罕见的大量的亿万富翁。

政治上是以一党专制为特征的压迫剥削人民的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其黑暗程度和残酷程度是空前的。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希特勒比戴高乐坏”。

思想文化上是修、资、封大杂烩垄罩一切，腐败至极。

批量揪出的腐败贪官，可以说是中国现实社会腐败程度的生动写照和衡量尺度。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只有进行社会主义再革命才是唯一的出路。其它的任何改良主义的愿望，只能是幻想，是不可能成功的。

怎么进行社会主义再革命？

能套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武装斗争的道路吗？国情变了，时代变了，走不通。

能套用议会斗争的道路吗？中国根本就没有议会，连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也没有，而且，这种机会主义的修正主义的议会道路顶多只能通向资本主义的改良，如社会民主主义。

能套用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的道路吗？那时有战争及其相连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战争带来革命，现在我们没有这个条件，这条道路至少现在无法提上议事日程。

我们还面对着一些中国国情所特有的实际情况。

苏东的修正主义统治垮台了，转变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我们这里的修正主义没有垮台，而且，顺利地成功地复辟了资本主义，走上官僚垄断买办资本主义社会。说特色，的确是特色，只是是特色资本主义。

在这个特定的社会形态下，阶级、阶级关系的状况也有了过去不曾有过的显着特点。例如：

外资及其白领高管，有其特点；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有其特点；与官僚、外资勾结一气的私人资本家阶级，也有其特点。

劳动人民阶级方面，农民工是一大举世仅有的“特色”；农民在改革中更加小私有化，也更加风雨飘摇，也是新现象；工人阶级彻底从国家的主人沉沦为雇佣劳动者，更是过去不可比的。

这些阶级、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再革命的出发点，它也必然决定着社会主义再革命的新特点。

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法西斯统治者，一方面，手里依然举着假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红旗，并采取一定的很有欺骗性的政治措施，例如反腐，这些对广大劳动人民依然存在极大的欺骗性；另一方面，法西斯统治者又毫不手软地运用暴力国家机器，对劳动人民的任何反抗斗争进行残酷镇压，就像法西斯头子邓小平总结的，要把反抗斗争，扼杀在萌芽之中。并且，毫不留情地剥夺了广大的劳动人民的任何民主权利，所以至今我们连一个真正的马列毛主义的共产党也组织不起来。

这是阶级、阶级关系决定的政治状况，是我们面对的残酷的但又是真实的事实。

在这种情况下，究竟应该怎么办才是正确的无产阶级的策略呢？

有一种说法，即所谓的“一次革命论”，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论。

就我对这一派理论的了解，其不足之处至少有两点。

一是，把目前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简单化，认为仅仅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的矛盾。这完全离开了中国社会多种阶级、多种阶级关系存在的

复杂的实际状况，因而不可能制订出符合实际的能够团结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政治策略。

在他们看来，要进行的是纯粹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我们看来，要进行的是不纯粹的社会主义革命。他们要建立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建立的是人民民主专政。他们要争取的是无产阶级民主，而且认为这只能在获得政权后才能实现，在这之前展开争取民主的斗争是没有现实的意义的；我们要争取的是更为广泛的人民民主，并认为，争取民主的斗争是和争取政权的斗争同步的、统一的、相互配合的。

这些，自然是斗争策略上的深刻的不同。

二是，反对首先争取民主，认为向资产阶级争取民主是不可能的，主张把工作中心放在发动群众上，在时机成熟时，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有的甚至主张，必须发动暴力革命。但是，他们只是在这样说，并不能拿出推动革命运动的实际步骤，理论流于空喊，而且是高调的吓人的空喊。

所以，这一种观点带有浓厚的教条主义气味，是我们不能同意的。

还有一种说法，即所谓“二次革命论”，也就是“先搞人民民主革命，再搞社会主义革命”论。有人还使用“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概念。

我对这一派的理论，了解得多一些，因为他们总是很有耐心地不厌其烦地向我灌输。我先是认真思考，然后弄清了分歧。在我看来，这一理论的主要不足就一点。就是没有正确理解“人民民主革命”的性质。

这一派对中国社会经济关系、阶级关系的分析，我们小有不同，可以商量。首先要突破专制，争得民主，意见基本相同。

分歧主要发生在是要划分为“二次革命”呢，还是同属社会主义再革命。

这个分歧是深刻的，涉及一系列理论问题。

第一、专制制度是政体，既有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下的封建专制，也有资产阶级统治下的法西斯专制。不能一见专制就以为是封建专制，而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我们现在面对的专制应该说是资产阶级法西斯专制。这一点毛主席也是这样看的。他不止一次这样说过，也不止一次拿希特勒作比喻，而从不拿封建皇帝作比喻，毛主席对这种专制的资产阶级属性的定义是十分清楚的。

因此，我们反对专制，争取民主的斗争，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而是从属于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反对资产阶级篡权的社会主义再革命的斗争。不能说，面对法西斯资本主义复辟，我们要开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斗争。这样说是走苏东的路，不是我们共产党人所要追求的。这种思想理论的危险也许正在这里。

第二、我们进行这场斗争，是以马列毛主义为指导的，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通过共产党），以工农为主体并发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展开的斗争。这样的斗争主体，决定了这场斗争的性质，只能是以社会主义为目标、为纲领的社会主义再革命。一般资产阶级到底能不能参加这场斗争，要看实际，而不是背诵教条和依靠历史比喻。不管怎样，我们都要牢牢把握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权，而这就意味着，只能是搞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主义再革命，不是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争民主也只能是社会主义再革命的组成部分。

如果没有这一点，那只能是“颜色革命”，也就是像苏东，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代替修正主义的法西斯官僚垄断资本主义。这是实践提供的证明。这

是“二次论”，但是，这是资产阶级的胜利，无产阶级的失败，社会主义再革命被推迟。

他们有时抽象地使用“人民民主革命”这个概念。我反复问他们，这个“人民民主革命”到底是无产阶级的人民民主革命，还是资产阶级的人民民主革命。如果是前者，那正是社会主义再革命，如果是后者，那正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第三、许多同志都低估了、甚至根本不懂争取人民民主的意义。

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误区。

例如，有的同志认为，一讲民主，就是讲普世价值，就是讲资产阶级民主，就是讲资产阶级宪政民主，看不到争取民主是一场阶级斗争，是可以反映无产阶级的民主要求的；也有的同志认为，既然是反对专制，争取民主，那就只能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和社会主义挂不上勾，要挂勾，只能下一步；也有的同志把民主，只是理解为、局限为言论、集会、结社、出版、游行示威等的民主权利，没有弄懂民主的最高意义和历史地位；也有的同志，完全排斥了争取民主的可能性，认为在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要想得到民主是幻想，更严重点说，是欺骗。他们只追求革命的爆发，只追求暴力革命。他们根本不管革命导师，针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背景，反复地不断地指出，有的国家争得了民主，有的国家还在专制下，情况是不同的，争取民主的历史任务也是不同的，历史要一步步走。总之，在这些同志的眼里，只有僵死的教条，没有生动的历史。误解很多，不必一一列举。

之所以发生这些误解，就是因为这些同志没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没有认真读马列毛，因而，没有弄懂人民民主、无产阶级民主的重要意义。

前面已经作过一些说明，这里再做一点进一步的说明。真想弄懂这个问题的同志，最好还是去读马列毛关于国家学说的著作。

人民民主的最高意义，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争取人民民主，并不仅仅是争取一点民主权利。争取人民民主的最高的意义在于，这一斗争每前进一步，都是向人民民主专政，也就是向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向执掌政权前进一步。同时，争取人民民主，还意味着是争取人民群众展开阶级斗争的舞台的不断扩大，使更广大的人民群众作为阶级觉悟起来、团结起来，最终完全实现最彻底的人民民主，即夺取政权、执掌政权。

争取人民民主，是政治斗争，是阶级斗争，远高于经济斗争，其实质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人民民主不过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形式，形式服从实质，实质决定形式，正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这一本质决定了，争取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再革命的特定表现形式。

争取人民民主，是一个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哪怕最低形式的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也是政治斗争，也是最贴近政权的斗争，也远高于经济斗争。不用怀疑，最高形式的争取彻底的人民民主的斗争，只能是争取政权的斗争，只有掌握了政权，才有彻底的人民民主，才有人民民主专政。

这个过程，难道不正是社会主义再革命的过程吗？

根据当代人民运动的历史经验，也是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只要人民起来了，修正主义是不堪一击的，而这个过程，正是和人民群众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同步的。

经过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最后实现夺取政权，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或者如“二次革命论”者说，建立起联合政府，到底是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呢，还是社会主义再革命的胜利呢？

答案是明确的，是社会主义再革命的胜利。

人民民主革命不是超阶级的，要确定其阶级性质。不确定其阶级性质，是理论上的失误。

要是资产阶级主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建立了资产阶级主导的政权，那这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无关，也不可能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再革命。

如果是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主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建立起无产阶级主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那这只能是社会主义再革命。

道理再简单不过，政权已经实际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联合政府不过是无产阶级主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

当然，又必须看到，这毕竟是一场人民革命运动，而不是纯粹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只能说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特定形式，虽然革命的主体队伍更广大，但革命的起点却更低，革命所能达到的目标也更低。

这是中国作为一个没有经过发达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国情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二次革命论”者注意到这一切，是有道理的，比教条主义的“一次革命论”者更接近中国的现实实际。

最近（2016年底），我和“二次革命论”的同志又做了一点讨论。他们依然坚持自己的意见。

他们的意见的确是一种“二次革命论”。自然并不是历史上的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的翻版。但是，他们讲目前中国面对的革命，是要分别进行两次革命，这是他们的十分明确的观点。具体说就是，先进行人民民主革命，摧垮了专制制度，夺取了政权，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他们反复讲清楚的，没有歪曲他们的原意。

我在微信群的音频里批评了这个意见，我把我的批评意见补充写在这里。以备历史检验。

1、根据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根据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反对修正主义上台，反对走资派的斗争，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解决“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问题，是解决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这场斗争的基本性质，毛主席领导的党的认识，从来没有动摇过。毛主席自己更有明确的表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没有人怀疑毛主席的教导，提出应该把这样的斗争说成是“人民民主革命”。

文化大革命初期，曾针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实行的法西斯专政，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但是，毛主席并没有说，为了要摧垮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要先进行反对专制的人民民主革命。事实是没有谁提出这个问题，也没有发生这个问题。从摧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到广大人民群众起来发动“一月革命”，是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全过程。没有什么“二次革命”。

2、我们一再指出，在马列毛主义理论体系中，民主革命这个概念是特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二次革命论”的同志实际也是这样使用的。

这就很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难道在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实行法西斯专政的情况下，我们要退回去进行为了反对专制、争取民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吗？

这在理论上是根本不通的，自然也违背了毛主席的一系列教导。毛主席从来没有发表过这样的意见。毛主席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是清楚的，有关教导是大量的。除非你充耳不闻。

3、这是一个全新的历史课题。唯一可借鉴的历史经验和理论分析，是在毛主席主持下，我们党当年对苏修的批判。但是，现在中国蜕变的程度和当年苏联蜕变的程度，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只有依靠从实际出发，才能获得关于这个问题的真理。

中国现在最大的实际就是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如果说到特点，最大的特点，还是毛主席说的，修正主义上台后，实行法西斯专政，搞最坏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本质，最坏是特点，二者有机统一，二者缺一不可。讲特点不能离开本质，讲本质不能忘记特点。

我们反对这个修正主义带来的最坏的资本主义，不能不从这两点出发。

一是坚持对本质的认识。我们进行的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主义再革命。这是由中国当前复辟了资本主义的社会性质决定的革命的性质。几十年来，毛主席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也是这样从事革命实践的，包括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演习”，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不是反对别的复辟。

二是坚持对特点的认识。我们要反对这个法西斯专制的资本主义。我们把争取民主的斗争放在首位，就是这个特点决定的。不突破专制，没有政治自由，就没有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的政治运动，就无法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斗争。但是，我们这种反对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的争民主争自由的斗争，绝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只能从属于社会主义再革命。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历史条件下，谈不上会发生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退一步讲，就是自由资产阶级领导推倒了修正主义法西斯专政统治，那也很难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要还是资产阶级统治政体形式的转换。类似台湾从专制向民主的转换。89年，赵紫阳成功，也可能会发生这样的转换。未来中国也未见得没有这种可能。但是，这不是社会革命，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不是。

考虑到这各种历史可能，人民民主革命论的提出是没有历史根据的。

4、专制有各种不同阶级的专制。不能一见专制就以为是封建专制，一反专制就是民主革命，这是不恰当的。

要看是哪个阶级的专制，哪种历史条件下的专制。毛主席明明说，是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怕不好懂，又说是希特勒，比戴高乐坏。用两个活生生的政治家，比喻两种政治体制。这个阶级定性还不清楚吗？够清楚了。但是，碰上教条主义者，他硬是不接受，你有什么办法？

5、要正确理解和运用革命导师关于如何认识、如何对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指示。

大家都知道，不能教条主义地对待革命导师的指示。但是，实际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却不一定。不一定是有意，更多是无意，是受认识水平的限制而滑向教条主义。

例如马恩的意见，主要是针对19世纪英法德等国的历史条件发表意见的；列宁则主要是针对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俄国的历史条件发表意见的，就是都

是谈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要解决的历史课题，要完成的历史任务，也是很不一样的。至于能不能和我们今天面临的历史条件作比较，我看一般是不合适的，硬要套，只会套出错误。

社会革命的准确意义是指社会形态的变更。离开这一点，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是立体的，多层次的，一次革命并不一定能够将全部历史都彻底完成。但是，只要涉及社会革命的历史任务，总是要和社会形态相联系的。不管是就基础而言，还是就上层建筑而言。没有这样的历史内容，是谈不上社会革命的。

历史事实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最初荷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面临的历史任务，和一、二百年后欧洲诸国、包括俄国面临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是不同的。马恩讲德国，列宁讲俄国，主要是针对皇权专制制度、农奴制封建残余而言的，所以依然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这是就这个时代的历史任务而言的，不是漫谈整个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有些早已成为过去。

中国不同，是初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旧也罢，新也罢，是从头做。从孙先生到毛主席，都是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大文章。

如果和我们今天面对的历史条件相比较，可以明显看出，历史条件是完全不相同的。我们面对的是资本主义复辟，是出现了最坏的法西斯专制的资本主义。革命导师那些关于民主革命的意见都不是针对这样的历史条件而言的。如果说有什么一般可适用的原则，哪只能是，没有政治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阶级的阶级觉悟和阶级组织，也就没有劳动人民阶级的政治运动。这可算是一条普遍真理，是我们今天要坚持的真理。超过这个限度，认为只要我们反对专制，就是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顶多再套上个“人民民主革命”的帽子，则是把革命导师的正确意见教条化成荒谬的错误了。

6、关于革命性质的争论不是一个小问题，深究到底，这是一个涉及到我们现正进行的革命的根本路线的问题。

去掉层层遮掩，根本的分歧在于，我们是要进行一场人民大众的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主义再革命？还是要先进行一场人民民主革命，然后再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

坚持社会主义再革命，和坚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反对谁、依靠谁、团结谁，以及怎样展开斗争、采取怎样的策略等根本问题上，路线、方针、政策都是有原则区别的，甚至是根本对立的。

路线决定一切。不同的路线将决定着革命的不同命运和结局。

我们曾经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工农群众对社会主义有深切的感情和无限的怀念，深知社会主义才是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只有举起社会主义的革命旗帜，才能吸引工农群众参加这场和自身利益息息相关的革命。

社会主义社会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修正主义上台，变人民当家作主为法西斯专政，对人民实行专制统治，这正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今天，当我们进行反对专制的革命斗争时，难道我们不正是进行重建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斗争吗？反对专制、重建人民民主专政，不正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的要求吗？这二者难道不是完全统一、不可分割的吗？

正是社会主义，正是人民当家作主，才是吸引劳动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再革命的伟大旗帜。

从人民大众的、实质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退回到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无疑是一种历史倒退路线。

最根本的问题自然在，这是离开当前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离开当前社会性质的错误说法。

直接危害就是不能正确处理资产阶级的问題，从已经出现的一些说法看，这些同志往往过高估计了私营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阶级联盟反对法西斯专制的可能性，不是从既定的事实出发，而是从国际国内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经验出发，生搬硬套这些和现在我们面对的历史条件根本不相吻合的历史经验，结论当然是错误的。

这是一个很实际而又很危险的错误。这关系到对于当前我们要进行的反对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方向问题。坚持社会主义再革命，就必然要把握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必然会失去劳动人民的支持而被资产阶级夺去领导权。

为了帮助“二次论”的同志解开思想疙瘩，我想，我们重温一下列宁 1921 年所写的《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是会得到帮助的。

列宁有两个思想，对我们很有启发。

一个思想是苏维埃制度、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即意味这将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列宁是这样论述这一道理的。“苏维埃制度就是由一种革命发展为另一种革命的显著的证明或表现之一。对工人和农民来说，苏维埃制度是最高限度的民主制，同时它又意味着与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决裂和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型民主制的产生，即无产阶级民主制或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生。”（列宁全集第 33 卷第 35 页，1957 年版。）列宁的论述清楚地告诉我们，工农苏维埃制度、苏维埃政权——“无产阶级民主制或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起来，这正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证明或表现之一”。这个道理对我们争取民主的斗争是同样适用的。我们冲破专制，走向民主，最终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难道这不同样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证明和表现”吗？！更何况我们是在资本主义复辟的新的历史条件下。

列宁的另一个思想是，哪怕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遗留历史任务，也完全可以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副产品“顺便解决”。列宁是这样论述的：“要巩固俄国各族人民所取得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我们就应当继续前进，而我们也确实前进了。我们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作为我们主要的和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工作的‘副产品’顺便解决了。我们一向说，改良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副产品’。我们不仅说过并且还用事实证明过，资产阶级民主改造是无产阶级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的副产品。顺便提一下，所有考茨基、希法亭、马尔托夫、切尔诺夫、希尔奎特、龙格、麦克唐纳、屠拉梯之流以及‘第二半’的其它马克思主义英雄们，都不了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前一革命可以转变为后一革命。后一革命可以顺便解决前一革命的问题。后一革命可以巩固前一革命的事业。斗争，只有斗争，才能决定后一革命能够超过前一革命到什么程度。”（同上）列宁的思想完全体现了革命的辩证法。我一再说，我们今天面临的专制是资产阶级专制，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要完成的历史任务。退一步说，就算是封建性专制，就算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遗留历史任务，根据列宁的思想，我们不是完全可以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作为一种“副产品”“顺便解决”吗？这不仅是完全可以的，而且是必须的。不突破专制，

不争取到民主，人民无法发动起来，就不会发生真正的人民大革命，也就不会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

所以，反对专制，争取民主，与其说这是发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须的步骤，不如说这更是发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再革命的必须的步骤。

这才是列宁思想在今天的灵活运用。

与这个问题相联系。还有一个如何处理统一战线的问题。我从有的同志的论述看出，他们之所以要确定目前进行的是民主革命、甚至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提法，很重要的是考虑到为了团结私营资产阶级一起参加这场革命，生怕一旦提社会主义再革命就会吓跑了私营资产阶级。

这样理解目前我们要建立的统一战线对不对呢，符合不符合马列毛主义的原则呢？

不对，不符合。

第一、我们的统一战线的领导力量是无产阶级，基础力量是工农劳动人民阶级以及其它劳动人民阶级。反映这些阶级力量的旗帜，只能是社会主义再革命的旗帜。

第二、现在的争取民主的斗争，必须明确是争怎样的民主，哪种阶级性质的民主。我们不能争普世价值的资产阶级民主，只能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民主，而且，面对资本主义复辟，我们以捍卫毛主席时代的曾经经历过的社会主义民主，最为广大劳动人民所理解。为什么要反过来去争对劳动人民不过是欺骗的资产阶级民主呢？你们害怕吓走私营资产阶级，你们就不害怕吓走无产阶级、劳动人民阶级？

第三、争哪个阶级的民主，本身就会存在阶级斗争，由此，又必然地涉及究竟是哪个阶级领导争民主的问题，也就是所谓领导权的问题。这种阶级斗争是历史反复证明了的，是不能抹煞的，是有惨痛的教训的。不举起社会主义再革命的旗帜，不去争取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就等于迁就资产阶级去争资产阶级民主，就等于放弃争取民主斗争的领导权，最终，就会背叛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愿望。

第四、统一战线，从来是，有统一，有斗争。统一于反专制，争民主，但是，具体到，怎样反专制，怎样争民主，争怎样的民主，都会发生斗争。惧怕斗争，把统一战线理解为只有统一没有斗争，不敢斗争，是错误的。这样想，这样做，只能导致统一战线失败。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这是毛主席告诉我们的真理。切莫忘记。我们一定要有我们的争取社会主义民主的无产阶级的斗争策略。而基本点，就是坚持争社会主义民主，只有作到了这一点，一旦争取到了这样的民主，那就如同列宁所说，这正是社会主义再革命的胜利。人民民主专政的重建，是社会主义再革命胜利的标志。

不要重犯历史上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如抗日战争时期的王明。放大一点说，国际共运史上这样的例子也不少。我们要尊重历史经验，要牢记历史教训。

不能片面理解建立广泛的人民统一战线思想，不仅要强调广泛性，还要强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离开无产阶级对统一战线的领导，离开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必然要犯右倾机会主义、也就是修正主义路线的错误。这一点请二次论的同志不要掉以轻心。

我最近多次谈论思想方法。这里再重复多说几句。

任何历史经验都是当时历史的经验，都是从当时历史实际出发的，而为完成当时的历史任务所检验。同样，革命导师关于这些历史经验的指示，也是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前提的，不是离开历史条件的抽象的教条。可惜的是，二次论的同志从思想方法上看，恰恰没有处理好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历史经验不错，革命导师的意见不错，但是，用得不是地方、不是时候，文不对题，把正确的生动的理论变成了僵死的教条。结果，正确转化为错误，走向反面。

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明明毛主席关于这个问题有那样多那样明确的指示，为什么不好好学习、领会、贯彻，偏偏要离开中国实际搬用马列关于欧俄情况的指示呢？不要轻视毛主席，不要轻视中国的实践，在我看来，我们现在实际走在全世界认识社会主义理论问题的最前列。这是我在德国三十年来亲身感受到的。我倍觉毛主席伟大，他老人家无愧是在马列之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又一位伟大革命导师。

在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再革命伟大斗争中，必须学习毛主席的教导，继承毛主席的教导，实践毛主席的教导，发展毛主席的教导。只有作到了这一点，我们的胜利才必将是肯定的、有把握的。

我坚信历史会验证这一点。

坚持社会主义再革命，坚持从争取人民民主做起，无论是从反对修正主义法西斯专政，反对资本主义复辟来说，争取重建人民民主专政来说，还是从未来防止出现特权阶级，防止出现修正主义，防止政权蜕变来说，这样的口号，这样的思想理论路线，都是符合马列毛主义的。

如果具体要问，这场革命究竟会经历怎样的历程，我想，还是毛主席说的，革命者不是算卦先生，历史的发展变化总是千变万化、丰富多彩的，不然不是历史。

但是，大的规律性的东西，又是可以预见的，当代也提供了部分历史经验。

大体说来，第一步，也是很重要的一步，就是争取真正地实施宪法第 35、第 37 条。能否迈出这一步，能否有这个突破，这是人民革命运动的起点。实现这一点恐怕不会十分简单，斗争会是艰巨的、曲折的，是要付出代价的，甚至付出昂贵的代价。

第二步，一旦人民有了真正的民主权利，长期被打压的人民群众就会利用这些民主权利，掀起人民运动。这肯定也是一个曲折的过程，而且，更复杂，更难驾驭，但是，最终会从无序走向有序，形成相对统一的人民革命运动。

第三步，人民起来了，相对有组织的人民运动起来了，真正的马列毛主义的共产党能够领导整个运动了，这时，重建人民民主专政，重建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也就提上议事日程了。

这会是人民革命运动的最高形式，是文化大革命“一月革命原则”的再现和升华。在马列毛主义指导下，在共产党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团结起来，向修正主义统治者夺权。文夺还是武夺，那要由对抗的双方去决定。革命人民会牢记两个马克思主义原则，一个是勇敢、勇敢、再勇敢；一个是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

第四步，稳定、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建立人民民主、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

这将是一项艰难的又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要创造一种使修正主义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制度。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搞好人民民主制度、突出人民管理国家的权力、权利，是整个工程的核心。

革命是鲜活的，设想是干瘪的。我们只能谈论一点原则，而且，这已经很可能并不符合日后的历史实际。

经过这样的革命，我们可以建立起一个特定的社会形态，这个社会形态，是我们可能起步的带有过渡性质的社会主义社会，我给了一个科学的概念，“半社会主义”。

很多人不理解这个“半”字，不喜欢这个“半”字，其实这个“半”字很重要，是从历史实际出发的，是说像我们这样一个东方落后国家，没有经历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在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时，不能不经过的一个从不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逐步向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半”字，反映的正是这种过渡，用哲学的话语说，就是由量到质的过渡。

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这是一种历史必然。我们曾有过过高的期望，但是，我们受到了惩罚，而且，最终，我们只好还是退了回来。

不要轻视“半”字，要尊重“半”字，这不过是要求尊重历史辩证法，尊重历史实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目前中国现实的一种必然选择》

一文节选

2018. 3. 23

其四是表现在对当前革命性质的教条主义理解上。

最典型的莫过于“二次革命论”，或者说“人民民主革命论”、“新民主主义革命论”。

不管哪种叫法，其理论理解是一样的，主要就是以为我们现在面临着专制，因而反对专制的革命，就必然是民主革命。

我在《论人民民主》一文中，对这种教条主义的错误理解做了比较全面地批评。这里不再过多重复。我只想强调，对于社会革命性质的确定，只能以现实社会的性质为出发点。既然大家都公认，我们面临的是资本主义复辟，是重建了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尽管存在着法西斯专制，尽管存在着一定的封建遗存，但是，这个社会的基本的资本主义属性是明确的，反对这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重新革命、再次革命的属性也是明确的，只能是无产阶领导（通过共产党）的人民大众的社会主义革命。

作为一种政治体制的专制，不独封建社会存在，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下，都有可能发生专制。剥削阶级以专制作为统治形式，在历史上是常见的。我们面对的是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制，这是清楚的，也是毛主席指明的。不能见专制就以为是封建专制，就以为要进行反封建专制的民主革命。把我们现在

面对的资本主义国情，和马恩面对的德国（有封建皇帝，有严重的封建容克地主），和列宁面对的俄国（有封建沙皇，有严重的农奴制残余）作简单类比、简单等同，进而生搬硬套革命导师针对德国、针对俄国的意见，就会把正确的意见变成错误的教条。

有的同志还硬要把我们现在面对的私营资产阶级和解放前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作简单的等同，提出要联合这个阶级去进行反对修正主义执政集团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更是完全不顾历史条件的不同，生搬硬套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教条主义，错误也是十分明显的。

以上的种种教条主义错误告诉我们，读了一点马列毛主义的书，有了一点普通知识，就以为自己懂得了马列毛主义，就能够将马列毛主义应用于对现实的理解了，这是一种自我误解、一种自我盲目性，其结果是走向反面，走向马列毛主义的对立面教条主义。

当年毛主席在延安猛烈批评教条主义，骂教条主义连狗屎都不如，狗屎还可以肥田，不是气话，是真理。说教条主义害死人，不过分，我们为此而牺牲的同志还少吗？

当年那些搞教条主义的同志和现在搞教条主义的同志，情况有类似之处，都是读了一点马列的书，但是，食而不化，没有读懂，更没读通，又缺少革命实践锻炼，缺少丰富的历史知识，却盛气凌人地自以为已经马列毛在手，对自己的错误意见非要坚持到底不可，直接干扰了革命运动的正确方向、正确发展。

坚持教条主义又会影响同志们之间的团结。搞教条主义的同志都很僵硬，都很自信，都很难听得进别人的意见，并且爱给别人上纲，这能不影响团结吗？实际这常常是导致毛派不能很好团结的一大原因。请同志们想一想，是不是这样？

毛派搞不好团结，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大问题。这既是政治作风的问题，也是思想作风的问题。要解决政治作风的问题，还要从思想作风入手。不能错误地认为，我们不能讲修养。毛主席写《反对自由主义》也是讲修养的。在我看来，毛派同志加强修养，包括反对自身的教条主义，是不可回避的一大思想任务。

对“二次革命论”批评汇编

按语：

多年来，我曾以同志的友善态度对“二次革命论”进行过批评。但是，直到今天，这一分歧还是没有解决。持二次革命论的同志总以为真理还是在他们手里，我则属于“思想顽固”，“理论不足”，“存在短板”……等等。

今天，我们要再作一次讨论。我希望通过这次讨论，我们能够统一到正确的思想路线上来，至少希望大多数同志能够作到这一点。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我们很难走出这个阴影，虽然我们自己并不一定意识到这一点。人总是这样，就是这样，不然不是现实的人。任何人纠正一个错误认识是很困难的。尽管老祖宗留下了许多这方面的训诫，但接受的人还是很少，诚如毛主席 1958 年走到济南时所言，人这个动物就是爱骄傲。是的，主席说得对。可是，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好好地老老实实在地听毛主席的教导呢？

我希望我们通过这讨论能够有所进步。

下面，我把我过去一部份文章中对“二次革命论”的一些批评，汇编起来，这比一时的谈话可能考虑得更周到些，供同志们参考和批评。

《中国毛派共产主义者联合起来！

——中国毛派共产主义者洛阳会议纪要》节选

2015.2.6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洛阳会议的第一任务就是学习马列毛主义理论。通过学习，大家认为，《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理没有过时，《宣言》依然是我们毛派共产主义者的最基本的纲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也没有过时。列宁对时代的分析，对帝国主义本性和特征的分析，依然是我们认识当今世界的理论指导。毛主席的社会主义革命论，更是我们当前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统治、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直接的理论指导。

现在看来，毛主席的社会主义革命论，既包括社会主义革命（夺取政权）、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也包括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广义的）的理论；又包括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必须进行社会主义再革命的理论。这三部分理论是有机统一、不可绝然分割的。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对应，可以简称之为社会主义革命论。这是毛主席一生的两个伟大贡献，具有全世界范围里的普遍意义。

我们要充分尊重马列毛，凡是马列毛已经讲清楚的问题，不要搞画蛇添足。

正是运用马列毛主义理论、特别是毛主席的社会主义革命论，我们可以清楚看到：

中国已经是一个以修正主义为政治特征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复辟的程度已经远远超过当年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

在这个社会基本定性问题上，毛派共产主义者不能有丝毫的动摇和妥协。

这个社会的主导经济是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私营资本主义以及外国垄断资本主义构成其广泛的基础。贪污受贿是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占有剩余价值的特定形式。权钱交易，官商勾结，充当买办，既是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和私营资本主义、外国垄断资本主义合流的形式，又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私营资产阶级、外国垄断资产阶级分割剩余价值的特定形式。

私营资产阶级和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可比性。因为历史背景、历史条件完全不同。私营资产阶级已经失去了当年民族资产阶级所具有的革命性的一面，而必然地不可摆脱地带上依附性。对内依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依附于权力；对外依附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依附于超额利润的分割。这种依附性，决定了私营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阶级立场和政治态度。

在这样的经济关系中，工人阶级重新沦为雇佣劳动者。农民阶级正在分化，要么走进雇佣工人阶级行列，如农民工；要么在小生产中挣扎；上升为农业资产阶级的是极少数。

这个社会的政治统治，是以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为主导的整个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工农劳动者阶级成为了这个统治阶级的专政对象。

在这样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的基础上，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也占据了统治地位。一切前资本主义的腐朽的垃圾都被复活起来。

这就是当前中国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思想关系状况。

在这样的基础上，必然地重新产生阶级分化、阶级矛盾、阶级对抗。

在众多的阶级矛盾中，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工农劳动者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尽管，工人阶级经常地大量地进行的是反对私营资本主义和外国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斗争、维权斗争，但是，在这样的斗争中，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总是毫不犹豫地站在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一边，并运用手中的暴力国家机器，对工农劳动者阶级实行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

这就是我们面对的毛主席多次强调的修正主义上台后必然带来的“最坏的资本主义”。这是我们认识中国问题的实际的出发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质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特色”二字不过是修正主义骗人的把戏。看不到修正主义这个政治特征，就看不到中国资本主义的特点，就不能从这个实际出发去规定我们的斗争策略。就会犯教条主义的简单化的错误。看不到“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资本主义，就会抹杀社会主义已经被资本主义替代，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变成资产阶级专政，共产党已经变成资产阶级党的事实。就会犯右倾机会主义、实际也是修正主义的错误。

“救党保国”就是这样的典型的错误口号。

只有认清我们面对的是“最坏的资本主义”，认清资本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本性也是不会改变的，才能进而认清我们面对的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我们要进行的是革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命的社会主义革命。

这是我们面对的社会革命任务的性质的判断，是我们的斗争的大方向。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不能在理论上发生任何偏差，不能用主观愿望代替阶级分析。

反对以修正主义为政治特征的资本主义的斗争不仅是阶级斗争，而且是特别残酷的阶级斗争。我们只能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去进行这场斗争。其它任何的方式方法都是行不通的幻想。最终必然导致失败。

正是基于这一点，会议认为，我们必须警惕打着各种类似“救党保国”旗号的极少数投机分子的破坏活动。多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极少数投机分子和文革中的保皇派的骨干人物一样，他们实际是修正主义统治者的附庸和家奴。那时是，白天“造反”，晚上汇报，“丢车保帅”，目的在转移斗争大方向。现在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只反汉奸，不反路线；用民族矛盾掩盖阶级矛盾，目的也是转移斗争大方向。当年的保守派，不去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却专门炮打造反派。现在的“保救派”同样，不去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却专门炮打造反的毛派、无产阶级革命派。那一顶顶大帽子，就是他们急于表演“宋江打方腊”丑剧的铁证。这极少数人和历史上的革命队伍中的修正主义者一样，不仅会破坏革命队伍的团结，而且会导致革命斗争的失败。我们提请一切愿意反对修正主义统治的革命同志，要认清这极少数人的阶级本质，认清其欺骗伎俩，及时和这些人划清界线。

社会主义革命是革命，我们必须坚持革命路线。这是马列毛革命导师的一贯的思想。不管革命的手段有怎样的变化，革命的本质不能放弃。这一道理已经反复为共运史所证明。反对修正主义上台带来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也只能

是这样。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是解决修正主义上台导致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唯一手段。舍此没有其它的任何的手段可以完成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

这是一场伟大的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再革命。现在看来，这场革命的最可能的形式是在大中城市掀起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人民群众革命运动。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马列毛革命导师是一再这样讲的，《国际歌》是这样唱的，巴黎公社、十月革命、中国革命是这样干的。不管具体斗争形式怎样不同，只要人民群众发动起来，掀起革命风暴，斗争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现在看来，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反对修正主义统治、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主义再革命斗争。

文革初的 1966 年，毛主席在给江青的信中曾预言，如果将来发生右派的反革命政变，左派有可能举起他的旗帜，遵循他的教导，团结起来，打倒右派。

随后，在文革中，毛主席针对上海即将发生“一月风暴”，曾敏锐地指出，上海的学生起来了，工人起来了，机关干部也起来了，上海大有希望了。在毛主席看来，只要人民起来了，修正主义就要完蛋了。

这个道理，被随后发生的全国各地的夺权斗争所证明。“死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的呐喊响遍全国。人民起来了，就能从走资派手中夺取政权，就能自己解放自己，就能把人民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虽说那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局部的部分的夺权斗争。

苏东剧变的历史经验也从另一个侧面验证了这个道理。正是人民群众起来了，才最终结束了修正主义的腐朽统治。只是因为没有真正共产党人的领导，斗争的结果是重建资本主义。

中国 1989 年的动荡，也可以算作一次验证。当着人民群众起来时，修正主义统治者惊慌失措，内部发生分裂。这是一次历史机遇。可惜，当时，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反攻倒算中基本上都被投入狱中，无法担当运动的领导，而发动这场斗争的资产阶级自由派，表现的是软弱和愚蠢。这给了执政者以时间和机会，最终凭借暴力继续维持自己的统治。但是，留下的历史经验值得深思。

这些切近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最有力的最能实现社会主义再革命的手段是人民群众革命运动。这是任何其它的改良手段所不可比的。正如晚年恩格斯在著名的《导言》中所说，革命，无疑是历史进步、历史变动的“最权威的手段”。而且，恩格斯还特意叮嘱，主动进攻，胜过 1848 年曾运用过的防守性巷战。

中国毛派共产主义者要走这条革命路线，只能走这条革命路线。我们要发动一场人民群众革命运动，结束以修正主义为政治特征的资产阶级统治，实现社会主义再革命，重建马列毛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

走这条革命路线，就要突破修正主义的法西斯专制统治。修正主义依然声称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虽然是经过他们修改的）。这给了我们合法斗争的可能。我们就是要求落实宪法第 35 条赋予人民的各项民主权利。我们是以社会主义民主诉求去对抗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制。也许得到的只能是有限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但总比法西斯专制对工农劳动者阶级有利，有利于组织起来，有利于宣传发动群众。

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我们对民主的最高的诉求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而这只有在掀起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再革命运动，并取得政权后，才能最终实现。这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再革命和争取民主的斗争的必然的相互统一的历史步骤，也是我们争取民主的根本意义、根本目的所在。只要政权在手，人民当

家作主，这不仅是社会主义再革命的胜利，同时又是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新起点。

争取民主是当前斗争的切入点。这是一个艰巨的斗争任务。我们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只要是反对法西斯专制的力量，我们都可以联合，只是不要忘记我们的阶级独立性，不要忘记我们路线、目的和方向。

走这条革命路线，我们就要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宣传群众、发动群众上。理论是革命的灵魂，群众是革命的物质力量。只有实现这二者的结合，用马列毛主义武装群众，才能掀起社会主义再革命运动。我们一切工作的落脚点就在这里。为此，我们毛派共产主义者，必须深入工农群众，做群众的学生，实现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参予工农群众的一切革命实践活动，在革命实践活动中逐步实现马列毛主义理论转化为工农群众的思想武器。

走这条革命路线，我们还要认真看书，弄通马列毛主义。同志们一致认为，进行这场反对以修正主义为政治特征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斗争，我们在理论上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对未来究竟建设一个怎样的可以相对抗拒产生修正主义，抗拒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我们更是盲点很多，这都需要我们在马列毛主义指导下，再学习，再认识，难度相当大。共产党人却不懂马列，这好像是一个讽刺，但又是一个事实，这甚至是导致发生修正主义、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原因。同志们一定要对这个问题保持清醒的认识，要认真严肃地对待。如果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那么，要想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必须掌握马列毛主义。马列毛主义的红旗举得越高，社会主义再革命的胜利就越有把握。

努力学习，发动群众，争取民主，是我们毛派共产主义者现在要把握的三项任务。

总纲是社会主义革命。

总路线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经过共产党），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进步力量，反对以修正主义为政治特征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为在中国重建马列毛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而奋斗。

《关于“一次革命”和“二次革命”的争论》的跟贴

2015. 3.15

在红旗网上，有围绕民主问题发生的“一次革命”还是“二次革命”的争论，而且，影响了团结，影响了对争取民主这一斗争策略的统一认识和共同斗争。

在我看来，因此影响团结不好，影响斗争更不应该。这些同志在重大原则问题上还是有同可求的，完全可以求同存异。

在团结的大前提下，理论原则、策略原则最好还是经过讨论搞清楚。一时搞不清楚，难免，允许商量，允许善意批评。例如，我这里的不少议论就可能有错误，同志们一旦发现，请指出，只要你说得对，我随时准备修正错误。

我没有仔细研究过双方的不同意见，仅能说点个人的原则意见。

第一、我们要进行的无疑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现在的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以及由这种基本矛盾决定的历史阶段的属性决定的。

正像我们在前面论述的，争取民主的策略，是当前进行这场伟大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策略和重大步骤

不能一提争取民主，就以为是争取资产阶级民主，更不能认为，把争取民主作为当前的重大策略，就是要先进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就是“二次革命论”，不能作这样的简单化推论。

我们争取、捍卫的民主权利，是毛主席亲自领导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利，这部宪法是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社会主义宪法，因此，十分清楚，我们以宪法为旗帜争取的民主，是无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只要争取到宪法规定的权利，肯定会对展开社会主义革命有利，而且可以说，这是打破专制，展开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有力的战略步骤。

第二、修正主义的官僚特权垄断资产阶级实行专制统治，是其反动性、落后性、腐朽性的表现，但是，这和封建地主阶级的专制主义，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不同的，简言之，这不是同一个历史时代的历史问题。因此，不能把我们今天争取社会主义民主的斗争，说成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斗争，就是说成是新民主主义的争取民主的斗争也是不正确的。

我们是在特定的具有修正主义特征同时也具有法西斯特征的官僚特权垄断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争取民主，特征是形式，阶级是本质，从本质上看，我们是在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样的斗争，只能是为了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也正因为具有这样的本质，形式毕竟是这一本质的外在表现，因此，反对专制，争取民主，就必然具有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

马列毛主义的国家理论学说是马列毛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尤其对于现实的社会主义革命，对于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有极强的现实意义。我们应该认真地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列毛关于这一理论的原著，特别是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是这一理论的系统的论著，更值得我们逐字逐句认真学习，弄懂弄通。读马列毛，是我们毛派现在面临的一个十分现实又十分艰巨的学习任务。说现实，是因为我们对这些理论还不真懂；说艰巨，是因为读这些书，不是一次、一遍就能弄懂的。这是所有读过马列毛的同志的共同感受

〈开创社会主义再革命的新阶段 ——“中国毛派联合”韶山会议纪要〉节选

2015. 12. 27

2、会议认为，斗争实践证明，《洛阳会议纪要》对于目前中国社会基本矛盾、阶级矛盾、主要矛盾以及由此而来的革命性质、革命动力、革命形式的诸多分析，都是基本正确的，是我们需要继续坚持和贯彻的理论、路线、方针。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阶段的基本结束，同时，也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历史阶段的基本开始。

这是一个马列毛主义的科学论断。

只要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建立起来，不管因为怎样不同的历史条件而采取不同的政体形式，例如在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形式，这都意味着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社会主义社会，开始建立起来。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从不完全向完全的不断革命的逐步过渡的漫长历史过程。马克思最初从理论上提出了这一思想，列宁联系俄国的具体的革命实践，继承、发展了马克思的思想，毛主席又联系中国的具体的革命实践，继承、发展了马克思、列宁的思想，正是在这样代代相续的实践摸索、理论探讨的基础上，才诞生了伟大的马列毛主义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

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的基本点在于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社会主义的发展存在着两种可能的倾向、两种可能的前途，也就是说，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

历史验证了这一理论。苏东和中国都并非偶然地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所谓并非偶然，就是说其中寓于着规律性。对于这种规律性，依然有待我们继续认识。

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自 1949 年 10 月 1 日始，但是，在 1976 年 10 月 6 日被打断。历史的分期是要找出相对标志的。中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分界的相对标志就是 1976 年 10 月 6 日的反革命政变。

近四十年的铁的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发生了彻底的资本主义复辟。中国已经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且是法西斯专制的最坏的官僚垄断买办资本主义社会，对内压迫剥削中国劳动人民，对外依附超级帝国主义大国，并把资本的黑手伸向落后的发展中国家。

这个事实验证了马列毛主义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理论，验证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确存在着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1976 年 10 月 6 日后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不过是 1976 年 10 月 6 日前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区别在于，1976 年 10 月 6 日后，是资产阶级专政下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1976 年 10 月 6 日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看到这一斗争的连续性，有利于帮助我们深刻认识当前阶级斗争的性质和规律。

这个事实也告诉我们，我们面对的是资本主义复辟，而不是别的社会性质的复辟，例如不是历史上发生过的封建主义的复辟。因此，我们要进行的再革命，只能是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主义再革命，而不是进行反对封建主义复辟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

毛主席预言过，修正主义上台，复辟资本主义，一是会搞法西斯专制，二是会搞最坏的资本主义。中国当代的历史正是这样展开的。值得我们认真领会的是，毛主席对这一历史现象的质的规定性的概括，还是认为这是属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毛主席拿希特勒和戴高乐做比较，也是以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不同政体形式做比较，一个是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一个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就是说，即便这里的专制带有封建性，是一种封建遗存，它现在也已经从属于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把最反动的东西复活起来，构成资产阶级法西斯专制。

正是基于这样的明确无误的理论认识，我们只能把我们当前面临的革命任务，理解为社会主义再革命。

同时，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也清醒地看到，进行这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再革命，必然地无法回避地面临着反对、突破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的历史任务。

不过，这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而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再革命的历史任务。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从十月革命到中国革命，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单一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这些国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这正是这个时代的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所必然具有的人民大革命的特点。我们要尊重、服从、掌握、驾驭这一历史规律。不能教条主义地认为人民大革命注定就是民主主义革命，尤其不能认为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即便面对必须反对专制，争取民主的革命斗争，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实现社会主义为历史任务的革命的性质，依然只能是这样。至于这一历史规律，会如何历史地展开，我们只能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而不要先验地画地为牢。

3、现在，正是围绕我们究竟面对着怎样的历史任务这个最根本、最要害的问题，我们和一些同志发生分歧。他们以要“打倒”、要“推墙”等大帽子，给“中国毛派联合”，给洛阳会议罗织罪名。

这是完全错误的。

透过那些漂亮包装的言词，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分歧的实质还是在：到底应该怎样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再革命，特别是到底应该怎样认识和对待现在的执政党、包括这个党的最高领导者。

攻击我们的人，否定在中国已经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事实。所谓“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十字路口”的说法，所谓中国现在是“半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的说法，都是妄图以惯用的折中主义的手法，掩盖在中国已经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已经发生根本的阶级关系变动、无产阶级专政已经蜕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事实。这是历来的修正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的特点，这正是修正主义。

这是我们绝不能接受的，是我们理所当然要给予反对的。

在我们看来，中国已经确定无疑地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专政已经确定无疑地蜕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正是看到这一社会性质的根本变动，我们才把中国毛派共产主义者的历史任务规定为社会主义再革命。

如果要问，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这就不能不涉及要分析、认识领导完成这一资本主义复辟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

谁都看到一个简单的事实，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的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毛主席马列毛主义路线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那时是名副其实的真共产党，现在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假共产党。

这是一个不容抹煞的根本区别，抹煞了这个根本区别，只就“中国共产党”这个名称谈问题，这是修正主义的抹煞事物本质的欺骗手法。

判断一个党的性质，主要要看这个党实际执行的是什么路线。不是看这个党在口头上讲什么，而是看这个党在实际上做什么。39年的历史证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实际执行的是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而且，39年来一以贯之，不动摇，不改变，直至今天。

这条路线，在 39 年前曾经遭到过毛主席的痛斥，指出这是“不管白猫黑猫”的“猫论”路线，也就是不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对立，放弃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放弃“阶级斗争为纲”的修正主义路线。

实践证明，这是一条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路线。放弃“阶级斗争为纲”并不等于这条路线真的不讲阶级斗争。不是的。邓小平修正主义者放弃的只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实际加强的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一句话，是复辟资本主义。

这个事实验证了毛主席讲的道理，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上台，就要搞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就要搞资本主义，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正是基于此，毛主席把这样的修正主义路线统治的党，称为修正主义党，资产阶级党，法西斯党。

不是我们乱发明，不是我们搞极左，而是老老实实在地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我们不得不沉重地承认，曾经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现在已经堕落为修正主义党、法西斯党、资产阶级党。这个党的领导人已经堕落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甚至是法西斯代表人物。这些领导人扮演的历史角色，绝不是代表个人，而是代表阶级，代表资产阶级，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正是这样的党、这样的党的领导人，领导了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这部令真正的共产党人无比痛苦的历史正在继续。这个党，这个党的领导人，至今没有丝毫的改变。如果谈论是谁要打倒并且已经打倒了中国共产党，只要尊重事实，就应该承认正是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邓小平修正主义集团打倒了真正的革命的中国共产党。

在这种情况下，要我们去“挺”这个党，去“挺”这个党的领导人，难道不就是要我们去“挺”资产阶级，去“挺”资本主义复辟，去“挺”法西斯专政，去“挺”资产阶级剥削压迫工农群众吗？这是我们绝不能答应的，更是我们绝对不会去做的。我们不愿扮演这样的历史丑角。谁愿意扮演这样的丑角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但是，请不要玷污“毛派”这个光荣的称号。

口头上讲阶级斗争观点，一遇实际问题，就忘记、放弃了阶级斗争观点，这正是修正主义者失足的思想、世界观上的原因。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个历史教训。我们必须坚持用阶级观点分析、认识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上台，不是个人的问题，不是个人的罪孽，包括不是邓小平以来个别领导人的罪孽。这是一个阶级的现象，是阶级斗争，是阶级斗争的结果、以及由此带来的必然的阶级关系的变动。修正主义统治者的阶级本性是不会改变的。我们不能对修正主义统治者抱不切合实际的幻想。阶级斗争只能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去处理。结束修正主义的统治只能靠革命，只有革命一条路。

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在党变修、国变色的情况下，我们依然不会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党员、广大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是不赞成搞修正主义的。但是，不能否定的事实是，八千万共产党员至今并没有改变修正主义路线在全党占统治地位的这个历史和现实，没有改变党的性质已经发生蜕变这个历史和现实。在苏东和中国发生剧变时，可悲在于“竟无一人是男儿”。这个事实是严酷的，是我们不能不正视的。面对这样的事实，说任何空话都无济于事，唯一正确的策略只能是鼓动广大党员、广大干部觉悟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

如何正确认识和正确对待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如何正确认识和正确对待篡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修正主义集团，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看问题，现在在毛派内部发生的分歧，实质是毛派内部的两条思想路线的斗争，是修正主义思想在毛派内部的反映，只有清除了修正主义

思想路线的恶劣影响，真正的毛派的大联合、大团结才是可能的，才是有意义的。

我们不回避这种思想路线的斗争，也不畏惧这种思想路线的斗争，我们深知，只有清除了修正主义思想路线的干扰，才能更好地开展反对修正主义统治的斗争。马列毛主义革命导师对此有明确的教导，也有充分的国际共运的历史经验做根据，我们的切身经验也在反复验证这一点。我们对于极个别的投机的机会主义头面人物不抱幻想，正如毛主席所说，机会主义头子改也难。我们把开展这一思想斗争的落脚点、重点，放在帮助广大毛派同志接受马列毛主义的社会主义再革命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从而在接受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基础上觉悟起来、团结起来，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毛主席在九大上曾经高呼：“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是一个马列毛主义的革命原则。我们要牢牢把握这个原则，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坚决反对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反对搞“唯我独革”，“唯我独左”，一定要诚恳地虚心地坚决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同志，落实毛主席的教导，“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4、中国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又是一个修正主义打造的特殊的怪胎的资本主义社会。以修正主义为政治特征的这一特殊的具有极大的欺骗性的资本主义社会，为社会主义再革命带来了特殊的复杂性、艰巨性。我们要充分认识这一点。

修正主义统治者，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干着复辟资本主义的勾当。这是修正主义统治的基本特点。这一特点决定了修正主义统治者的倒行逆施，对于广大劳动人民还具有相当大的欺骗性。这是近四十年来中国历史走了弯路，人民群众迟迟没有起来斗争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展开对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罪行的事实揭露和理论批判，始终是社会主义再革命的必不可少的思想准备、思想发动。没有革命理论的普及，没有人民群众的普遍觉悟，就没有社会主义再革命。不要忘记，任何一次革命，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这是普遍真理。

多年来，我们已经做了这方面的大量工作。但是，还不够。还要继续努力做下去。

一方面，要结合实际，从理论上说明，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就会搞资本主义复辟，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最坏的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又要结合实际，从理论上说明，必须敢于反对修正主义，必须敢于对修正主义实行造反有理，不然劳动人民就要像在已经过去的四十年中那样，在阶级的压迫和阶级的剥削中苦苦挣扎，永远也不可能得到解放。

另一方面，还要结合活生生的现实中正在发生的劳动人民的苦难，去揭露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残酷的阶级本性，就像过去搞过的忆苦会、诉苦会那样，启发人民群众的阶级感情，帮助人民群众觉悟起来，主动地积极地投身到社会主义再革命运动中来。

阶级的觉悟是靠阶级的理论培育的。一旦马列毛主义的革命理论武装了群众，社会主义再革命就有了胜利的把握。同志们要反复体会革命导师的老话：理论的批判，不能代替物质的批判，但是，理论一经为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

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这种理论的批判，始终要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纲。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修正主义路线是一条资产阶级的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混入革命毛派内部的修正主义思想路线，从内部起破坏作用，如长期存在的保救派思潮；还有一种是来自执政的修正主义执政者的修正主义路线，在这条路线统领下，大搞资本主义复辟，如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

我们必须准备对内外这两种修正主义路线都要进行批判，并处理好其中的斗争策略。

阶级斗争是纲。路线斗争是纲。路线斗争是阶级斗争的集中表现。阶级斗争是路线斗争的本质和基础。我们的理论批判，要始终紧紧抓住路线斗争这个纲。坚持用毛主席的马列毛主义的阶级斗争的路线，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的取消阶级斗争的“猫论”路线。把道理讲清楚，讲彻底，讲好。

只有抓住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这个纲，理论批判才能深入，才能彻底，才能真正从理论上批倒修正主义，才能使人民群众觉悟起来，发动起来，完成进行社会主义再革命、重建科学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历史使命。

明年，适逢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 50 周年。我们完全可以抓住这个契机，掀起一个学习马列毛主义理论、特别是反对修正主义理论的高潮。

我们要借这个机会，大力宣传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理论，反对修正主义的理论，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并结合我们亲身经历的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和这四十年资本主义复辟的残酷事实，认识这些理论的深刻性、正确性、重要性，弄懂、弄通这些理论，用这些理论武装广大人民群众的头脑，从而为发动社会主义再革命做好思想准备、理论准备。

5、会议再次强调，洛阳会议提出要突破专制，争取民主，是符合马列毛革命导师教导的，也是符合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再革命的现实实际的。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问题，这是中国历史前进的不可缺少的历史步骤。

关于这个问题，目前在理论上有一定的争论。因此，需要对这个问题做出我们的回答。

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无产阶级专政、亦或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人民民主专政。通俗地说就是人民当家作主。

道理显而易见。政治统帅经济。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只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存在，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存在。一旦失去无产阶级专政，即便存在公有制形式，实质也会发生蜕变。这已经为从苏东到中国，产生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所证明。

正如列宁所说，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是同义词。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无产阶级民主，同样，没有无产阶级民主，也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问题，只要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必要性，就必须承认无产阶级民主的必然性、必要性。这就把无产阶级民主的重要意义突出出来了。

民主政治是国家形式的最终归宿，是国家制度的最高形式。列宁指出：

“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因此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力。”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7页。）无论从本质还是从形式上看，社会主义民主都是比资本主义民主更进步、更高级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从制度上、实践上保障人民群众享有比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更广泛、更直接、更真实的民主权利，特别是管理国家的权利。正如列宁所说，苏维埃民主“就是全体居民群众真正平等地、真正普遍地参与一切国家事务”。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所在。毛主席不仅在延安与黄炎培谈话中强调，必须在人民中实行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让人人起来负责，就不会人亡政息。而且，在建国后更多次提出这个问题，强调人民群众的最根本的权利是管理国家的权利，并在最后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鼓励、支持人民群众大胆地对如何实现人民群众直接管理国家进行创造、付诸实践。

社会主义变修、社会主义失败的惨痛历史，再次把无产阶级民主的问题，迫切地提上了议事日程。历史教训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保证，一旦失去无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的失败就是必然的。

当然，不能不看到，实现民主是一个历史过程。对于一个经历了长期的封建专制主义社会的古老文明大国来说，尤其是这样。专制主义的历史传统腐蚀了整个中国社会肌体，束缚着中国社会的一切事物，包括束缚着中国人的灵魂。在这种情况下，突破专制，走向民主，是艰难的，是需要不断斗争、不断革命的。

更大的困难在于，我们面对的是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再革命的历史任务。就社会主义再革命而言，没有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阶级运动。只有突破专制，在民主的形式下，哪怕是在资产阶级民主的形式下，才能使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能以统一的阶级意志去统一行动，才能以整个阶级去参与政治斗争，才有严格意义上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这就把突破专制、争取民主的历史任务更迫切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革命导师列宁指出，经济斗争还不是阶级斗争，或者说，“只是阶级斗争的萌芽”，只有争取民主的斗争，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才是严格意义上的阶级斗争。

不能低估争取民主的政治斗争意义。恩格斯晚年强调：《共产党宣言》早已宣布：“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列宁在为俄国社会民主党草拟的党纲中写道：“俄国工人阶级争取自己解放的斗争是政治斗争，其首要任务是争得政治自由。”（列宁：《社会民主党纲领及其说明》，《列宁全集》第2卷，第70页。）根据这一观点，列宁为社会民主党拟定了9项争取政治自由、争取民主权利的“首先要求”。这包括选举权以及集会、结社、罢工、出版、信仰自由等民主权利。列宁强调，“工人阶级的斗争是政治斗争，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工人阶级不争得对国家事务、国家管理、发布法令的影响，就不可能进行争取自己解放的斗争。”（同上，第89页。）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一文中也说：“如果不争得政治自由并使俄国政治社会制度民主化，就不可能为工人事业进行胜利的斗争。”

（《列宁全集》第2卷，第285页。）甚至说：“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争取政治自由与民主制度的先进战士”，“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彻底实现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民主化，因为实行这种民主化，就会使工人成为这个制度的主人。”因此，列宁强调“把工人阶级作为争取民主制度的先进战士突出出来，就会加强民主运动，加强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同上，第289页。）

这些思想和《共产党宣言》中的思想是一致的。列宁是从俄国的实际状况论述争取政治自由、争取民主的意义的。列宁是写作党的纲领，肯定是极为严谨的。这体现了争取民主是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和步骤，体现了“社会主义斗争和民主主义斗争结合”。

这至少是当时的俄国国情决定的。列宁说：“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从来也没有忘记俄国的政治条件，从来也没有梦想在俄国有可能公开建立工人党，从来也没有把争取社会主义的任务和争取政治自由的任务分开。”列宁的教导，对我们认识我们面对法西斯专制到底应该不应该争取争得民主，有极现实的指导意义。

不能过高估计经济斗争的意义，更不能贬低争取民主这一政治斗争的意义。列宁在《我们的纲领》这篇重要文章中阐发了关于这一问题的重要思想。

“这个纲领的实质就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领导这一斗争，争取达到最终目的——由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组织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分经济斗争（反对个别资本家或个别资本家集团，争取改善工人处境）和政治斗争（反对政府，争取扩大民权，即争取民主和争取扩大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力）。有些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主办‘工人思想报’的那些人大概也可以包括在内）认为经济斗争重要得多，而政治斗争则似乎可以推延到比较遥远的将来。这种见解是完全不正确的。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一致认为必须组织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到工人中间进行鼓动，即帮助工人去同厂主进行日常斗争，叫他们注意压迫的种种形式和事实，以此向他们说明联合起来的必要性。但是，因为经济斗争而忘记了政治斗争，那就是背弃了全世界社会民主运动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忘记了全部工人运动史所教导我们的一切。……如果工人不能像德国工人和欧洲其它一切国家（土耳其和俄国除外）工人那样享有自由集会、结社、办报纸、派代表参加人民会议这些权利，那末任何经济斗争都不能使他们的生活状况得到稳固可靠的改善，甚至不可能大规模地进行任何经济斗争。而要想获得这些权利，就必须进行政治斗争。……一切经济斗争都必然要变成政治斗争，所以社会民主党应该把这两种斗争紧紧地结合成一种无产阶级统一的阶级斗争。这一斗争的首要目的应该是争取政治权利，争取政治自由。……俄国工人阶级即使得不到其它阶级的帮助，也能单独进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但是在政治斗争中工人并不是孤立的。人民的毫无权利和强盗官吏的横行霸道，也激怒了一切不容忍限制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比较正直的受过教育的人，也激怒了受迫害的波兰人、芬兰人、犹太人和俄国的教派信徒，也激怒了受官吏和警察欺压而又无处求援的小商人、小工厂主和小农。所有这些居民集团单独是无力进行坚决的政治斗争的，但是只要工人阶级举起这种斗争的旗帜，他们就会从各方面向工人阶级伸出援助的手。俄国社会民主党一旦成为一切争民权、争民主的战士的领袖，它就会是不可战胜的！”（《列宁选集》第一卷，第204—205页。）

列宁把各个方面的道理都讲得非常透彻。

自然，列宁讲的是俄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理，而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社会主义再革命。不能生搬硬套列宁所讲的道理。我们目前面对的革命任务和当年列宁面对的革命任务是不同的，看不到这个本质的不同是不对的。

但是，同样不对的是，如果看不到两者的一个共同点，即都面对着专制统治，也是不对的，虽然列宁面对的是沙皇封建专制制度，我们面对的是修正主义的法西斯专制制度。

专制制度是一种落后的反动的政治制度，我们这里不去详尽分析中国现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动的落后的政治制度。谁都知道在中国存在这种专制制度不是偶然的，与我们的现实的国情有关，也与我们的历史有关，我们这里只是强调，不管原因是什么，结果是中国存在专制制度，这种制度是一种落后的反动的政治制度，是修正主义统治的政治特点和政治要害。正是基于这种落后性、反动性、严重性，毛主席才说，希特勒比戴高乐坏，也就是法西斯专制比民主共和制坏，虽然都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政治统治。正是从历史比较的观点看问题，在反对修正主义的社会主义再革命的斗争中，反对专制统治，争取政治自由，争取民主的历史任务也就提到了重要位置。我们要充分认识争取无产阶级民主对于今天实现社会主义再革命的重要意义。

但是，这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而是社会主义再革命的历史任务。不要忘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概念的确切含意是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显然不能这样理解我们现正进行的反对专制，争取民主的社会主义再革命的历史任务。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观点。二者是统一的、一致的。先做民主主义革命，再做社会主义革命是这样；从反对法西斯专制制度突破，发动、进行社会主义再革命也是这样。尊重历史发展的顺序，从低到高，从易到难，是最利于调动最广大阶级、最广大群众，结成最广泛统一战线的最合理的历史步骤。这些道理，革命导师是反复讲清楚了。

有的同志强调我们的争取民主，不过是争取资产阶级民主，而在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想争得民主，不过是一种幻想。指责我们的错误就在于是制造幻想，甚至是在帮助统治者麻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

这是一种离开事实的思维的简单化。要是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方式都一样，那么，哪里还会有“希特勒”和“戴高乐”的区别？这是闭眼不看现实。按照这种观点，一切争取政治自由、争取民主权利的政治斗争都是没有意义的，其结果就是在实践上不去进行这样的政治斗争。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正在这里。

革命导师从来是重视政治统治方式的多样性的。马克思恩格斯对欧美不同国家的不同政治统治特点是非常注意的，并因此指出了这些国家的工人党面临的政治任务有不同。例如对德国，就强调其专制制度的落后性、反动性，强调要先突破这个反动的“外壳”，而谈论英、法、美、瑞士等国的政治制度，就承认这些国家的民主共和制比较发展。这是尊重事实的科学态度。正是基于这个事实，列宁也说，“欧洲其它国家的人民早就争得了政治自由。只有在土耳其和俄国，人民还是苏丹政府和沙皇专制政府的政治奴隶。”“沙皇专制就是官吏专制。沙皇专制就是人民对官吏尤其是对警察的农奴式的依从。沙皇专制就是警察专制。”（列宁《给农村贫民》，《列宁选集》第一卷，第393、395页）

列宁在和经济派、取消派等机会主义派别的论战中，都一再解释要实现无产阶级的联合，要使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去展开阶级斗争，没有政治自由、政治民主是不可能的，包括对同志们一再引用的恩格斯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那句话的解释，列宁也是强调民主共和制为无产阶级从事阶级斗争提供了可能和舞台。而且，列宁还特别强调了无产阶级争取民主所具有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尤其像罢工斗争就完全是无产阶级特有的斗争形式。这不仅没有局限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束缚，而且是对资产阶

级专政的反抗斗争。这些道理，值得我们深思，不能用教条主义思维剪裁丰富、复杂、生动的现实生活。

现在，我们的同志都一再感叹我们缺乏有组织的联合起来的斗争，都在呼吁大联合、大团结。这是从事实出发的正确看法。但是，同志们不要忘记，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民主。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弱点，正是专制制度造成的。这正如列宁所说：“要联合起来，就要有建立这种联盟的权利，就要有结社自由，就要有政治自由。政治自由不能立刻使劳动人民摆脱贫困，可是它能给工人一个同贫困作斗争的武器。要同贫困作斗争，除了工人自己联合起来之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办法。没有政治自由，几百万人民就没有联合起来的可能。”（同上，396页）所以，只是呼吁团结、联合，不敢首先推倒阻碍团结、联合的专制制度，是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只有坚决地为政治自由、结社自由而向专制制度作斗争，只有组织起自己阶级的政党，指挥统一的阶级动作，只有办起自己的机关报、网站，把马列毛主义的理论和策略传达给每一位阶级弟兄，达到思想上的真正的统一……只有这样，实现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团结和联合，才不是一句空话。

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之路，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它是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再革命的最好的最实际的榜样。

列宁曾经说：“只要俄国人民争得了政治自由，工人阶级联合的事业，社会主义的事业，会进展得无比迅速，比德国工人的这种事业进展得还要迅速。”（同上，第401页）“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首先是要争取政治自由。有了自由，他们才能把全俄工人广泛地公开地联合起来，去争取新的美好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列宁选集》第一卷第332页。）“除了经过民主主义，经过政治自由，没有其它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同上，第641页）。俄国革命验证了列宁的科学预见。今天，如果中国人民争得了政治自由，那么，发动社会主义再革命、从而再次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排头兵还会有什么困难吗？

必须认识到，无产阶级争取民主的斗争，不能靠恩赐，不能靠乞求，只有靠斗争，甚至是流血斗争，这是真正意义上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正是这一斗争，能够推动无产阶级革命不断向前、向上发展，这一斗争的最高形式，就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行动起来，运用一切可能运用的手段，包括暴力手段，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可以说，争取无产阶级民主的最高意义就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且，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后，还具有巩固、保护无产阶级专政，杜绝产生特权、产生修正主义的意义。

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的斗争中，积累了大量的丰富的革命经验，包括争取民主的经验，有关论述很多，讲得非常实际，非常透彻，又都经过了俄国革命的实践检验，非常可靠，值得我们重新认真学习。

基于这些道理，会议再次强调，争取民主是我们面对的不能回避的历史任务，一定要踏踏实实地有步骤地做起来。

目前，我们应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为武器，争取起码的民主权利。

毛主席亲自领导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毛主席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中国的社会实际，对民主问题有明确而深刻的科学论述。毛主席提出，在我国的宪法中，要坚持两条基本原则，即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

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的原则贯穿在我们整个宪法中。另一个就是社会主义原则，即要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毛主席主张，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09页）毛主席领导制定的《五四宪法》体现的就是这一民主思想，我们今天依然要坚持这一思想。

《五四宪法》，包括后来多次修订的《宪法》，甚至包括现行的经过修正主义统治者修订的《宪法》，都写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应该享有的民主权利。现行的《宪法》的第35条，明确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我们争取民主的斗争，完全可以从要求切实落实《宪法》第35条做起。我们要和一切违背《宪法》第35条，另外制定破坏《宪法》第35条执行的所谓“条例”、“法规”做斗争。例如，《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游行示威的自由，但是，在法西斯专制统治下，至今还没有批准过一次公民申请的游行示威。这就是典型的拿法西斯专制的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对抗、破坏《宪法》第35条有关规定的执行。这是修正主义的欺骗性的典型表现。我们要揭露这种欺骗性。要反其道而行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宪法》第35条的关于民主权利的有关规定，去反对实际践踏《宪法》第35条的法西斯专制，进行合法斗争。

基于这一斗争策略，会议决定，把争取落实《宪法》第35条，作为我们切近的争取民主的斗争步骤。我们要切实地做起来，要敢打硬仗，不能只是放空炮。我们的许多其它的斗争，包括维权的斗争、经济的斗争，都可以、也必须和这一政治斗争结合起来。

6、会议再次重申，自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革命导师一再教导我们，“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又一再告诫我们，人民群众要自己解放自己。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是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没有人民群众运动就没有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毛主席晚年一再指挥我们唱《国际歌》，说《国际歌》唱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并且说，“不仅要唱，还要照着做”。《国际歌》唱的就是，不靠神仙皇帝，不靠救世主，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今天，在资本主义复辟、人民重新遭受苦难，需要我们鼓起勇气进行社会主义再革命的关键时刻，重温革命导师的教导，实践革命导师的教导，是我们能否成功发动社会主义再革命的关键。

形势发展到今天，仅仅做网络斗争是远远不够的，也不能只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打转，要大胆依靠工农青年一代，历来的革命都是青年人为主力军的。最近我们提出，“走出网络，走进工农”，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一定要把依靠工农，深入工农，发动工农，掀起工农运动摆在我们一切基础工作的首位。我们要把工农的经济斗争、维权斗争和争取民主、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结合起来，要把经济斗争、维权斗争，提高到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高度。

会议号召，同志们要不畏高压，不怕困难，到工农中去，以维权斗争为切入点，力争打胜几个漂亮仗，扩大“中国毛派联合”的积极影响，提升工农运动的阶级水平、斗争水平。

与这一斗争同步，在适当的时机，组建“中国工农联合”，从组织上把中国工农群众联合起来。

遵照革命导师的教导，也是国际共运的经验，我们要办机关报性质的杂志《新红旗》和网站《人民之声》。既要把网媒办好，更要把纸媒办好。我们要把马列毛主义、特别是毛泽东主义，关于反对修正主义、进行社会主义再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宣传给人民群众，统一人民群众的革命思想，统一人民群众的阶级意志，展开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再革命运动。

我们这样做，无非还是坚持革命导师的一贯思想：只要人民群众起来了，中国就有希望了。

7、在法西斯专政条件下，斗争的形式是一个绝不可忽视、绝不可掉以轻心的重要的问题。必须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不敢斗争，畏惧牺牲，是完全错误的。但是，不顾条件，不顾可能，不善于合法斗争，一味盲动，造成不必要的牺牲，也是完全错误的。斗争是一门艺术。这门艺术可以有无限的创造。工农是创造这门艺术的大师。只要我们深入工农、尊重工农，我们会找到合适的正确的斗争形式。同时，我们还要向我们的先辈们学习，共产党人在白色恐怖下创造的斗争经验是给我们留下的宝贵法宝。我们要继承这些法宝，学会使用这些法宝，发扬光大这些法宝。

8、会议强调，社会主义再革命，是人民群众的革命，进行这样的革命，必须坚持毛主席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人民革命统一战线的思想。

社会主义再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经过共产党），是以工农阶级、包括站在工农阶级一边愿意投身社会主义再革命的广大干部、广大党员、广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革命，同时，为了成功进行这一革命，还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劳动者阶级的革命群众、包括从事劳动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群众，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反对法西斯专制统治的集团、阶层、政治力量，从而结成最广泛最有力量的社会主义再革命的统一战线，孤立打击最反动最凶恶的以修正主义、法西斯专制为其政治特征并执掌政权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及其死心踏地依附于这个阶级的私营资产阶级的某些政治势力和公开或不公开支持、操纵这个阶级的外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某些政治势力。

会议认为《洛阳会议纪要》对私营资产阶级的分析是正确的。私营资产阶级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是靠“权钱交易”、残酷压迫剥削工人阶级起家的暴发户，而且身上有浓厚的封建性，这和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本身的出身以及他们扎根的中国社会的特点决定的。他们的命运是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的。必须看到，正是法西斯资产阶级专制给他们带来了一切，因此，一般说来，这个阶级不但不会是反对专制的民主派，而会是维护专制统治的阶级基础。不要忘记，我们进行的是社会主义再革命，这是一场革命，我们的反对专制，争取民主，是和这一革命的阶级性质相统一、相联系的。这和向封建主要民主、要政权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有历史阶段、阶级属性的根本区别。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必须在策略上十分谨慎、十分小心，。

在这个问题上，从简单的历史经验出发，或从脱离现实实际的教条出发，都会发生判断错误。我们要尊重近四十年来的历史经验，要从私营资产阶级的

实际政治表现出发，正确决定我们对这个阶级的政治策略，力求避免各种形式的“左”的或右的机会主义。

我们这样说，并不否认，在特定条件下，在特定的时间、地点，私营资产阶级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会发生矛盾，我们并不反对在特定条件下，联合、利用愿意反对法西斯专制的资产阶级政治力量。我们尊重事实，一切从实际出发，而绝不从本本出发，作教条的硬性的先验的规定。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情况更复杂得多。对于其中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派、社会民主主义派，我们要有符合实际的全面的正确的分析。在反对法西斯专制的斗争中，我们与这些派别有可能实行暂时的联合，但是，在未来中国的走向、道路问题上，我们与他们必然会发生不可调和的斗争。

我们必须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坚持阶级斗争的观点。这里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不能作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尾巴。这是由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证明了的，也是由国际共运史的历史经验证明了的。

9、会议重温了马列毛革命导师关于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和理论。坚信列宁的教导，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唯一的武器就是组织。会议强调，在党变修、国变色的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组织工作迫切而艰难。“中国毛派联合”深刻意识到这一点，并要求自己对此有所贡献。

“中国毛派联合”目前只是一支马列毛主义指导下的政治力量，只是一部分坚持马列毛主义信仰、坚持共产主义理想的同志们联系起来的政治群体。我们并不否认，我们希望能够向无产阶级革命党过渡，但是，我们也深知，在宪法的“结社自由”被践踏的情况下，要想实现这一点，只有伴随着我们捍卫宪法第35条、争取民主的斗争的不断深入才有可能。

这是我们坚定不移要实现的目标。我们深知，没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就没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再革命。同时，我们重视实际可行的稳妥的步骤。

会议经过认真讨论和民主程序，确立了“中国毛派联合”近期的联系机制和联系形式。细节略去。

10、会议研究了我们的经济工作，强调指出，为了支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再革命运动，为了满足开展斗争所必须的人力、物力，我们要大抓经济工作，抓好经济工作。目前我们的经济工作已经有了初步的基础，现在需要的是继续发展、继续扩大。关于这一工作的细节，会后会有相应安排。

11、最后，会议呼吁一切真正愿意革命的毛派同志，要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大无畏精神，鼓起社会主义再革命的勇气，果敢发动社会主义再革命运动。

会议强调，我们必须牢记毛主席的教导，“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马列毛主义的灵魂绝不是像邓小平说的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唯物主义认识论。正是坚持这个认识论，坚持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实际出发，马列毛主义的灵魂必然是要革命，要造反，要进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实现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

四十年来我们所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不敢造修正主义的反。毛主席当年说得很清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就要造反，人民就要造反，而且明确说，“不造反就犯错误”。毛主席是对的。毛主席表达的是一种真正的彻底的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气魄。我们辜负了毛主席的希望。我们受到了历史的惩罚：党变修，国变色，人民重新受苦受难。

铁的阶级斗争的事实教育了我们，错误和挫折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变得比较聪明了一点，我们终于认识到，只有革命一条路，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我们要举起马列毛主义的造反有理的红旗，奋起反抗，奋起斗争，奋起革命，造修正主义的反，革修正主义的命，结束修正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争取中国社会主义再革命的伟大胜利。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没有危险的革命是没有的，没有牺牲的革命也是没有的。社会主义再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一样，需要付出牺牲，付出代价。我们依然要发扬毛主席提倡的那种革命豪情：成千成万的革命先烈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韶山会议全面回顾了自洛阳会议以来，中国毛派联合在《洛阳会议纪要》指引下进行斗争的经验和教训。代表们一致认为，实践证明，《洛阳会议纪要》是基本正确的，现在，为了进一步开创社会主义再革命的新阶段，在坚持《洛阳会议纪要》的基础上，还要有新的经验总结，新的思想提出，以上《韶山会议纪要》就是适应这样的需要而作出的。

《韶山会议纪要》，是《洛阳会议纪要》的继续和发展。两个《纪要》，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的整体。中国毛派联合的同志们必须把两个《纪要》作为一个统一整体去理解、去贯彻。

修正主义者总是靠欺骗过日子，他们欺骗人民，也欺骗自己，在欺骗中不可避免地陷入盲目性。他们看不到，也不愿承认，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正一步一步朝我们走来，革命的客观形势正在逐步走向成熟。

我们马列毛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不同，我们不仅以科学的态度认真分析革命形势的到来，而且看到，即便在革命形势到来之时，能不能发动革命，还要取决于革命的主观力量的成熟度。正是基于这一点，“中国毛派联合”决心接受历史的考验，我们决心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不辜负人民的期望，在中国历史将要发生、必将发生重大转折的关键时刻，担当起历史赋予我们的发动、推动革命的时代重任。

毛主席说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今天，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现正进行的社会主义再革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只是，那时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现在是在无产阶级专政被颠覆为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再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演习，也是实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形式是一月革命。一月革命的原则是，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这个伟大原则是永存的。在五十年后的今天，这个原则并没有过时。尽管我们没有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保护，尽管因此我们要面对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但是，也许正因为发生了这个根本变化，正因为有了那时没有的特殊困难，我们更要坚信这个原则，坚持这个原则，贯彻这个原则，这个原则体现了马列毛主义的最根本的道理，只要有用马列毛主义武装起来的共产党的领导，只要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只要有广大劳动人民的革命大联合，就有能力向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就有能力胜利实现社会主义再革命。

我们有决心、有保证夺取胜利，因为永垂不朽的革命导师毛主席与我们同在。

面对即将到来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大决战，让我们振臂高呼：

中国毛派共产主义者联合起来！

中国人民联合起来！

社会主义再革命胜利万岁！

中国毛派联合 2015 年 12 月 27 日

《论人民民主》一书节选

2016.8.18

三 争取人民民主，具有社会主义再革命的纲领意义

在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近四十年的统治下，中国发生了彻底的资本主义复辟。而且，这一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正是毛主席预见的最坏的资本主义。

经济上是三位一体的官僚垄断买办资本主义、外国垄断资本主义和依附前二者的大私有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这一经济体系，盗取国家资源，榨取人民血汗，催生了举世罕见的大量的亿万富翁。

政治上是一党专制为特征的压迫剥削人民的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其黑暗程度和残酷程度是空前的。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希特勒比戴高乐坏”。

思想文化上是修、资、封大杂烩垄断一切，腐败至极。

批量揪出的腐败贪官，可以说是中国现实社会腐败程度的生动写照和衡量尺度。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只有进行社会主义再革命才是唯一的出路。其它的任何改良主义的愿望，只能是幻想，是不可能成功的。

怎么进行社会主义再革命？

能套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武装斗争的道路吗？国情变了，时代变了，走不通。

能套用议会斗争的道路吗？中国根本就没有议会，连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也没有，而且，这种机会主义的修正主义的议会道路顶多只能通向资本主义的改良，如社会民主主义。

能套用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的道路吗？那时有战争及其相连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战争带来革命，现在我们没有这个条件，这条道路至少现在无法提上议事日程。

我们还面对着一一些中国国情所特有的实际情况。

苏东的修正主义统治垮台了，转变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我们这里的修正主义没有垮台，而且，顺利地成功地复辟了资本主义，走上官僚垄断买办资本主义社会。说特色，的确是特色，只是是特色资本主义。

在这个特定的社会形态下，阶级、阶级关系的状况也有了过去不曾有过的显着特点。例如：

外资及其白领高管，有其特点；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有其特点；与官僚、外资勾结一气的私人资本家阶级，也有其特点。

劳动人民阶级方面，农民工是一大举世仅有的“特色”；农民在改革中更加小私有化，也更加风雨飘摇，也是新现象；工人阶级彻底从国家的主人沉沦为雇佣劳动者，更是过去不可比的。

这些阶级、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再革命的出发点，它也必然决定着社会主义再革命的新特点。

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法西斯统治者，一方面，手里依然举着假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红旗，并采取一定的很有欺骗性的政治措施，例如反腐，这些对广大劳动人民依然存在极大的欺骗性；另一方面，法西斯统治者又毫不手软地运用暴力国家机器，对劳动人民的任何反抗斗争进行残酷镇压，就像法西斯头子邓小平总结的，要把反抗斗争，扼杀在萌芽之中。并且，毫不留情地剥夺了广大的劳动人民的任何民主权利，所以至今我们连一个真正的马列毛主义的共产党也组织不起来。

这是阶级、阶级关系决定的政治状况，是我们面对的残酷的但又是真实的事实。

在这种情况下，究竟应该怎么办才是正确的无产阶级的策略呢？

有一种说法，即所谓的“一次革命论”，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论。

就我对这一派理论的了解，其不足之处至少有两点。

一是，把目前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简单化，认为仅仅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的矛盾。这完全离开了中国社会多种阶级、多种阶级关系存在的复杂的实际状况，因而不可能制订出符合实际的能够团结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政治策略。

在他们看来，要进行的是纯粹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我们看来，要进行的是不纯粹的社会主义革命。他们要建立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建立的是人民民主专政。他们要争取的是无产阶级民主，而且认为这只能在获得政权后才能实现，在这之前展开争取民主的斗争是没有现实的意义的；我们要争取的是更为广泛的人民民主，并认为，争取民主的斗争是和争取政权的斗争同步的、统一的、相互配合的。

这些，自然是斗争策略上的深刻的不同。

二是，反对首先争取民主，认为向资产阶级争取民主是不可能的，主张把工作中心放在发动群众上，在时机成熟时，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有的甚至主张，必须发动暴力革命。但是，他们只是在这样说，并不能拿出推动革命运动的实际步骤，理论流于空喊，而且是高调的吓人的空喊。

所以，这一种观点带有浓厚的教条主义气味，是我们不能同意的。

还有一种说法，即所谓“二次革命论”，也就是“先搞人民民主革命，再搞社会主义革命”论。有人还使用“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概念。

我对这一派的理论，了解得多一些，因为他们总是很有耐心地不厌其烦地向我灌输。我先是认真思考，然后弄清了分歧。在我看来，这一理论的主要不足就一点。就是没有正确理解“人民民主革命”的性质。

这一派对中国社会经济关系、阶级关系的分析，我们小有不同，可以商量。首先要突破专制，争得民主，意见基本相同。

分歧主要发生在是要划分为“二次革命”呢，还是同属社会主义再革命。

这个分歧是深刻的，涉及一系列理论问题。

第一、专制制度是政体，既有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下的封建专制，也有资产阶级统治下的法西斯专制。不能一见专制就以为是封建专制，而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我们现在面对的专制应该说是资产阶级法西斯专制。这一点毛主席也是这样看的。他不止一次这样说过，也不止一次拿希特勒作比喻，而从不拿封建皇帝作比喻，毛主席对这种专制的资产阶级属性的定义是十分清楚的。

因此，我们反对专制，争取民主的斗争，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而是从属于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反对资产阶级篡权的社会主义再革命的斗争。不能说，面对法西斯资本主义复辟，我们要开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斗争。这样说是走苏东的路，不是我们共产党人所要追求的。这种思想理论的危险也许正在这里。

第二、我们进行这场斗争，是以马列毛主义为指导的，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通过共产党），以工农为主体并发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展开的斗争。这样的斗争主体，决定了这场斗争的性质，只能是以社会主义为目标、为纲领的社会主义再革命。一般资产阶级到底能不能参加这场斗争，要看实际，而不是背诵教条和依靠历史比喻。不管怎样，我们都要牢牢把握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权，而这就意味着，只能是搞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主义再革命，不是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争民主也只能是社会主义再革命的组成部分。

如果没有这一点，那只能是“颜色革命”，也就是像苏东，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代替修正主义的法西斯官僚垄断资本主义。这是实践提供的证明。这是“二次论”，但是，这是资产阶级的胜利，无产阶级的失败，社会主义再革命被推迟。

他们有时抽象地使用“人民民主革命”这个概念。我反复问他们，这个“人民民主革命”到底是无产阶级的人民民主革命，还是资产阶级的人民民主革命。如果是前者，那正是社会主义再革命，如果是后者，那正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第三、许多同志都低估了、甚至根本不懂争取人民民主的意义。

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误区。

例如，有的同志认为，一讲民主，就是讲普世价值，就是讲资产阶级民主，就是讲资产阶级宪政民主，看不到争取民主是一场阶级斗争，是可以反映无产阶级的民主要求的；也有的同志认为，既然是反对专制，争取民主，那就只能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和社会主义挂不上勾，要挂勾，只能下一步；也有的同志把民主，只是理解为、局限为言论、集会、结社、出版、游行示威等的民主权利，没有懂得民主的最高意义和历史地位；也有的同志，完全排斥了争取民主的可能性，认为在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要想得到民主是幻想，更重点说，是欺骗。他们只追求革命的爆发，只追求暴力革命。他们根本不管革命导师，针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背景，反复地不断地指出，有的国家争得了

民主，有的国家还在专制下，情况是不同的，争取民主的历史任务也是不同的，历史要一步步走。总之，在这些同志的眼里，只有僵死的教条，没有生动的历史。误解很多，不必一一列举。

之所以发生这些误解，就是因为这些同志没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没有认真读马列毛，因而，没有弄懂人民民主、无产阶级民主的重要意义。

前面已经作过一些说明，这里再做一点进一步的说明。真想弄懂这个问题的同志，最好还是去读马列毛关于国家学说的著作。

人民民主的最高意义，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争取人民民主，并不仅仅是争取一点民主权利。争取人民民主的最高的意义在于，这一斗争每前进一步，都是向人民民主专政，也就是向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向执掌政权前进一步。同时，争取人民民主，还意味着是争取人民群众展开阶级斗争的舞台的不断扩大，使更广大的人民群众作为阶级觉悟起来、团结起来，最终完全实现最彻底的人民民主，即夺取政权、执掌政权。

争取人民民主，是政治斗争，是阶级斗争，远高于经济斗争，其实质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人民民主不过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形式，形式服从实质，实质决定形式，正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这一本质决定了，争取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再革命的特定表现形式。

争取人民民主，是一个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哪怕最低形式的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也是政治斗争，也是最贴近政权的斗争，也远高于经济斗争。不用怀疑，最高形式的争取彻底的人民民主的斗争，只能是争取政权的斗争，只有掌握了政权，才有彻底的人民民主，才有人民民主专政。

这个过程，难道不正是社会主义再革命的过程吗？

根据当代人民运动的历史经验，也是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只要人民起来了，修正主义是不堪一击的，而这个过程，正是和人民群众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同步的。

经过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最后实现夺取政权，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或者如“二次革命论”者说，建立起联合政府，到底是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呢，还是社会主义再革命的胜利呢？

答案是明确的，是社会主义再革命的胜利。

人民民主革命不是超阶级的，要确定其阶级性质。不确定其阶级性质，是理论上的失误。

要是资产阶级主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建立了资产阶级主导的政权，那这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无关，也不可能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再革命。

如果是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主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建立起无产阶级主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那这只能是社会主义再革命。

道理再简单不过，政权已经实际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联合政府不过是无产阶级主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

当然，又必须看到，这毕竟是一场人民革命运动，而不是纯粹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只能说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特定形式，虽然革命的主体队伍更广大，但革命的起点却更低，革命所能达到的目标也更低。

这是中国作为一个没有经过发达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国情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二次革命论”者注意到这一切，是有道理的，比教条主义的“一次革命论”者更接近中国的现实实际。

最近（2016 年底），我和“二次革命论”的同志又做了一点讨论。他们依然坚持自己的意见。

他们的意见的确是一种“二次革命论”。自然并不是历史上的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的翻版。但是，他们讲目前中国面对的革命，是要分别进行两次革命，这是他们的十分明确的观点。具体说就是，先进行人民民主革命，摧垮了专制制度，夺取了政权，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他们反复讲清楚的，没有歪曲他们的原意。

我在微信群的音频里批评了这个意见，我把我的批评意见补充写在这里。以备历史检验。

1、根据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根据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反对修正主义上台，反对走资派的斗争，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解决“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问题，是解决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这场斗争的基本性质，毛主席领导的党的认识，从来没有动摇过。毛主席自己更有明确的表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没有人怀疑毛主席的教导，提出应该把这样的斗争说成是“人民民主革命”。

文化大革命初期，曾针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实行的法西斯专政，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但是，毛主席并没有说，为了要摧垮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要先进行反对专制的人民民主革命。事实是没有谁提出这个问题，也没有发生这个问题。从摧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到广大人民群众起来发动“一月革命”，是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全过程。没有什么“二次革命”。

2、我们一再指出，在马列毛主义理论体系中，民主革命这个概念是特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二次革命论”的同志实际也是这样使用的。

这就很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难道在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实行法西斯专政的情况下，我们要退回去进行为了反对专制、争取民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吗？

这在理论上是根本不通的，自然也违背了毛主席的一系列教导。毛主席从来没有发表过这样的意见。毛主席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是清楚的，有关教导是大量的。除非你充耳不闻。

3、这是一个全新的历史课题。唯一可借鉴的历史经验和理论分析，是在毛主席主持下，我们党当年对苏修的批判。但是，现在中国蜕变的程度和当年苏联蜕变的程度，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只有依靠从实际出发，才能获得关于这个问题的真理。

中国现在最大的实际就是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如果说到特点，最大的特点，还是毛主席说的，修正主义上台后，实行法西斯专政，搞最坏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本质，最坏是特点，二者有机统一，二者缺一不可。讲特点不能离开本质，讲本质不能忘记特点。

我们反对这个修正主义带来的最坏的资本主义，不能不从这两点出发。

一是坚持对本质的认识。我们进行的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主义再革命。这是由中国当前复辟了资本主义的社会性质决定的革命的性质。几十年来，毛主席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也是这样从事革命实践的，包括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演习”，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不是反对别的复辟。

二是坚持对特点的认识。我们要反对这个法西斯专制的资本主义。我们把争取民主的斗争放在首位，就是这个特点决定的。不突破专制，没有政治自由，就没有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的政治运动，就无法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斗争。但是，我们这种反对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的争民主争自由的斗争，绝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只能从属于社会主义再革命。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历史条件下，谈不上会发生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退一步讲，就是自由资产阶级领导推倒了修正主义法西斯专政统治，那也很难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要还是资产阶级统治政体形式的转换。类似台湾从专制向民主的转换。89年，赵紫阳成功，也可能会发生这样的转换。未来中国也未见得没有这种可能。但是，这不是社会革命，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不是。

考虑到这各种历史可能，人民民主革命论的提出是没有历史根据的。

4、专制有各种不同阶级的专制。不能一见专制就以为是封建专制，一反专制就是民主革命，这是不恰当的。

要看是哪个阶级的专制，哪种历史条件下的专制。毛主席明明说，是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怕不好懂，又说是希特勒，比戴高乐坏。用两个活生生的政治家，比喻两种政治体制。这个阶级定性还不清楚吗？够清楚了。但是，碰上教条主义者，他硬是不接受，你有什么办法？

5、要正确理解和运用革命导师关于如何认识、如何对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指示。

大家都知道，不能教条主义地对待革命导师的指示。但是，实际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却不一定。不一定是有意，更多是无意，是受认识水平的限制而滑向教条主义。

例如马恩的意见，主要是针对19世纪英法德等国的历史条件发表意见的；列宁则主要是针对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俄国的历史条件发表意见的，就是都是谈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要解决的历史课题，要完成的历史任务，也是很不一样的。至于能不能和我们今天面临的历史条件作比较，我看一般是不合适的，硬要套，只会套出错误。

社会革命的准确意义是指社会形态的变更。离开这一点，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是立体的，多层次的，一次革命并不一定能够将全部历史都彻底完成。但是，只要涉及社会革命的历史任务，总是要和社会形态相联系的。不管是就基础而言，还是就上层建筑而言。没有这样的历史内容，是谈不上社会革命的。

历史事实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最初荷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面临的历史任务，和一、二百年后欧洲诸国、包括俄国面临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是不同的。马恩讲德国，列宁讲俄国，主要是针对皇权专制制度、农奴制封建残余而言的，所以依然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这是就这个时代的历史任务而言的，不是漫谈整个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有些早已成为过去。

中国不同，是初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旧也罢，新也罢，是从头做。从孙先生到毛主席，都是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大文章。

如果和我们今天面对的历史条件相比较，可以明显看出，历史条件是完全不同的。我们面对的是资本主义复辟，是出现了最坏的法西斯专制的资本主义。革命导师那些关于民主革命的意见都不是针对这样的历史条件而言的。如果说有什么一般可适用的原则，哪只能是，没有政治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阶级的阶级觉悟和阶级组织，也就没有劳动人民阶级的政治运动。这可算是一条普遍真理，是我们今天要坚持的真理。超过这个限度，认为只要我们反对专制，就是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顶多再套上个“人民民主革命”的帽子，则是把革命导师的正确意见教条化成荒谬的错误了。

6、关于革命性质的争论不是一个小问题，深究到底，这是一个涉及到我们现正进行的革命的根本路线的问题。

去掉层层遮掩，根本的分歧在于，我们是要进行一场人民大众的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主义再革命？还是要先进行一场人民民主革命，然后再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

坚持社会主义再革命，和坚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反对谁、依靠谁、团结谁，以及怎样展开斗争、采取怎样的策略等根本问题上，路线、方针、政策都是有原则区别的，甚至是根本对立的。

路线决定一切。不同的路线将决定着革命的不同命运和结局。

我们曾经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工农群众对社会主义有深切的感情和无限的怀念，深知社会主义才是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只有举起社会主义的革命旗帜，才能吸引工农群众参加这场和自身利益息息相关的革命。

社会主义社会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修正主义上台，变人民当家作主为法西斯专政，对人民实行专制统治，这正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今天，当我们进行反对专制的革命斗争时，难道我们不正是进行重建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斗争吗？反对专制、重建人民民主专政，不正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的要求吗？这二者难道不是完全统一、不可分割的吗？

正是社会主义，正是人民当家作主，才是吸引劳动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再革命的伟大旗帜。

从人民大众的、实质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退回到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无疑是一种历史倒退路线。

最根本的问题自然在，这是离开当前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离开当前社会性质的错误说法。

直接危害就是不能正确处理资产阶级的问題，从已经出现的一些说法看，这些同志往往过高估计了私营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阶级联盟反对法西斯专制的可能性，不是从既定的事实出发，而是从国际国内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经验出发，生搬硬套这些和现在我们面对的历史条件根本不相吻合的历史经验，结论当然是错误的。

这是一个很实际而又很危险的错误。这关系到对于当前我们要进行的反对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方向问题。坚持社会主义再革命，就必然要把握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必然会失去劳动人民的支持而被资产阶级夺去领导权。

为了帮助“二次论”的同志解开思想疙瘩，我想，我们重温一下列宁 1921 年所写的《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是会得到帮助的。

列宁有两个思想，对我们很有启发。

一个思想是苏维埃制度、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即意味这将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列宁是这样论述这一道理的。“苏维埃制度就是由一种革命发展为另一种革命的显著的证明或表现之一。对工人和农民来说，苏维埃制度是最高限度的民主制，同时它又意味着与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决裂和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型民主制的产生，即无产阶级民主制或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生。”（列宁全集第33卷第35页，1957年版。）列宁的论述清楚地告诉我们，工农苏维埃制度、苏维埃政权——“无产阶级民主制或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起来，这正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证明或表现之一”。这个道理对我们争取民主的斗争是同样适用的。我们冲破专制，走向民主，最终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难道这不同样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证明和表现”吗？！更何况我们是在资本主义复辟的新的历史条件下。

列宁的另一个思想是，哪怕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遗留历史任务，也完全可以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副产品“顺便解决”。列宁是这样论述的：“要巩固俄国各族人民所取得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我们就应当继续前进，而我们也确实前进了。我们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作为我们主要的和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工作的‘副产品’顺便解决了。我们一向说，改良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副产品’。我们不仅说过并且还用事实证明过，资产阶级民主改造是无产阶级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的副产品。顺便提一下，所有考茨基、希法亭、马尔托夫、切尔诺夫、希尔奎特、龙格、麦克唐纳、屠拉梯之流以及‘第二半’的其它马克思主义英雄们，都不了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前一革命可以转变为后一革命。后一革命可以顺便解决前一革命的问题。后一革命可以巩固前一革命的事业。斗争，只有斗争，才能决定后一革命能够超过前一革命到什么程度。”（同上）列宁的思想完全体现了革命的辩证法。我一再说，我们今天面临的专制是资产阶级专制，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要完成的历史任务。退一步说，就算是封建性专制，就算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遗留历史任务，根据列宁的思想，我们不是完全可以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作为一种“副产品”“顺便解决”吗？这不仅是完全可以的，而且是必须的。不突破专制，不争取到民主，人民无法发动起来，就不会发生真正的人民大革命，也就不会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

所以，反对专制，争取民主，与其说这是发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须的步骤，不如说这更是发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再革命的必须的步骤。

这才是列宁思想在今天的灵活运用。

与这个问题相联系。还有一个如何处理统一战线的问题。我从有的同志的论述看出，他们之所以要确定目前进行的是民主革命、甚至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提法，很重要的是考虑到为了团结私营资产阶级一起参加这场革命，生怕一旦提社会主义再革命就会吓跑了私营资产阶级。

这样理解目前我们要建立的统一战线对不对呢，符合不符合马列毛主义的原则呢？

不对，不符合。

第一、我们的统一战线的领导力量是无产阶级，基础力量是工农劳动人民阶级以及其它劳动人民阶级。反映这些阶级力量的旗帜，只能是社会主义再革命的旗帜。

第二、现在的争取民主的斗争，必须明确是争怎样的民主，哪种阶级性质的民主。我们不能争普世价值的资产阶级民主，只能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民主，而且，面对资本主义复辟，我们以捍卫毛主席时代的曾经经历过的社会主义民主，最为广大劳动人民所理解。为什么要反过来去争对劳动人民不过是欺骗的资产阶级民主呢？你们害怕吓走私营资产阶级，你们就不害怕吓走无产阶级、劳动人民阶级？

第三、争哪个阶级的民主，本身就会存在阶级斗争，由此，又必然地涉及究竟是哪个阶级领导争民主的问题，也就是所谓领导权的问题。这种阶级斗争是历史反复证明了的，是不能抹煞的，是有惨痛的教训的。不举起社会主义再革命的旗帜，不去争取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就等于迁就资产阶级去争资产阶级民主，就等于放弃争取民主斗争的领导权，最终，就会背叛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愿望。

第四、统一战线，从来是，有统一，有斗争。统一于反专制，争民主，但是，具体到，怎样反专制，怎样争民主，争怎样的民主，都会发生斗争。惧怕斗争，把统一战线理解为只有统一没有斗争，不敢斗争，是错误的。这样想，这样做，只能导致统一战线失败。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这是毛主席告诉我们的真理。切莫忘记。我们一定要有我们的争取社会主义民主的无产阶级的斗争策略。而基本点，就是坚持争社会主义民主，只有作到了这一点，一旦争取到了这样的民主，那就如同列宁所说，这正是社会主义再革命的胜利。人民民主专政的重建，是社会主义再革命胜利的标志。

不要重犯历史上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如抗日战争时期的王明。放大一点说，国际共运史上这样的例子也不少。我们要尊重历史经验，要牢记历史教训。

不能片面理解建立广泛的人民统一战线思想，不仅要强调广泛性，还要强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离开无产阶级对统一战线的领导，离开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必然要犯右倾机会主义、也就是修正主义路线的错误。这一点请二次论的同志不要掉以轻心。

我最近多次谈论思想方法。这里再重复多说几句。

任何历史经验都是当时历史的经验，都是从当时历史实际出发的，而为完成当时的历史任务所检验。同样，革命导师关于这些历史经验的指示，也是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前提的，不是离开历史条件的抽象的教条。可惜的是，二次论的同志从思想方法上看，恰恰没有处理好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历史经验不错，革命导师的意见不错，但是，用得不是地方、不是时候，文不对题，把正确的生动的理论变成了僵死的教条。结果，正确转化为错误，走向反面。

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明明毛主席关于这个问题有那样多那样明确的指示，为什么不好好学习、领会、贯彻，偏偏要离开中国实际搬用马列关于欧俄情况的指示呢？不要轻视毛主席，不要轻视中国的实践，在我看来，我们现在实际走在全世界认识社会主义理论问题的最前列。这是我在德国三十年来亲身感受到的。我倍觉毛主席伟大，他老人家无愧是在马列之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另一位伟大革命导师。

在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再革命伟大斗争中，必须学习毛主席的教导，继承毛主席的教导，实践毛主席的教导，发展毛主席的教导。只有作到了这一点，我们的胜利才必将是肯定的、有把握的。

我坚信历史会验证这一点。

坚持社会主义再革命，坚持从争取人民民主做起，无论是从反对修正主义法西斯专政，反对资本主义复辟来说，争取重建人民民主专政来说，还是从未来防止出现特权阶级，防止出现修正主义，防止政权蜕变来说，这样的口号，这样的思想理论路线，都是符合马列毛主义的。

如果具体要问，这场革命究竟会经历怎样的历程，我想，还是毛主席说的，革命者不是算卦先生，历史的发展变化总是千变万化、丰富多彩的，不然不是历史。

但是，大的规律性的东西，又是可以预见的，当代也提供了部分历史经验。

大体说来，第一步，也是很重要的一步，就是争取真正地实施宪法第 35、第 37 条。能否迈出这一步，能否有这个突破，这是人民革命运动的起点。实现这一点恐怕不会十分简单，斗争会是艰巨的、曲折的，是要付出代价的，甚至付出昂贵的代价。

第二步，一旦人民有了真正的民主权利，长期被打压的人民群众就会利用这些民主权利，掀起人民运动。这肯定也是一个曲折的过程，而且，更复杂，更难驾驭，但是，最终会 from 无序走向有序，形成相对统一的人民革命运动。

第三步，人民起来了，相对有组织的人民运动起来了，真正的马列毛主义的共产党能够领导整个运动了，这时，重建人民民主专政，重建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也就提上议事日程了。

这会是人民革命运动的最高形式，是文化大革命“一月革命原则”的再现和升华。在马列毛主义指导下，在共产党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团结起来，向修正主义统治者夺权。文夺还是武夺，那要由对抗的双方去决定。革命人民会牢记两个马克思主义原则，一个是勇敢、勇敢、再勇敢；一个是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

第四步，稳定、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建立人民民主、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

这将是一项艰难的又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要创造一种使修正主义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制度。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搞好人民民主制度、突出人民管理国家的权力、权利，是整个工程的核心。

革命是鲜活的，设想是干瘪的。我们只能谈论一点原则，而且，这已经很可能并不符合日后的历史实际。

经过这样的革命，我们可以建立起一个特定的社会形态，这个社会形态，是我们可能起步的带有过渡性质的社会主义社会，我给了一个科学的概念，“半社会主义”。

很多人不理解这个“半”字，不喜欢这个“半”字，其实这个“半”字很重要，是从历史实际出发的，是说像我们这样一个东方落后国家，没有经历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在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时，不能不经过的一个从不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逐步向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半”字，反映的正是这种过渡，用哲学的话语说，就是由量到质的过渡。

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这是一种历史必然。我们曾有过过高的期望，但是，我们受到了惩罚，而且，最终，我们只好还是退了回来。

不要轻视“半”字，要尊重“半”字，这不过是要求尊重历史辩证法，尊重历史实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目前中国现实的一种必然选择》

一文节选

2018. 3. 23

其四是表现在对当前革命性质的教条主义理解上。

最典型的莫过于“二次革命论”，或者说“人民民主革命论”、“新民主主义革命论”。

不管哪种叫法，其理论理解是一样的，主要就是以为我们现在面临着专制，因而反对专制的革命，就必然是民主革命。

我在《论人民民主》一文中，对这种教条主义的错误理解做了比较全面地批评。这里不再过多重复。我只想强调，对于社会革命性质的确定，只能以现实社会的性质为出发点。既然大家都公认，我们面临的是资本主义复辟，是重建了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尽管存在着法西斯专制，尽管存在着一定的封建遗存，但是，这个社会的基本的资本主义属性是明确的，反对这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重新革命、再次革命的属性也是明确的，只能是无产阶领导（通过共产党）的人民大众的社会主义革命。

作为一种政治体制的专制，不独封建社会存在，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下，都有可能发生专制。剥削阶级以专制作为统治形式，在历史上是常见的。我们面对的是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制，这是清楚的，也是毛主席指明的。不能见专制就以为是封建专制，就以为要进行反封建专制的民主革命。把我们现在面对的资本主义国情，和马恩面对的德国（有封建皇帝，有严重的封建容克地主），和列宁面对的俄国（有封建沙皇，有严重的农奴制残余）作简单类比、简单等同，进而生搬硬套革命导师针对德国、针对俄国的意见，就会把正确的意见变成错误的教条。

有的同志还硬要把我们现在面对的私营资产阶级和解放前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作简单的等同，提出要联合这个阶级去进行反对修正主义执政集团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更是完全不顾历史条件的不同，生搬硬套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教条主义，错误也是十分明显的。

以上的种种教条主义错误告诉我们，读了一点马列毛主义的书，有了一点普通知识，就以为自己懂得了马列毛主义，就能够将马列毛主义应用于对现实的理解了，这是一种自我误解、一种自我盲目性，其结果是走向反面，走向马列毛主义的对立面教条主义。

当年毛主席在延安猛烈批评教条主义，骂教条主义连狗屎都不如，狗屎还可以肥田，不是气话，是真理。说教条主义害死人，不过分，我们为此而牺牲的同志还少吗？

当年那些搞教条主义的同志和现在搞教条主义的同志，情况有类似之处，都是读了一点马列的书，但是，食而不化，没有读懂，更没读通，又缺少革命实践锻炼，缺少丰富的历史知识，却盛气凌人地自以为已经马列毛在手，对自

己的错误意见非要坚持到底不可，直接干扰了革命运动的正确方向、正确发展。

坚持教条主义又会影响同志们之间的团结。搞教条主义的同志都很僵硬，都很自信，都很难听得进别人的意见，并且爱给别人上纲，这能不影响团结吗？实际这常常是导致毛派不能很好团结的一大原因。请同志们想一想，是不是这样？

毛派搞不好团结，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大问题。这既是政治作风的问题，也是思想作风的问题。要解决政治作风的问题，还要从思想作风入手。不能错误地认为，我们不能讲修养。毛主席写《反对自由主义》也是讲修养的。在我看来，毛派同志加强修养，包括反对自身的教条主义，是不可避免的一大思想任务。